



重要進展

鄧小平批周恩來內情

被當局污蔑為墮落女人

遇羅錦出國

寄來傑作



遇羅錦在西德

機密來函

國民黨頑固派要推倒王炳章

劉賓雁回應中國之春和倪育賢

5月號

總35期

1986

本期專題：

余英時·唐德剛·楊力宇論中共梯隊接班

捐款獎勵留學生

訂閱中國之春

欣聞中國民聯二大召開。讀了有關文件，我覺得中國的民主事業越來越有希望。

做為一個離鄉多年的愛國華僑，我一直關切祖國的命運。大陸實行經濟改革後，原想回國投資，支援四化建設。可是，最近我聽到一位朋友訴說回國投資的經驗。我的那位朋友曾與國內合資一項企業，搞了一年多，處處受到官僚們的制肘，更沒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受到委曲或有合理的建議，由於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也不能公開發表出來。結果，他不得不痛苦地結束合作，傷心而歸。

我們都感到，中國大陸不推展民主，不實行法治，不實行言論自由，投資是沒有保障的，四化也難以實現。因此，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方向是正確的。儘管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道路還很長，但這是希望的道路。

為了支援中國的民主事業，我捐出九仟美圓，資助五百名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免費訂閱中國之春。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生活費很少，訂閱雜誌確有困難。然而，中國大陸留學生回國後將擔負傳播民主觀念的重要任務。我願資助他們，以便讓更多的人讀到中國之春，參加中國民主前途的討論。

東南亞華僑 王啓明

一九八六年二月

編者按：感謝王啓明先生的捐款，請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盡快訂閱。如果名額太多，我們將再向一些華僑募捐，凡寫信訂閱的公費生，早晚都能償願。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新加坡聯絡站成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新加坡聯絡站最近成立。

東南亞廣大華僑是歷來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中國之春運動開展以來，不少東南亞華僑慷慨解囊，支援我們的活動。廣大僑胞以親身經歷指出，老一代華僑逃出祖國，為的是逃避兵荒及內亂，近幾年移民海外者，則為了躲避專制制度。只有民主化才能救中國，才能吸引華僑大批投資。

現在，新加坡的僑胞不但在經濟上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而且組織起來，投入到實際行動中來，組成了中國民聯新加坡聯絡站。我們希望，有志于中國大陸民主化事業的當地華僑和中國赴新加坡留學生與聯絡站聯系。

新加坡聯絡站通訊如下：

P. O. Box 402

Mountbatten Road, Singapore 9139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



把中國之春辦得更具理性和建設性

中國之春雜誌面臨新的提昇

中國之春創辦三年多以來、為中國人能暢所欲言，開闢了一塊自由的園地。儘管困難重重，中國之春在海內外華人、特別是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支持下，不斷進步和改善，為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多元進行不懈的努力。當然，她也出現過偏頗、失誤和不理性之處。

前不久，中國民聯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制訂了更為理性的民運策略。會後，大家都希望中國之春雜誌在保持原來風格的基礎上，有一個明顯的提昇。那就是：多向中國大陸和台灣執政的國、共兩黨提出一些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和建議，用中國之春的影響力，在大陸和台灣發揮更為實際的作用。

應該說，中國之春在這方面曾做過努力和嘗試，也曾收到過一定效果。在兩年多前，中國之春雜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期上，我們曾呼籲北京政府進行價格體制改革、擴大市場機制和發展私人企業。去年二月，中國之春發表社論，主張農民應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和買賣權。最近北京官方透出的消息，將明文規定土地的承租權可以轉售。我們還通過很多媒介將這些建議轉達給了中國經濟的決策者。北京政府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某些政策，包含了這些建議的合理內核。我們也曾組織過許多愛國華僑團體和個人，去北京當面向共產黨建言，提出有關改革、祖國統一問題和體制改革的許多

建議，也得到了了一定的回響。

當然，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還需要大大加強。

中國之春雜誌創辦三年中，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早期是開創階段，中國之春創辦之時，在海內外引起極大轟動，文章多以揭露性和批判性為主，批判中央有建設性和創造性。由於很多文章的批判性較強，難免帶有感情色彩。

第二個時期是理性思索階段。中國之春的觸角所向，並不是哪一個黨派，而是中國現存的專制制度及相關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民族性。很多文章從現實政治和政策評論深入到文化層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國極權政治產生的種種相關因素。

值得提出的是，中國之春雜誌在這個階段，配合「中國民聯」的組織建設和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展，進行了理性的反省和自我批評，提出民主運動要從自身的民主修養做起。在此基礎上召開的「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獲得了寶貴的民主運作的經驗。

現在，形勢要求中國之春有新的提昇：上升到充滿建設性的階段。人們的認識提高了，人們的理性充實了，但是，如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如何在大陸和台灣造成實質性的影響？這些問題已經提到了議程上來。

對盲從者，路總在他的前頭；對探索者，

路只在他的後頭。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將民主的願望與理想轉化為現實的運作？

破壞容易，建設困難；批評容易，實際去改革困難。最近，一度曾令人們興奮的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在恢復派的壓力下，遇到了不少挫折。

面對這種局勢，每個中國人都會感到心憂如焚，感慨萬千。中國難道就富強不起來嗎？不！光感慨是不夠的，我們應冷靜地面對現實，擔負起改變中國的責任。中國之春在此發出呼籲：大家拿出建設性的方案來，都為中國的進步辦一件實事。您可以針對某一個政治問題：如梯隊接班模式、官僚體制改革等；也可以針對某一個經濟問題：如長江三峽水電站的修建、高速公路的規劃和金融外匯市場改革等，拿出您的智慧，提出您的見解。

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議論：共產黨卅多年來做得不理想，這點，用不着多說了；當前的經濟改革出現了不少問題，這亦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問題是：如果讓你去從事改革，去收拾這個爛攤子，你將如何去呢？你有什麼更高明的辦法呢？還有人議論道：批評當政者的錯誤之處，固然可以，但如果拿出比當政者水準更高明的方案，則更能吸引群眾的認同。

中國之春雜誌下一步就是要在上述問題上下功夫。我們寄希望於民運人士、廣大讀者和各方專家，拿出你們的水準來，參加到向海峽兩岸獻計獻策的活動中來。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六年五月號總三十五期·四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六年五月號總三十五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 社 論 ●

3 ■ 把中國之春辦得更具理性和建設性

讀者 ● 作者 ● 編者

6 ■ 關於「理性專制」的討論 (代文、張俠)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8 ■ 問答：有收入的留學生如何報稅？陪讀家屬打工問題

● 特稿專欄 ●

10 ■ 一切為了愛——赴歐雜感 (中國大陸作家·西德) 週羅錦

18 ■ 國民黨頑固派為什麼要推倒王炳章 (美國華僑) 艾仲華

20 ■ 對劉賓雁在北京發表聲明的說明 (本刊評論員·中國大陸留學生) 陳洪林

● 國內快訊 ●

22 ■ 重要進展：鄧小平重新評價周恩來 (國內) 柳平

29 ■ 為何減少大學招生人數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文思

● 民運報導 ●

26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 本期專題 ●

梯隊接班模式研討

28 ■ 三梯隊式權力轉移——鄧小平的突破與局限

(本刊責任編輯·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30 ■ 余英時教授談：從歷史角度看三梯隊式接班 (楊漫克專訪)

36 ■ 唐德剛教授談：中國的前途在於民主接班制 (楊漫克專訪)

40 ■ 中國大陸的政治繼承問題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主任) 楊力宇

42 ■ 第N梯隊——人治長鏈的伸延 (國內) 蕭平

中國民聯二大集錦 書面發言選編

44 ■ 中國民主運動面臨的困難 (中國民聯主席) 王炳章

55 ■ 為實現中國文化從一元向多元的轉化而努力

(美洲盟員·中國大陸研究生) 王策

編者的話

國內的高層領導人年事已高，權力轉移問題始終為國內外共同關注。鄧小平為使其改革政策得到延續，採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廢除幹部終身制；二是提出三梯隊接班模式。對此，本期組織了專題進行討論，海內外知名的學者余英時、唐德剛、楊力宇都提出了他們的見解。

近幾個月來，鄧小平在內部提出要重新評價周恩來的問題，此與高層轉移權力亦有密切關係。柳平的文章，對該項重要進展，進行了客觀報導及背景介紹。

遇羅錦，這個當代中國女權運動的先鋒，最近出國到了西德。她的「出國雜感」，生動感人，相信會深深吸引讀者。

研究生王策及政論家李玉的文章，都是理論性頗高的佳作，本刊特此推荐。

下期預告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政策最近有了調整，總的趨勢是緊了一些。下期將對此進行綜合報導和評論，這是關係到每個留學生切身利益的事，希望大家積極發表意見，踴躍投稿，截稿日期為四月廿日。

遇羅錦出國帶出了他的哥哥、著名的民運先鋒遇羅克烈士的名作「出身論」。值文革發動二十周年之際，本刊在海外將首次全文發表遇羅克的傑作，希望大家留意。

思想論壇

41 ■ 簡論鄧小平當前的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甘梨

70 ■ 歷史的脚印 (政論家·香港) 李玉

85 ■ 世界各國自由民主程度的評估：中國的位置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遼

91 ■ 中國民主之前途 (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 張 俠

台灣專欄

80 ■ 台灣、台獨與大陸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主任) 楊力宇

81 ■ 由「見光死」聯想到的 (台灣旅美學界) 凌天鳳

留學生園地

83 ■ 鄧小平的小故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遼整理

83 ■ 打工第一課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李豐

90 ■ 朝鮮戰爭與毛澤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袁大戈

民運策略

95 ■ 不要對共產黨採取敵視態度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江超明

僑社專欄

97 ■ 論美國人的民族性 (華僑·美國) 徐振青

文藝園地

39 ■ 我不祈禱 (詩) (中國大陸詩人·國內) 葉文福

84 ■ 沒錯！世界是一部童話——致遇羅錦 (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96 ■ 城市之夜 (詩) (中國大陸詩人·美國) 嵐之凝

43 ■ 雜感二則 (中國老移民·美國) 馬衛康



有「理性專制」的概念嗎？

看完貴刊二月號（三十二期）中董旭生、楚青原兩位先生對「理性專制」發出的警惕文章之後使我覺得大有為「理性」一詞闡釋定義的必要。

董、楚二君怕民主人士吃了專制獨裁有限容忍的糖衣，會軟了嘴，放緩推動民主的脚步，這是我所理解和同意的。但是他們在使用概念方面點錯了名，使「理性」一詞蒙受了玷污，這是敝人必須冒犯予以糾正的。「理性專制」一詞本身便帶有語病；就如「不理性民主」一詞，是在因果關係上說不通的。從專制走向民主，就要靠政治意識、制度的「理性化」。人與其他禽獸的最大不同，便是人「能夠具有理性」。除了天生白痴外這「能夠具有」的條件是與生而來，至於所具有怎樣的內容及其

程度則如其它知識，要靠後天培養才能獲得。人類的個人及集體生存，不似其他動物的只憑「本能反應」；除了少數時刻的「感情」衝動外，不時的須做「理性的選擇」。「理性」給予我們生存之道，也給了我們道德和價值的觀念。有「理性」，人與人之間才能夠溝通思想，陳說利害。捨此，則人與人之間就只有間接或直接的訴諸武力。間接的方法是法律制裁，直接的方法是槍桿。

什麼是「理性」？「理性」是從客觀的立場，認識人在精神、肉體上存在而各具需要的現實，從而探討個人或集體生命價值及解決生存條件的一種思想態度。簡單地說，其根本就是一「科學人生觀」。只是囿於宗教，蒙昧主義餘孽的淫威，知識份子唯物哲學知識原罪論的誘脅下，只敢把科學態度放在物質上打轉。在精神、哲學、政治思想上，不是交白書任憑宰割，便是掛免戰牌，打退堂鼓曰：「生命的意義和存在價值觀，不在科學研討範圍。」而少數諍言之士則由於看不透「人民」、「社會」、「國家」種種「團體利益高于個人權利」，這「皇帝的新衣裳」。

不錯，在摧殘理性上，宗教、唯物及唯心論者是同心協力步伐一致的。

我是個在六十年代末期來美的「中」留學生；在美國唸大學的一段，正是美國學生反越戰，中國學生搞保釣，校園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慷慨保釣易，從容愛國（黨）難。喜歡就事論事的保釣分子多被台灣當局列為左派；到中國大陸批林批孔時，又成為海外一廂情願者劃分界限的對象。我自己對「理性」思想觀念的追求和探索便是在這一段轉變時期中，目睹「高等知識分子」的盲從蠢動而開始的。作為一個工程師，我可謂不務正業，常去

翻有關政治、經濟及哲學方面的文章以尋求答案。但是所得的感想總是十分片斷及缺乏聯繫性——直到一次無意中，翻到生於歐陸，歸依美籍的近代女哲學家安·朗（AYN RAND）的「自私的美德」一書。雖然那時代我已接受了希特勒「不到三十不可論政」的誠言，心中還是驚喜不已。隔岸觀火了這許多年，不曾整理、訓練自己的思想表達成一體，加上久未提筆寫中文，頗有辭不達意之窘。在此，只有向對「理論基礎」有興趣或有主張的朋友們「野人獻曝」——請一讀安·朗女士對自文藝復興時期（原文函意是自黑暗時代非理性的「再生」。）迄今的哲學批判；資本主義應持的理論基礎及其君子愛財而能得之有道，道德觀；勞心者對人類文明，文化的貢獻及其應有地位的辯論；人權思想與均富主義，唯他主義（ALTRUISM）在因果律上的矛盾排斥性。

卡繆（ALBERT CAMUS）在反抗者（THE REBEL）一書上自序的話：「……這世界上，有兩種罪犯：由感情出發的罪犯及由邏輯出發的罪犯。由感情崩發的罪案，橫屍數具，流血方丈，犯罪者並不以為己是。而由邏輯導致的罪行，縱然骨堆如山，禍及千萬無辜，作俑者却恆以正義自居。他們藉哲學理論脫胎換骨，由預謀殺人犯，披袍戴髮儼然以青天大老爺自居。以前，在人生觀思想上有不解之結的人以自殺來超越現實；近代的精神懦夫則以殺人來歸罪現實……」

如果我們確定——幸福生活是我們的行為目標！那麼我們就必須認清我們的邏輯前提——個人權利的保障。不然，任何經濟、政治上的措施；從四化到統一問題，都終歸是由緣木求魚而至削足適履。

別忘了，把從君權神授獨裁下才爭獲的政

治自由捧了個大圈子，斷送給名不符實的人民專政極權的，不是大資本家，工會或所謂的工農群眾；而是知識分子。現實的常識往往比象牙塔上偏鑽出來的長篇浩論更切真理。就此停筆，敬請四方高明指教。

德州休士頓讀者 代文

論「理性專制」——

——敬答代文先生

代文先生大鑒：

多謝您從休士頓的來信。

您論點的中心，有一種基本的混淆：即對「理性」一詞的混淆。一個專制國家中的理性，與民主政治制度中的理性是大異其趣的。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必然得到錯誤的結論，認為理性的專制是較為民主的。

古典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對人性的特殊哲學了解上。西方的民主理論認為，人類基本上是自私但又是理性的。由於自私，我們隨時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由於理性，我們能制訂出一套合乎人性，而不是反人性的政治制度。由於這種政治制度，人人都具有最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個別理性的人相互制衡的結果，就是要符合「最大多數的最佳利益」，這也是民主的定義之一。

必須指出的是，使這種理性能夠奏效的，是它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政治力量的公平化。在政治民主中理性是良好的產物。在獨裁制度下的理性則完全另當別論。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好的方面可以說，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是一個「理性專制的國家」。「理性專制主義」一詞，見於

WALTER LAQUEUR 的評論文章，是指一個專制的國家已相當的成熟，因此在行為上也較為理性。一個專制國家在決策過程中講求理性，是它認為在經濟和社會上給予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對它自己有利。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好的趨勢。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經濟，到一九七九年，在實施了社會主義三十年之後，中國的平均國民總生產(GNP)只有二五三美元，和肯亞或蘇丹一樣。更令人寒心的是，三分之一的農村地區，平均國民淨所得一年不到六十五美元，比官方制訂的七十五美元基本生活費還少了十美元。也就是說，多達三億的中國人生活在最低標準以下——這是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明顯失敗。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目的是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更為有效。較為有效的經濟發展對共產黨有利。消費品的生產增加，人民比較滿足，政府的合法性也為之提高。「人民的鴉片煙不是宗教」，使人民群眾馴服的是市場。

「理性專制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專制國家不但有理性，而且還完全控制了社會。專制主義已經制度化，因此它能承受得起自由化。這種自由化的改革在某一方面來說是一種「理性的」，共產黨已經理性地考慮了利弊得失，認為改革對它自己有利。這方面所含的假定是，如果改革對一個專制國家的代價太大，黨會毫不遲疑的限制或取消這些改革。

因此，專制國家的理性，只是有益於獨裁國家利益的理性。這是因為政治權力仍為共產黨獨佔。缺乏民主的理性，只能永遠地為專制服務。所以我們有更多的理由擔心這種理性化的專制，因為它會變得更加鞏固和有效。

普杰桑大學政治學教授
中國民聯常委 張 俠謹上

不可讓理性專制穩定

接到第三十二期後，我便一口氣將之讀完。關於中國正在逐步走向理性專制一文，我的感觸尤深，中國人固有的傳統文化、民族性、再加上數千年專制制度影響，中國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走向理性專制不會是很困難的。而理性專制一旦形成並穩定下來，中國走向民主、多元的政治則非花更大的力氣不可。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讀者 陳省

勇士長存

我讀了貴刊有關魏京生近況的消息，心中如巨濤起伏，憤然不平。我想說的是大陸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十億人民，並沒有把這位勇士遺忘，人們在用沉默紀念和回憶他。記得三年前，我和一群大學同學小聚，有一同學說：「據悉魏京生給斃了，理由是他企圖越獄。」當時大家全呆住了，默然無語。半晌有人斟酒，建議為這位勇士、民主先驅乾一杯。大家全都不約而同地將酒洒在地上，停杯為他默哀。現知魏京生仍活着，乃將這件事情告知貴刊，想說的是人民並沒有忘却他，儘管他今天是階下囚，可在人們的心中他仍是勇士。

中國大陸留學生 王 問

留學生新移民服務台



編者按：最近，我們收到很多大陸留美同學的來信，希望本刊能幫助他們解答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種種問題。為滿足同學們的要求，我們從卅四期，新設留學生和新移民服務欄，凡是留學生和新移民所提出的任何問題，我們都將竭盡所能加以解答（或請專家解答）。今後，我們將加強為留學生和新移民的服務工作，各位有任何問題，請寫信給我們。

編輯先生：

我是剛到美國一個月的自費留學生，要五月份才正式入學，但我發現我所報名的學校不夠理想，但又不知是否可以轉學？如果可以，應該在何時轉學？有關轉學的規定是什麼？

答：可以轉學。但通常需要在簽證上所註

明的學校至少就讀一個學期，照規定第一學期不到原校入學，則學生身份即會失效。致於轉學的規則，只消在學期結束後取得成績單，然後憑成績單申請新的學校，在得到批准後，你將此情況通知移民局即生效。

問：我有一位親戚在大陸，她想托我申請來美唸碩士班，但她的托福考試成績是兩年前的，是否可以被接受？

答：一般而言，托福成績在兩年後便失效。但也有例外，如果該生是在美國，能夠接受學校的面試，表現出充分的英語能力，就有可能不再被要求參加托福考試。就你親戚的情況而言，她必須再重新參加一次托福考試才行。

編輯先生：

我持J-1簽證，剛來美國不久，在機場接到你們贈送的「中國之春」雜誌及有關資料，感到你們是真正為留學生服務的。現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們：我愛人持J-2簽證，她可以在美國打工嗎？怎麼辦理打工手續？我的一個同學家屬持F-2簽證，她可以打工否？

中國大陸赴美研究生齊志

答：持J-2簽證的伴讀家屬，可以在美國合法打工，但要先到移民局辦理「工作許可」，再到勞工局辦理「工卡」。持J-2簽證的人，一般辦「工作許可」較為容易。

持F-2簽證的人，辦理「工作許可」較為困難，但在下述情況下可能獲得「工作許可」：原經濟擔保人發生意外，如死亡、疾病和破產等，不能再繼續擔保。申請時，要向移民局提供經濟擔保人上述狀況的證明。欲打工的持J-2和F-2者，可通過配偶所在學校的外籍學生顧問處取得協助。要注意「工作許可

」與「工卡」不同，「工卡」一般指社會安全卡，以向銀行存款或辦理保險等理由即可申請，但不可用於打工。必須有移民局的「工作許可」後，「工卡」才可用於打工。

編者綜合：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美達數萬人，很多人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因而要向美國政府報稅。報稅是一個繁雜的工作，不少人並不熟悉。四月是報稅截止期，本刊特選了已在美國有報稅經驗的中國大陸研究生魏中民，向大家詳述留學人員在美國的報稅知識。

答：在大家拿到本期「中國之春」的時候，離填報一九八五年度美國個人所得稅表(U.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的截止期已經不遠了。美國的稅則每年都要修訂，與往年相比，今年的稅則變更很大，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新編制了一種專供外國僑民使用的稅表，適用於外國僑民的減稅規定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在此，我們向大家提供一些與留學生及訪問學者有關的注意事項，並列出必要的參考資料，以引起大家重視。

一、在填寫稅表(Tax Return Form)之前，首先要決定使用哪一種稅表。按照新規定，所有外國僑民分為兩大類：一是具有居民資格的僑民(Resident Alien)，一是不具有居民資格的僑民(Nonresident Alien)。前者可繼續使用以往所用的稅表Form 1040，Form 1040A或Form 1040 E2，後者則一律使用新的稅表Form 1040 NR(哪怕你已經收到稅務署自動寄來的Form 1040A或Form 1040 E2)。

二、關於Resident Alien及Nonresident

Alien 的區分，美國稅務署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有具體的規定，但對於以留學生或訪問學者身份進入美國的外國人，我們可以概括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 一九八五年底以前獲得「綠卡」(永久居留權)的外國僑民為 Resident Alien。
(二) 目前仍持有 F 簽證、J 簽證的學生、進修教師，及其家屬持有 H 簽證、L 簽證的接受業務訓練的臨時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持有 M 簽證的非學術性學校的學生及其家屬，都為 Nonresident Alien。

在一九八五年度內獲得「綠卡」的外國僑民需要同時填寫兩種稅表，一是 Form 1040 NR 1 是一般美國公民使用的 Form 1040，Form 1040 A 或 Form 1040 E2。

三、這次的規定明確指出，報稅人使用哪一種稅表與否有意日後取得永久居留權無關。因此 Nonresident Alien 故意繼續使用 Form 1040 Form A 或 Form 1040 E2 對取得「綠卡」毫無幫助，甚至有作弊逃稅之嫌 (見四、五兩點)。

四、對 Nonresident Alien 而言，家屬或子女 (哪怕在美國出生的) 不論是否與本人同住，都不再成為減稅 (Deduction) 的考慮因素。因此每一個必須納稅的 Nonresident Alien 只有 1040 美元的免稅額。如果夫婦兩人均有收入，應各自分別填報，在各自的稅表中減去僅與本人有關的免稅額。

五、對美國公民或 Resident Alien 而言，單身、已婚 (但只有一方有收入) 或夫婦雙方均有收入，其稅率是不同的。其主要差別在於起算點的不同。Nonresident Alien 在計算稅額時，所用的稅率表與 Resident Alien 的稅率表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查表之前必須將僅

適用於 Resident Alien 的起算零點差額 (Zero Bracket) 加還到自己的收入裏去。如某單身有收入的學生，其年收入為兩千美元，扣去免稅額一〇四〇美元，僅剩九百六十美元。作為 Resident Alien 是完全可以免稅的，但是作為 Nonresident Alien 還得加上單身納稅人的起算零點差額二千三百九十六美元，總數就變為三千三百五十六美元了，從稅率表 (見 Instruction for Form 1040 NR) 上可以查出他得交一百零八美元的稅金。

六、持有 F-1 或 J-1 簽證的學生或訪問學者，如其收入來源是本國政府或國際組織，作為 Nonresident Alien 是不必交稅的。但如果收入是來自美國的大學或科研機構，在某些情況下就可能要交稅，常見的情況有以下兩種：

(一) 如果提供津貼的部門能提供一份書面文件或公函，證明這份津貼是一種獎學金 (Scholarship 或 Fellowship Grant)，其目的主要是讓受惠者得以完成其學業及研究，而受惠者又是某一學位 (哪怕是 Bachelor degree 的候選人 (Candidate))，則不論這份津貼的數字是多少，性質是助教學金 (Teaching Assistantship) 還是助研獎學金 (Research Assistantship)，學生是大學本科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 還是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一概是免予課稅的 (Tax-exempt)。
(二) 如果這份津貼名義上也叫 Research Assistantship，但提供津貼的部門並不認其為一種正式的 Scholarship 或 Fellowship，或其主要受惠者是提供津貼的部門本身，或領取津貼者不是學位的候選人 (如訪問學者)，則這份津貼是應予課稅的 (Taxable) 收入。然而，對非學位候選人而言，如這種津貼確係獎

學金 (Scholarship 或 Fellowship)，則也能享受部份免稅，即平均每月可從收入中減去三百美元，這種部份免稅每人終生 (Life time) 只能享受三十六個月。

因此，以往口碑相傳的 R.A. (Research Assistantship) 年年可免稅、T.A. (Teaching Assistantship) 只可免第一年的說法已經不管用了。

七、對 Nonresident Alien 而言，新的稅則提供了兩項 Resident Alien 所沒有的「特權」，即：(一) 在美國以外的收入 (如在第三國的投資收入) 不必填報；(二) 在美國的銀行 (Bank)、儲蓄及信貸協會 (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 或信用社 (Credit Union) 通過存款所取得的利息不必填報。

八、一九八五年度有過收入的外國僑民，一旦身故，其配偶或代理人 (可以是其主管部門的上司) 仍需代為填報稅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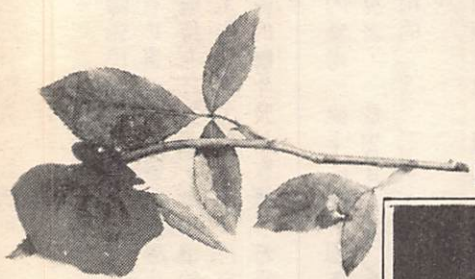
九、對一九八五年度內有過收入的外國僑民填報一九八五年稅表的最後截止日期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如受雇於一九八五年，但第一筆收入在一九八六年內收到，其最後截止日期為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如自己已經知道因某種原因無法如期填報稅表，可填寫 Form 4868 申請延期填報。

十、對 Nonresident Alien 而言，不論以往屬於哪個地區稅務署管轄，今年的稅表填妥後一律寄往費城的稅務署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Center, Philadelphia, PA 19255)。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除了美國個人所得稅之外，各州還有自己的州稅。各州有關州稅的規定相差很大，在此難以一一細述。好在州稅的稅表、項目較少，又無公民與僑民之分，也較容易填寫，這裏也就不多談了。

一切爲了愛 ——赴歐雜感

(中國大陸作家·西德) 遇羅錦



遇羅錦在西德暢渡「狂歡節」

爲了愛而寫作，爲了愛而生活，在愛所有人的願望中去學會愛、認識自由，並揭露自己的和環境中的虛假與偽善——如能做這樣的作家是多麼自豪！無論在國內和國外，這都是我永生追求的目標。

此刻，在赴往聯邦德國的途中，在火車上，在深夜裏，在這中國春節即將來臨的嚴冬，第三次國際列車總共只有五十八名旅客，而整節的「高包」車廂中只有我這一位，乘務員笑說：「成了你的專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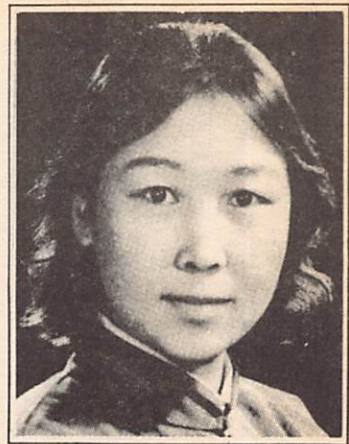
車已開了，自己仍覺得置身在童話之中。

編者按：遇羅錦，北京市人，現年四十歲，中國大陸作家協會北京分會會員。主要作品有：「一個冬天的童話」、「春天的童話」、「乾坤特重我頭輕」、「天使」等，其中尤以兩部「童話」拔萃，震撼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在大陸引起巨大的反響與普遍的爭議。

遇羅錦女士是著名民運先鋒遇羅克的妹妹。遇羅克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即從事民主思想的啓蒙與傳播，曾著文「出身論」，批評中共極左政策，後在一九七〇年被當時的「四人幫」槍決，遇羅時年僅二十八歲。

這車真地是往國外開去嗎？公安局真地不會突然出現在門口、抓我回去嗎？真地是要去西德嗎？這一切竟有這麼順利？車上有沒有便衣？爲什麼把我和他人隔絕，竟給我一個人一節「專車」？還是我的政治恐懼病在作怪？……

丈夫和弟弟送別時離去的影子，還在腦際中閃現；留戀、沉默的一瞥，含著那樣多使人承受不了的東西。恰恰是十六年前，站在車窗外，是我的父母，在送他們唯一的女兒，去千里迢迢的北大荒，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以此做爲全家落戶口的代價。家庭出身給我一



遇羅錦：我就是我

家的巨大精神壓力，從我學生時代起就受過種種的誣蔑和批判，中專畢業後又因日記而進了監獄，勞動改造三年，當過六年農民，四年的嫖娼和臨時工，為生活所迫，結過兩次無法從感情上選擇的婚姻……這一切，彷彿是另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苦顏中做出強笑的父母，彷彿仍站在窗外。哥哥遇羅克，只為寫「出身論」以及許多大膽尖銳的文章和日記，而被槍殺。文化大革命中，全家七口竟有六口在不同的地方被監禁。二姨自殺；姥姥在憂鬱中病逝；母親已於前年五月一日去世。死前的昏迷中，仍喃喃著「北京日報」對我的大版的批判：

「……批判……報紙……怎麼了？……」
這一切，彷彿是另一個世紀發生的事情：赴北大荒那時刻，我豈能想到，十年之後我會走上文壇？十六年之後我會去西歐旅行，做一位名副其實的海外遊子呢？一個童話！
始終生活在「童話」裏的我，舊的「童話」尚未寫完，新的「童話」又開始了。

我曾夢過，夢見流浪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遠離城市的喧囂，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自然的親切與撫愛中，回味走過的人生之路，寫

出一本絕妙的書。在臨死的前一分鐘，也許會躺在毫無人跡的山野裏，但心理是多麼寧靜和幸福呵。

然而，那僅僅是個夢。我從來不認為這輩子能會出國。因為從建國以來，打我懂事起，國內對於出國方面的種種規定，是非常苛求的。像我們這樣家庭的人，都屬於那「圈子」之外的最無法沾邊者。

如果沒有當今對外政策的開放，如果沒有波恩雅知出版社黃風祝博士和他夫人安娜的熱誠邀請，我那去全世界流浪的夢，就可能無法做。

那夢怎麼能再做呢？一九七九年以後，當「政治犯」的問題普遍被平反、基本過上了「人」的日子後，而我——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女人，却成了全國矚目、大肆攻擊的反面人物。只因爲離婚，只因爲在文學作品中寫出了心裏的話，便被宣佈爲「一個墮落的女人」——除了這兩條，誰也不知道「墮落」的其他內容。每一級黨委，從中央到地方——文化、廠、礦、企業，都看到了這期「內參」那顯赫的、令人爲之一振的標題和文章。而新華社「內參」的重要性，幾乎等於黨中央的文件。

西德已故的著名作家伯爾的中篇小說「被毀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只因那記者的歪曲性報導，卡塔琳娜便在氣極之下，用槍殺了那記者，不惜自己去坐牢。而我面對比她更嚴酷的現實，卻沒有任何辦法解救自己。

我的離婚案，全國「討論」了整整一年。北京的「新觀察」討論半年以後，上海的「民主與法制」又接著討論。所有沒見過我、不認識我的各界人士——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教授、家庭婦女……都可以向雜誌社投稿。除了我自己，人人都在爭論我到底幸福還

是不幸福，人人都在討論我到底該離還是不該離，人們在我道德品質的醜惡與非醜惡上，爭得面紅耳赤，以對我的態度，來顯現他們自己的道德面貌。不僅在國內，國外也有人罵我「不守婦道」。那位從未見過我、從不了解我的英國女作家韓素音，在公開場合大罵我「醜惡」。再加上對「春天的童話」和「求索」的兩次全國重要報刊的批判，一時給了中國人沉悶的灰色生活，驟增爲之一振的新鮮色彩。「新聞人物」僅僅是一時，而幾年來報刊上對我的批評和關注，就沒有間斷過。人們已鬧不清我是新聞人物還是作家了，連我也鬧不清自己。至於是我跟蔡鐘培結婚過婚還是那些討論的各階層人士和他結過婚？我也沒想過味兒來。這樣的女人，確實夠得上墮落了。

從此，我的名字，自己更加厭惡起來。對我名字的反感，其實早在「墮落」之先。那是少年時，有一天我無意中翻字典，查我姓名的三個字：「遇」——遭遇；「羅」——網羅；「錦」——什錦大雜燴，竟沒有一個字是完全吉利的。成人之後又淪爲「墮落」。因此直到今天，「遇羅錦」三個字，在國內外，至少有一半人，看成是「鬧離婚」、「亂戀愛」、「性解放」的代名詞。而「性解放」在中國，官方的宣傳和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理解，一直是和「流氓」無二。

假如我說，到今天，連最普通的交誼舞、迪斯科我還不會跳；假如我說：在性生活上，我還是半個白痴，並且也沒有天才來補上這一課；假如我再說：我和吳範軍結婚三年多來，房事竟無一回、情人也無一個、感情却日見加深的話，我敢說，連另一半不攻擊我的人，也認爲我在編「天方夜譚」。

我還沒有發現這世界上有哪個女人，自己

的「天方夜譚」故事，情節和諷刺性有如我這般奇特巧妙。

我整天有如騰雲駕霧，那雲霧是人們的唾沫星、議論和咒罵所集成。只覺自己越升越高，完全跑進了童話裏。即使對於那成千上萬、一貫支持我、誇讚我的人們，我也只能在心裏說：「最了解我的，只是我的丈夫，僅僅是他。」

人們在「性」上，潑給我那麼多的污泥濁水。其實，人們議論和咒罵的，遠遠沒有我自己寫得多。我從不想在作品裏把自己打扮成可愛的弱女子或是英雄。我揭露自己的毛病，反而成了人們咒罵我的證據。他們唯一不滿意的，是大概我還有十個私生子在外隱藏，而這一點竟沒有寫出。

久而久之，環境把我養成了相反的習性——他們越批判我，我反而覺得過去的作品實在太不大膽，確實有許多「隱情」尚未寫出。並且，無論是寫自己寫別人，都缺乏更高遠的愛的心懷，缺乏一種社會的宏觀與遠見；文筆貧乏還在其次。我對不斷的批判和咒罵，不但不再反感和氣憤，反而發現原來樂在其中、其樂無窮。這種變化，想想連自己也驚訝、好笑。

去年，我隨著名電影演員劉曉慶的「無情的情人」攝製組，去成都拍電影。三位大學生來訪，驚奇地對我說：「原來您沒離婚？前幾天我們法律系的老師，在講課時，還拿您當反面例子，說您和吳範軍剛剛離了婚，又有新歡了！」

「是嗎？」我簡直在高興。

「您應當去學校向他提出抗議！」

「由他去吧，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們驚奇地看著我。

「你們最好告訴他：『我們見著週羅錦了』

，她說她剛離完第九次婚，情人有三十個。」

用不著不解。因為這類情況對我來說，國內早已屢見不鮮。中國婦女聯合會和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以及高級法院、中級法院……：一說到「反對性解放」和「堅決不容許第三者插足、破壞別人的家庭」，就舉我做為第一個反面典型。說我的愛情觀是最無政府主義、最不道德、最損人利己的「童話」式的，是資產階級式的；說許許多多個幸福家庭，本來可以白頭到老，只因週羅錦這樣的話不知恥的「第三者」的出現，那些幸福秩序的家庭便全被破壞了。離婚，官方認為是對社會穩定性的破壞，是對模範道德標準的衝擊，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的、不考慮社會安危的、絕不能提倡的做法。據說那些完全可以不必離婚的人，在受著我的惡劣影響，說我的生活作風糜爛透頂。討論我離婚案的兩家雜誌，都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種討論影響極壞。兩位主編都做了檢查，其中上海的那位主編，不得不調離工作。因此我和第三位丈夫吳範軍結婚的喜訊，兩家雜誌和大城市的許多報刊，絕對不敢報導。只有雲南偏遠地區的一家小刊物，敢於刊登。這就是「求索」所掀起的從雲南省委到北京中央的第二場大批判，主編做了檢查，該刊連著批判了我三期文章，至今主編是否還在原單位？一直沒有消息。「春天的童話」所牽連到的副主編和一位編輯，也被迫檢查並被調離工作。只是在四次文代會後，「春」所涉及的副主編情況有所好轉，而別人的境況並不見佳。

時常有人找到我家，問我那些連我都莫名其妙的有關自己的新聞。但不外乎都是我在「鬧離婚」，又有了「新歡」、單位要「開除」我或被「監禁」等等。我只有笑置之。

是呵，連「墮落女人」的問題，法院都不

予以解決，人們的胡說八道又算老幾呢？如果是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我回回贏得上訴賠償費，如今早已是百萬富翁。那些並不了解中國內情的人，看到我對這一切誣蔑都置之不理，便以為我一定承認了自己的「墮落」。殊不知我寫的二十多次上訴狀，包括一全份反駁「內參」的種種的旁證材料，法院一概裝聳作啞，絕不為我去得罪要人、得罪新華社。完全是書投大海。由那種無邊的憤慨到後來的自得其樂，實在是性格上的不小的進步，我沒有看到自己的「墮落」，只看見在我的眼前和四周，人們墮落到什麼地步。

自從我認識了傻昧昧到結婚，他只使我的心情更加開濶：「你應當給他們每人送去一包甜點心，他們使你出了大名，把你捧成了英雄。」我摟著傻昧昧兔便親他的臉蛋。

「你可是當今名人哪！」或「哦，久聞大名，如雷灌耳！」——見面握手之中，說話的人，即使是尊敬中，也多少含著譏嘲之意，彷彿人人是靠著本事出名，而你竟是靠著「離婚」和「亂愛」！他們對這世界的可愛，理解得比我還要荒誕不經。

許多人愛看我的作品，並確實懷著某種敬意。但如果真地把我的名字和他們的牽連在一起，他們又顧慮和懼怕——或嫌這名字還有些不潔，或怕給他們招來意外的麻煩。作品雖然稱不上墮落，但作者尚未脫離墮落之嫌。正人君子怎好和墮落女人打交道哩？一個墮落的作者寫出並不墮落的作品，況且又寫的是她自己——這世界真夠滑稽。

明明和第三任丈夫過著好好的日子，國內却四處傳說已離完了第六次婚。似乎我應當姓「鬧」，改名叫「離婚」，這樣大家才能心平氣和。



遇羅錦和她的夫婿吳范軍

其實，任何誤解和害怕都是好事，它們能變成雲，使你升上去，從上面俯視他們。他們總在議論和琢磨你，這說明你的生命力沒有泯滅。

因此，總是想爲我「正名」、實在氣不過的張守仁先生——「十月」雜誌副主編、作家、翻譯家、善良之至的謙謙君子，中國文藝界、出版界、宣傳界全體公認的最規矩老實正派安份的男人，偏偏放著多少作家不寫，却非要寫我的「印象記」，打算在著名的上海「文匯月刊」上發表。他說，他整天接見中外著名作家和學者，每當一提到我，至少一多半人搖頭、撇嘴，他總忍不住爲我辯解，但仍效用不大。彷彿我應當是這樣一個人物——小鳳仙外加西方流氓。

因此，他開篇的第一句便是「四十不惑」（即：「四十歲的遇羅錦不會再惑了」），以爲這是對我的最美好的祝願與總結，也是向全世界人民做出的安民告示。他把我寫成一個擅

於理家、手脚勤快、熱愛事業、體貼丈夫、孝敬父母、婆婆、想念孩子的中國式的賢妻良母。他說多少人不知道我的「這一面」，他一定要從「這一面」爲我正名。

「好就好在，」他說，「這是由我來寫你呀。」

我却以爲：最規矩的中國男人偏要寫最不規矩的中國女人，這樣的話倒是文章的最好的開頭。滿篇應是諷刺嘲罵，說我多麼不夠人們想像的「墮落」味兒，著實不爭氣。然而他却採納我的建議。這位謙弱君子，反而聽了我的話大爲心酸，認爲我是在犯「變態」病吧。我又建議他應寫出我和傻昧昧兔的「反叛」，沒有這「反叛」，我們就無法結合。他說，若這樣寫，上面絕對不會通過，從另一個角度來「正名」是一樣的。這樣的「印象記」，我認爲實在還是不發爲好。我寧愛那虛假的「墮落」色彩，却不愛這真實的「賢妻良母」光環。因爲「墮落」中包含著反叛，「賢妻良母」中



遇羅錦（八歲）和她的哥哥遇羅克（十二歲）

只凝著死寂。再說，憑什麼「四十不惑」？我正想大大地惑上一場、一直在惑、還想惑到死呢！

理想、幻想，就是惑。沒有幻想便沒有一切。沒有幻想、理想，什麼也無法創造。沒有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惑」，又能產生哪一篇文學作品？我不但深深愛上了「惑」、早已把「惑」視爲生命，反而生怕失去「惑」，生怕與「惑」疏遠，生怕因沒有「惑」而成爲一具僵屍。

越愛生活，越愛人類，越愛事業，「惑」也便越多。沒有「惑」的人只好自殺。惑是我永恒的情人，從來沒有欺騙過我，反而會使我爲世界留下人人愛看的書。爲了「惑」，我願犧牲我的一切。因爲「惑」就是我的作品，我就是「惑」。爲了愛，爲了愛而創作。盡情大膽地寫真實，再沒有比這工作更神聖。特別是四處盡是虛假與謊言、人心膈膜的社會裏，這一神聖的工作，視爲比生命還重要。能在生前把所有的話說盡，決不死後埋於地下——再也沒有比這樣活著更痛快、更幸福的人。

有人問：「文學作品中的『我』，常常是作者塑造的典型，或者有著作者的影子，而你的好些作品，『我就是我』，這樣寫，你沒有想過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事實上，我已經顧不得想我自己會得到什麼後果了。自從遇羅克因「出身論」等文章和他的日記而被槍斃，自從那許多個烈士的鮮血匯成河以後，他們所映成的天空的彩霞，完全把我的心照亮了。誰都會承認：「我就是我」，要比小說裏只含有自己的影子、會給人以更強烈的感染力。再沒有比這種形式更直接、更鮮明、更大膽、更激辣、更會引起人們共鳴的了。烈士的妹妹，只有選擇最強烈的形式，才

對得起死者。當我寫書時，我僅僅是爲死人而寫，從來沒想過世上的活人。活著的人比起死者，都不配我惦記。這「活人」包括我自己。假如我再爲活人的世界而顧慮重重，那就無法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生活，那就無法使自己的生活內容比別人更豐富，那就對不起天空的晚霞——片片、朵朵的燦爛紅雲。

再說，啓蒙思想家盧梭，早有「懺悔錄」在先。事隔多年，後人竟沒能超過他的，不慚愧麼？

有人會撇嘴：「他也不見得寫出了他的全部！」

那麼請問：「說這話的人，你是否寫出了你的全部呢？」

世上任何事，只能比較而言；誰也無法說，自己已經做到了頭。

寫自己的人確實不多，因爲寫自己其實相當困難——光寫自己美、可愛而又給自己護短的作品，連編輯這一關也通不過。人們的眼睛比你自己還亮。就連那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不願做這難堪的事。變成小說——假名假姓，該多麼安全、隨意！不但寫自己、還要配相片，何必嚴肅再加嚴肅？「小鳳仙外加西方流氓」，竟比任何作家的寫作態度都嚴肅十分，這本來應該列爲新聞。但自己「新聞」了好幾年，這一條竟沒人發現，可見人類墮落到什麼水平。

諾貝爾文學獎應當再分設出「勇氣獎」，第一個得它的，當然應該是「如雷灌耳」的大作家週羅羅先生。

「我就是我」——走上了這條創作之路，實際上並不那樣筆直和容易。

一九七四年冬，我第一次把以往的「破紙頭」搜集起來，開始寫「冬天的童話」初稿時

，曾於開篇前題道：

「政治修明的年代，這本書出版了。也許，無數文藝評論上寫著『這是她——一個女孩子的遺作……』」

我買了一個乾淨素白的本子，握起哥哥獄中留下的那只黑杆自來水鋼筆，分秒不停地唸唸……那時，丈夫、戀人、孩子、家……都沒有了，儘管我還沒有從那場「惑」中完全清醒，可是，把它留在紙上的念頭是那樣的強烈。

「人生是一場孤獨的鬥爭，是行動的拚死的激情，在它背後意識不到任何意義或理由。人生裏，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說明、被改善或被挽救，也不能真正提出或解決什麼問題。在這個基本沒有信仰的世界上，人可以憤怒和死亡——作家作爲人性的保衛者，則傷心、無力地在人生的樊籬上觀望。因爲，他在耕耘他那金色的小花園時，也必須墨守他自己嚴峻的法規。藝術正如歌德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說的：它是個人想從全能的上帝的毀滅性力量下挽救自己的企圖。」

當初，我還遠遠達不到義大利評論家納米·達哥斯蒂諾所說的這種超脫態度。一九七九年，當我在原先的基礎上，真正地開始創作時，我是有私心的——想從孤獨中挽救自己，想喚起我家人對我的愛——那小時候十分熟悉的愛。多年來「左」的干擾和壓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實變壞了。也許一篇充滿著愛心的作品，亮出多年來未曾說出的心裏話，能感動他們，使大家重新融洽起來，毫無隔閡。

一半出於這樣的私心，一半出於對哥哥的敬意，便創作出了「冬天的童話」現在這樣的作品。

實際上，我不懂得，創作文學作品，是容

不得私心的。一個多年來受壓迫最深重的家庭，怎能比一般受難少的家庭，選格外地相親相愛呢？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曾因「左」的干擾而受到破壞，或者，只承認同事之間而不承認親人之間的關係受到破壞，那麼，我們豈不是應當繼續歡迎極左的政治運動，以便達到「博愛和睦」的大家庭世界嗎？私心使我違反了歷史的真實、自然的辨證。盡管寫出的都是真實的，並未摻假的，但因爲它「盡揀好的說」，從整體看，它便又不夠真實。恰恰是這迷人的愛的色彩，使許多人感動得下淚。到今天，評論者中還沒有任何人能夠指出這一缺陷。人們被那理想主義、相愛相親的家庭所迷惑，爲苦難中能有這樣美好的家庭而感動不已。

尤其當「春天的童話」把同一時期發生的一篇發表時，許多人受不了了。他們認爲「不美」。是呵，比起那溫暖親愛之國，這個家庭，怎麼忽然又這樣冷漠無情了呢？說它沒有真實感嗎？要是那樣，人們倒不會受不了了。

這是作者的錯誤。當我意識到「冬」的缺陷時，爲時已晚。好的都挑光了，只剩下一堆冷冰冰的東西，而這些無情的東西，在那個時代，恰恰又是能左右人們的行爲和命運的。畢竟在困難和重壓面前，絕大多數人，並不能做到巍然屹立。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在出版「冬天的童話」一書，而「乾坤特重我頭輕」（現附於「冬」一書中），是寫我哥哥一生的，又不便重覆兩篇中的內容，好端端的「天然一部書」，硬讓我拆成了三篇。

固然，作爲文學，「冬」像現在這樣存在也無不可。但，既然是「報告文學」，既然「春」已發表，又被「鴨綠江」今年四、五、六

期恢復原稿全文轉載過，那麼，再如此姑息「冬」，就是不客觀的了。因此，雖然在出版「冬」，我既高興又不高興。按一九七四年時那題詞的渴盼心情，現在出版了是令人驚喜的，值得慶賀的，它說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確實在進步，歷史的車輪無法阻擋；但我畢竟不是一九七四年的我了，我和時代一起在進步，却不能滿意「盡揀好的說」這樣的作品。我認為，只有把「乾」、「冬」、「春」三篇，融合在一起，並寫出過去所有不敢寫出的東西，站在高一些的角度去認識，才是真正的「童話」，才是能反映那個歷史時期的「童話」。論起來，「冬」是「期望之作」，寫它是存有私心的，以為光寫那些溫暖的東西就是好的；「春」是「失望之作」，敢于寫出人的不完美，認識到每個人物本身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每個人的一切都屬於社會，絕無私生活與公眾生活的界限。這比「冬」是個進步，但却已無法做到完整。而現在脫稿的「在中國，一個結過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是「無望之作」，任何期望、奢望、欲望都沒有，只知道作家應把自己置之度外，刻意求實地寫作。世上沒有為自己寫作這一回事，只有為了別人，才有藝術；只有通過別人，才有藝術。「作家」，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個值得尊敬的稱呼，就因為他（她）首先要做到完整地為他人而存在。只有力圖做到襟懷坦白時，才能為自己照亮所有的陰暗區域。寫作意在揭露，揭露為了改變一切應當改變的東西。用透明性代替每個人的秘密，主觀生活與客觀生活一樣，都將彼此完全提供、給予。那種不信任、無知和恐懼的矜持心理，要用文學之筆盡快掃光。一個人只有完整地為他人而存在，而他人也完整地為自己而存在，這樣才能建立真正的社會協

調。如果一個作家，在完整地談論整個世界的同時，却永遠不能完整地談論自己，那麼，要想贏得更多的讀者，乃是幻想。

從小時起，我一直盼望能看這樣一本書：用生動的語言，大膽淋漓地寫自己，不要為自己護短，並配上許多有趣的照片做為「插圖」，給人以真實、真實、更真實的感覺。然而，我始終感到許多自傳文學還不夠理想，那麼，就自己來做罷。

「在中國，一個結過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原名叫「一個大童話」。但新華書店發行局的老爺們，連把「冬天的童話」都當成「兒童文學」來認定，所以只好改一個又白又直的名字，以喚起那些從來不看作品簡介，只看書名的人的注意。

它寫的是三十九年來，我和我周圍人的生活。一個普通的女人，如何引起文藝界、法律界的軒然大波。這部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瀋陽出版社、河北燕趙書社都曾索稿，看過稿後都想出書。「華人世界」和「婦女指南」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登了作品的序言和一小部分文章。

我所以讓「瀾江」出書，是憑着幾年來發表作品的經驗，認為廣西省離北京是「山高皇帝遠」，編者要大膽得多，該社在一九八六年的新書預告中，已將此書放在頭版頭條并用最多的文字做了介紹。同樣一份手稿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他們已列入一九八六年翻譯計劃；可惜他們人手太少，譯得太慢，估計兩年也不會譯完，我們還沒有訂立出書合同。然而，我最希望的是先出中文本。

去年寫這作品時，尚不知自己能否出國，文字上也較粗糙。現既已身在波恩，又想在西歐長年流浪，也嚐嚐「海外赤子」的滋味兒，

則極想將這「獻給世界第一本書」，再重新潤色一遍，以便增添色彩。還覺得有許多感情內容，應再大膽地、淋漓盡至地加進去。

波恩市「雅知出版社」，是由黃鳳祝博士創辦的。他和夫人安娜，曾將我的拙作「冬天的童話」一書出版德文本。現已決定將「在中國，一個結過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一書，潤色加工之後，交由「雅知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在今年十月西德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書展上，將此書奉獻給世界各國讀者。作為作者，當然希望被譯成多種文字。有關出版事宜，作者全權交予黃鳳祝博士代理。

雖然「冬」與「春」譯有法、德、日、英文本（德、英文本僅譯了「冬」），雖然「冬」在國內被評為「當代文學獎」和「報告文學獎」又被莫名其妙地取消，雖然人民文學出版社已正式第一次出書，雖然我還發表過十幾篇、幾十萬字的文學作品，然而作者認為，這一切全不算數；唯有「在中國」，才是我的第一本書。

它要以愛所有人的願望和對自己的反思，來寫一個從兒童淪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墮落」女人的過程。她想告訴人們的，是她的一切以及周圍人對自由、幸福的理解與追求。

在國內出一本書，要長達一年半、兩年之久。文藝政策歷年來一直是緊張時多，輕鬆時少。況且，對於我這「墮落女人」的文章，上邊一直是格外注意的。有的大報社，竟從我要發表作品的雜誌預告中，根本不經雜誌社同意，硬把我的目錄刪了去，以表示他們和「墮落女人」所劃清的「界線」。

藝術家首先是以身為對象，深入到自己的內心深處，在孤寂與反思中，發現並寫出那些感人的東西。每一顆孤獨的心，都與多少顆

孤獨的心相連，無法分割又無法完全融合。孤獨的靈魂們，在幸福、迷茫與追求中，熱切地向往着自由和愛，在種種的滿足與不滿足中表現自己。作家發現的，正是那各個孤立的內心



世界裏，却又心心相印，休戚與共的感情內涵。每人心裏，都有一塊荒漠。它的大小，取決於你的人生態度。而我却只想這樣生活——

帶着希望和喜悅去開始每一天，相信所有夢想都會成真，在烏雲密佈的日子裏，記住天始終會恢復一片藍，感謝過去所帶給你的，高興地等待明天，在簡單的情趣裏尋快樂，例如別人給你的一句開心話，一個笑容和一點友善之心……設法在經歷中尋求領悟，安詳地讓自己一年又一年地老去，如果你能夠使另一個人快樂，給他援手和給他勇氣，或者說幾句令他歡欣的話，那麼年年你都會有美好的回憶，那兒有你一直與人共享的友誼。散文作家林燕妮草譯的小詩，正是「在中國」一書所沒有消失的樂觀精神。

把寫作間搬到了國外，沒有理由不大膽自由地寫作。我計劃在三個月之內，不但要從頭至尾潤色一遍，並要加進所有未寫出的內容。波恩的狂歡節是多麼令人難忘！我還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我們抽出一會兒工夫去一位德國女孩子家作客，她的名字是「皇后」的意思。在西柏林和波恩，雖然我見到了不少好房子，却不及「皇后」的最簡單的房子吸引我，害得我整夜都夢見了這間「童話」式的小屋，它太可愛了！

我幻想有「皇后」那樣的小閣樓，再好的別墅、正規房也不能吸引我，那傾斜、低矮的屋頂，使我像頓然進入童話中的境界，忘記了太廣闊無邊的世界，那屋頂上的天窗深藍中閃爍着星星，

幻想着王子突然從那兒下降。早晨的朝霞緋紅、清晰、嬌艷，我望望天窗便會愉快一天，接着又盼望着夜晚的星星和銀河。這樸素又樸素的房間，才能使我寫出樸素的文字，這傾斜、低矮的木頭屋頂，才能使我把滿天滿地的「童話」，凝縮於小小的紙頁。

唉！什麼時候，我能有一間童話式的小屋子？假如有一天我希望人們紀念這小屋，我就一定要寫好這本書。

於是又有人擔心，我出國之後，便會甩掉了丈夫。其實，若丈夫沒有吸引力，當然得甩。但我丈夫的氣魄和對我的吸引力，遠不為一般人所知曉。這次出國，除了我的好朋友黃鳳祝和安娜的熱誠邀請外，更主要的，是我的丈夫從來不認為，我們彼此互相屬於誰。他的胸懷少有的寬闊，把對我的愛，融於對更多人的愛中。自和他結婚以後，我第一次覺得不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社會、屬於世界、屬於願意幫助更多人的心境中。給別人愉快就是自己的愉快！傻眯眯溫溫和地眨眨眼，就把這一切都告訴了我，他什麼也不用說。他把我推向世界，推向自由廣闊的天地，推向勇敢開拓生活的路，又鼓勵我把生活變成勇敢的文字，如果他能看到這樣一本書，他會比娶上十個太太還要幸福、滿足。這就是迄今為止，第一個配稱爲我「丈夫」的人。

我多希望用自己的稿費和版權收入，爲他安置一個舒服的小屋，能在國外早日見面。我希望我永遠做他精神上的媳婦、只會寫書的媳婦，我真希望他再有八個太太。那八個太太每人爲他生一只小啣咪兔。我每天從帶天

窗的小閣樓裏，伸出頭來，向不遠處他和八個太太的住所——那八個小啣咪兔們致敬。八個太太若是吵嘴，則我是息事寧人的調解處。但不收調解費，可能反倒要倒貼些錢。每年我給八個小啣咪兔每人做一身小西服。也許還要管他們留學、深造的問題。假如我能以這種豁達的心胸來愛我所愛的人，這一生實在沒有白活了。

人們奇怪我為什麼叫他「傻咪兔」。許多人以為他屬兔。仿佛沒有封建古老的傳統——那十二屬性，人們便不能產生一切。面對問我他屬不屬兔的人，我心裏只能說：「不管你屬什麼，你已經是個熊。」

人們是多麼可笑，該聯想的反而不去聯想了。對於一個沒結過婚的「右派」、單身漢來說，非要娶「小鳳仙外加西方流氓」，還不夠傻嗎？他的一切都傻——總是無條件地樂於幫助所有他願意幫助的人。每天吃完午飯，他總愛說：「我要眯了呵。」於是就關上他的屋門，好好眯一小時多的覺。他的善良，在人類中實屬罕見，只能歸結到可愛善良的小動物之列。再也沒有比小兔子更可愛、更純潔、更善良的了。

漸漸地，我也被他薰陶成兔了。盡管我時時在人與兔之間猶豫、徘徊并被誘惑，却又不不知不覺被他吸引去。因此出國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忘在衣服的前胸，綉上個兔子的標誌。在火車上除了寫作、看書，并綉了四個滑稽可愛的兔頭。直到波恩、黃鳳祝博士尊照我的意願，跑了好幾個商店，才買到我滿意的兔子胸針。我高興地買下三種顏色的，立即把一枚別在領口，以示和人類的區別。

大作家遇羅羅先生四十年來發明了第一條格言：

「世上只有我和他這兩隻傻兔子，所以，無論誰跑到什麼地方，這一隻都不相信另一隻會變成人。」

雙腳一離開中國的土地，我便是兔子了。那個中國墮落女人的歷史，被甩在身後，永遠地結束了。但願我永遠不要再墮落成兔，永遠不要。

兔子是不會和人結婚的。

雖然有人極想加入我和傻咪兔的行列，但到目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誰算得上合格。

然而在國外，假如真地長年各國流浪，就不會有人說我「墮落」嗎？也未可知。好在，我已習慣在「墮落」和「童話」中生活；好在，我的懺悔方式總是比別人格外賣力——不但要對自己無情，還要配照片加以說明；好在，那和我一起「墮落」的角色，總是和我一起出童話式的大名。對於這樣的懺悔者，上帝會第一個予以原諒的。

我的出成人、代理人，我的好朋友黃鳳祝博士和他的夫人安娜，對我的支持，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的。人人都說外國人在錢財上的勢利之心，要比國內明顯十倍。然而黃先生和安娜不僅對於我，對於我親眼見到的其他人的無私幫助，也實屬罕見。他們為我的安心寫作，創造了不能再好的環境。「為了理想而做」——這是黃先生對我的鼓勵。「不要管成敗，我盡一切可能支持你。」除了我的丈夫傻咪兔，我還沒有聽到過這樣感動人的話語。

為了黃鳳祝，為了安娜，為了我的傻咪兔，為了國內外千百萬想看到我書的人，我要把那四分之三還沒有寫出的生活，在黃先生家全部寫完，在十月份的國際書展上，我和我的書，都想在那兒和各國的參加者見面并簽

字留念。我要送給全世界人民一個最好的禮物。為了愛而創作，在創作中學會愛。

臨行前，國內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古今掌故」叢書、北京的「十月」雜誌、上海的「長篇小說」和「紀實文學」、石家莊市的「華人世界」、廣州市的「家庭」雜誌以及其他刊物，有的發了我聘書，有的寫了信，希望我把國外的見聞、感受寫成文章，配上照片，寄給他們。并委託我向海外作家約稿。「中國現代書畫家協會」發給我特約顧問的聘書，希望我為他們在世界各國舉辦書畫展，做些聯絡、商議工作。「北京金山建築開發公司」發了我聘書，希望我代為聯絡籌資問題，他們在京郊風景區買下七十多畝地，可供觀賞的面積達二百公頃，建立中外人士皆可居住的渡假村，現已開工，但仍缺資金。一九八五年我不但在國內發表了好幾篇中、短篇作品，又有這些單位委託我重任在身，真童話假童話混在一起，小鳳仙外加西方流氓和現實的實幹家混在一起，不但要為別人辦事，還要寫自己的書。寫國外給我的新鮮感受，寫海外華人的奮鬥——無論是有成就還是沒成就的，寫這些海外赤子的歡樂、嚮往、苦悶與追求，寫他們真實的生活，道出他們最想說的話。做為作家、記者，這不但是她永不枯竭的創作源泉，也是她新生活的開始。

法國巴黎大學、西德魯爾大學，都向我做出了邀請，希望前去講學。香港中文大學也派人來和我談過邀請一事。美國、瑞士……等國家的朋友們，也希望我前去做客。用自己的愛心去擁抱整個世界，永遠為了愛而創作、生活！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北京第三次國際列車——波恩——狂歡節

國民黨頑固派 爲什麼要推倒王炳章？

一封值得引起警惕的信

(華僑·美國) 艾仲華

編者按：這是本刊編輯部前些日子收到的一封來信(署的是華名艾仲華)，現本刊決定摘要發表。艾仲華信從愛護中國大陸民主幼苗的立場出發，告誡中國民聯不但要防止共產黨頑固派的破壞，也要防止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語言之真切，令人感動。

的確，自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以來，她一直受到左右兩方面的夾擊。一方面，共產黨某些人極力把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往台灣

方面推；另一方面，國民黨某些人又一廂情願地把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往台灣方面拉。艾仲華的信，進一步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

我們始終十分清楚地認識到：獨立的政治立場是中國民聯的靈魂，是中國民聯存在的價值所在，我們要向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中國民聯的獨立立場。為了捍衛這一獨立立場，我們可能要付出代價，但我們決不拿原則做交易。

中國之春編輯部大鑒：

自三年多前中國之春創刊起，我就是你們刊物的忠實讀者。出於對大陸前途的關心，我一直十分注意周圍人士、特別是國共兩黨對你們的反應。由於我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興趣，我和國共兩黨都有些淵源，雙方都有我的朋友。近些年，中共方面對我「統戰」，台灣國府方面對我「拉攏」，真使我「受寵若驚」。在與雙方的接觸中，我時常瞭解到國共雙方對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看法。

共產黨某些官方人士對你們的貶低、污蔑和「三不」上外交政策，你們是清楚的。這點，你們也在雜誌上報導過了。

據我所知，國民黨某些頑固派對中國之春亦採取不諒解的態度，有些甚至加以嚴重破壞，妄圖把你們拉入到國民黨的反共陣營中去。對於這一點，你們似乎注意不夠。我寫此信，

想告訴你們一些我所知道的事實，並提醒你們，在時刻防犯中共保守派破壞的同時，也要注意國民黨頑固派的搗亂。

大約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份，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海工會)從台灣直接派來一位楊姓人士(真姓可能已隱瞞)。該人士在紐約與著名反共人士X X X聯絡後，設法與當時在中國之春總部的張偉和「中國之春」雜誌社的楊懷安等人接上了頭。他們這幾位多次開會密謀，中心議題是如何推倒王炳章。他們在紐約唐人街一家餐館聚會時，情緒甚爲激昂，竟然對密謀內容忘記了掩飾，以至被旁邊的顧客察覺。他們妄圖推倒王炳章的理由是：(一)王是改良主義者，不是徹底的反共派，仍對中共抱有幻想，王的目的是在挽救共產黨；(二)王不認同台灣，對國民黨也採取批評態度，令人難以容忍；(三)王的目的是在國共兩黨之

間拉起另一政治勢力，對台灣沒有好處。

張偉、楊懷安的政治立場都很親台，所以很快被國民黨極右派利用了。

後來，這幾位人士還策劃了推倒王炳章的具體步驟，策劃了取而代之的方案，等等。這些情況你們可能已經知道，也可能並不知道，或者知之不詳。無論如何，告訴你們是必要的。

當然，那次他們的策劃並沒成功，否則，你們也不會堅持到現在了。爲什麼他們的預謀沒有成事？據瞭解是他們這一伙人很快發生了內鬪，彼此吵翻了。另外，張偉被國民黨海工會邀請赴台參加了八三年的「雙十」慶典，等他返美之後，中國之春已改組了總部(編者註：張偉原是大陸留學生，一九八三年初曾在中國之春總部工作，被國民黨海工會「拉出去」後，被中國之春清除，詳見「中國之春」月刊

卅四期八十六頁。楊懷安原是大陸訪問學者，被國民黨海工會拉攏後，很早就離開了中國之春，詳見「中國之春」月刊卅期第十八頁。

雖然國民黨的頑固派策劃推倒王炳章的企圖沒有成功，但他們並未從此罷休。最近我得知，當早已離開中國之春的楊懷安去年（一九八五年）被台灣當局邀請去參加「雙十」國慶時，國民黨的某些頑固派又與楊懷安商討如何推倒王炳章。他們甚至問楊：「把王炳章搞掉後，有沒有人能夠取代他？」據說，楊懷安先生表示，他對搞掉王炳章的事並不感興趣，國民黨頑固派因此又未能得手。

我完全理解國民黨頑固派為什麼要策劃推倒王炳章。這是因為，國民黨某些人的心胸極為狹窄，他們的哲學是：「不是朋友，便是敵人」。王炳章先生在一系列場合都強調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當然不被國民黨頑固派所接納。他們恨不得在中國民聯中找個無名氏式的人物，宣佈擁護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以己見，中國民聯及王炳章先生想要扮演的，是大陸「黨外」的角色。台灣「黨外」的立場是眾人皆知的，那就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但絕不擁護共產黨。中國民聯的立場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是：變革共產黨一黨專制，但不必擁護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假如是真的要幫助中國民聯，那麼就應該離中國民聯越遠越好。

中國大陸的關鍵問題是缺少制衡力量，中國民聯在這方面只要能發揮一點作用，我們海外人士就應該支持，這就是我寫信給你們的原因。（此信可在必要時發表）。

海外華僑

艾仲華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留學生園地●

打工第一課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李 豐

交房租的日期臨近了。我來美後的第一個住所——這是冠冕話，其實是一間十平方米的老朽、漏雨的斗室——我的美國房东吉姆，用充滿狐疑的目光一日數次地打量着我：他懷疑我能否如約交付房租。

我確實既囊羞澀，遂與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兼售中西餐的飯館老板商定，在春假期間到廚房打工，每天四小時，共五天得七十五元，不無裨益。

一踏入廚房，即如陷身於阿鼻地獄。前日洽商工作時和氣可親的老板，綻起滿臉橫肉，活脫脫像個惡煞。他原說是以包春捲為主，及至進了廚房，却逕直引我到案檯前面，指着堆得如小山似的凍雞吩咐：「把皮全剝下來。」至於緣何而臨時變卦，老板是不屑作出解釋的。凍雞才自冷藏庫中取出，冰稜扎手，某些齷齪部位，令人睹之欲嘔。我只有橫下一條心，依令而行。事畢，又有許多髒活在等着我了。老板馭人方有方，絕不會給你片刻空閒。他身着白圍裙，自己亦動口動手，四處裏穿來穿去，頗似舊戲舞台上小飛娥。他命令我去剝那又是小山一般的拌沙拉的生菜，接着用手搖粉碎機攪碎洋蔥，搖柄一轉，辛辣汁水亂濺，眼淚簌簌而下。這種與內心情懷無關的流淚，純是一種生理反應，此中滋味，亦生平第一回領教。至此時，我已經幹得滿頭大汗了，但還得被

老板即興抓差去冷藏庫搬大桶牛奶：乍進冰庫，寒氣撲在汗流浹背的熱身上，渾身上下亂哆嗦……而牛奶桶被擠壓在諸多食品之下，只好逐一挪開，再提着牛奶桶出庫，然後返身進去將零亂之物重新擺好。這一冷一熱之後，幾乎不知人間何世……

更難忍受的是，同在廚房裏打工的幾位同事都不太地道，他們早年偷渡來此，無知無識，談吐淫穢；幾名青年男女抓住任何一個機會打情罵俏，亂吃豆腐，彼此一開口便是 MAKE LOVE(做愛)：有一次趁老板如廁，一名黑白混血女郎匆匆地打手勢請我過去，似有急事需要幫忙，待我走去後，她竟神速撩起前襟，誇示其酥胸，同時扮個鬼臉……當此之時，多人一齊爆發哄笑聲……

我泰然自若地領教了這一切。昔在中國大陸，我是父母的掌珠，一直過着養尊處優的優渥日子，却不曾料到會在美國這個人間天堂裏受這般磨難。然而，我深深知道獲取自由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因而受之如飴。當然，本人背井離鄉，萬里迢迢來美，決不是為了給老美送上門一名粗工，一個廉價勞力；在此打工僅是一時權宜之計，我將以這個陰濕、髒污的廚房為緩衝之地，贏得喘息時間，以便完成自己從童蒙時代就牢固確立的遠大志向。

打工第一課，甘苦寸心知。

大陸的根本問題在於

建立民主。實行法治

——就劉賓雁先生聲明所作的幾點說明——

●本刊評論員●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陳洪林

編者按：劉賓雁作品「第二種忠誠」中的主人公之一倪育賢於一月十七日飛抵美國。一月二十五日，中國之春編輯部及中華人權協會在紐約為他召開了「第二種忠誠」座談會，會中倪育賢道出了他來美的經過及劉賓雁受壓的內幕（詳見中春三十四期）。之後，劉賓雁於三月一日在北京公開表態，發表聲明。由中共的香港「文匯報」和北美「中報」三月十日頭版刊登。

劉賓雁的聲明全文如下：

鑒於倪育賢出國後頻頻發表不負責任的政治言論，我認為有必要發表如下聲明：

一、幾年來我寫了幾十萬字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各種文學刊物上發表。倪育賢不過是我所寫的許多人物之一；我同他的關係不超過作家與他的寫作對象之間的關係。因此，倪育賢無權以我的代言人自居；我對於他發表的任何與我有關或無關的言論，也不負任何責任。

二、最瞭解我的政治境況的，莫過於我本人。關於我在國內是否享有創作自由或受到政治「迫害」，最有力的證明是我的活動和作品。就當倪育賢在紐約舉行記

者招待會時，「報告文學」一九八六年一月號剛剛出刊，上面就發表了我訪問西德歸來後的第一篇關於西德的報告。在那裏，我一如既往自由地表達了我的政治觀點。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倪育賢發言之虛妄。

三、當一月廿四日我接到倪育賢從紐約打來的電話時，我對他的第一個勸告就是不要和「中國之春」發生關係。所謂「中國之春」這個組織，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我抵達紐約的前一天由王炳章宣佈成立的。他曾要求與我會面，被我斷然拒絕，這是我一貫的政治態度。

四、因此，倪育賢依靠一個我所反對的政治組織呼籲什麼「海外作家與文藝界人士發表文章支持劉賓雁」就純屬嘩眾取寵之舉了。

五、總之，倪育賢只能代表他自己。至於他是否如他所说，「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那要由他言行效果來證實；而迄今為止他在美國的言論與行動，却表明他站到全然相反的立場去了。

劉賓雁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於北京

自「第二種忠誠」主人公之一的倪育賢先生突然抵美，並在由「中國之春」與中華人權協會合辦的座談會上，出席作證有關劉賓雁先生受壓的內幕以來，「第二種忠誠」再一次在海外成爲議論中心，劉賓雁先生的處境更成了各界普遍關心的焦點。正當海外人士通過各種渠道設法幫助支持這位大陸最孚聲望，最具正義感的作家時，北京傳來了劉賓雁先生發表公開聲明的消息。讀完這篇聲明，我們的心情和許多海外華人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悲憤。三月寒風料峭的紐約頓時平添了一股寒意。

衆所周知，「第二種忠誠」在大陸內部和海外所造成的衝擊波已持續了相當長一個階段。在這一期間內，劉賓雁先生除了在私下裏承認處境不佳外，在公開場合從未披露過任何個人的所聞所感。這次劉先生對新聞界的正式表態，從理解的角度來說，自然和倪育賢先生證詞的內容有關，但從觀察的立場而言，該證詞的背後一定有極爲複雜的心理背景及與此相關的政治利害關係。倪育賢曾不無憂慮地談到，他的赴美之行會給整治劉賓雁先生的勢力找到藉口，現在這一擔心似乎已不幸成了事實。不管劉賓雁先生發表此聲明的動機如何，鑒於聲明的內容在很多地方涉及到了「中國之

春」，因此本編輯部認為有必要作出一些說明，以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誤解。

第一，本編輯部認為，我們與中華人權協會組織的討論會，是基於「中國之春」在海內外要求實施「民主、法治、自由與人權」的一貫立場，而沒有任何其它的動機和要求；「中國之春」對「第二種忠誠」的看法也正是出於這一立場，與劉賓雁先生、倪育賢先生個人沒有任何關係。

第二，本編輯部認為，倪育賢先生出席討論會只充分反映了他本人的選擇和立場，而且倪先生所持的基本觀點與「中國之春」追求的目標也是基本一致的。倪育賢在討論會上所作的證詞和見解，據我們的瞭解和擁有的全部資料，並沒有任何代表劉賓雁先生之嫌。倪先生所談的主要是陳述事實，這和劉賓雁先生在「第二種忠誠」裏所表露的立場並不衝突，況且倪先生完全有權利發表任何不同的意見。既然劉賓雁先生無意於否認過去已經發生的那些事實，那麼有關倪先生嘩眾取寵之說就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至於倪育賢先生在其場合所發表之任何看法，那和劉賓雁先生所創作的作品一樣都應該由自己負責。在這裏除了互相尊重以外，誰都無法決定和代表他人的立場，並為此負責。

第三，本編輯部完全接受劉先生在聲明中提出的關於作者與作品主人公關係的看法。但我們同時也認為，倪育賢事件在中國大陸的發生，並不取決任何個人的意志，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悲劇性，成了中國社會歷史的一面鏡子，也是同一時代一切正直中國人的共同遭遇。反映和揭示這段歷史應該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責任。「第二種忠誠」雖然只是劉賓雁先生的一篇力作，但它的內涵已經超

越了作者一般為民請命的良心，甚至超過了作者個人的認識。任何作品一旦成立，它除了反映作者的意圖以外，還有自己獨立的超越性。可以說「第二種忠誠」一方面是劉賓雁先生的作品，一方面又不完全是，這一點我們想劉賓雁先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第二種忠誠」所揭示的乃是一系列歷史事實，就是劉先生個人不寫，它也不會被抹煞和否認。有些歷史是不能被遺忘的！

第四，「中國之春」對劉賓雁先生目前處境的關注和呼籲，不是因為本編輯部與劉先生個人有什麼關係，也不因為劉先生個人對「中國之春」的看法而改變。因為從劉賓雁先生個人身上，集中代表了大陸政治體制下敢於發表獨立見解，批評執政黨這樣一批正直知識份子的奮鬥和心路歷程。因此不管是劉先生還是其它任何個人，他們在各個時期所遇到的壓制和逆境，不僅我們「中國之春」要聲援支持，其它國內外各界的人士和組織也有責任站出來講話。海外因「第二種忠誠」造成的劉賓雁熱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第五，劉賓雁先生對「中國之春」的意見，如果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本編輯部認為沒有必要加以評論。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信仰的自由，本編輯部將尊重劉先生的不同意見。我們還希望，在大陸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每個人都有權利和機會自由地、公開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真理只有在坦率地、開誠佈公地交流中才能愈辨愈明，同樣謬誤也只有理智地、平等地爭辯中，而不是在壓服中才會澄清。

第六，「中國之春」一貫主張，大陸只有開放民主，尊重人權和自由，以及實行法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過去像發生在倪育賢先生身上那樣的事，今天發生在劉賓雁先生身上這樣

的問題。否則，一兩個人的問題或許會由於某個人的良心發現，或某項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決，但只要產生這一切問題的社會基礎和根源沒有根本改變，它還會產生造就一系列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以往解決的問題也會由於某人政治生涯的變遷而被推倒重來。中國歷史上海瑞的罷官，彭德懷的革職一直到今天劉賓雁先生的處境，說明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不是多幾個「清官」「青天」甚至是「救星」的問題，而是制度變革的問題。因此我們鄭重呼籲，北京政府在目前經濟改革的同時，要充分認識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七，本編輯部強烈批評，台灣方面所作的一切不負責任的宣傳。從林希翎女士的台灣訪問，到倪育賢先生今天在美國的言行，台灣和親台的宣傳機構都不顧事實，一廂情願地稱之為「投奔自由」和「反共壯舉」。這種行為一方面是把別人當作一個籌碼，一種工具，只為了配合反共的政治需要，而不顧事實和他人的選擇。這種行徑還能奢談什麼自由和人的權利？另一方面這些做法，混淆了大陸內外的視聽，給大陸的極左勢力找到了誣陷、壓制反對意見的藉口。因此我們堅決要求台灣方面和某些別有用心之左、右派政治團體放棄種種不負責任、缺乏理性的做法。

最後「中國之春」要求北京方面停止對劉賓雁先生及其它一切知識份子所施加的壓力，賦予他們真正寫作的自由，立法保障他們發表意見和批評的權利，並正視海外各界人士對劉賓雁先生的呼籲和關注。我們還希望北京方面能從以往處理這些問題的過失中汲取經驗教訓。只有這樣你們才能得到人們的諒解和支持。本編輯部還藉此向劉賓雁先生表示敬意，並祝劉先生一切順利。

●中國大陸政情近年最重要的進展之一●

鄧小平重新評價周恩來

為胡耀邦接班掃除障礙

(北京)柳平



他們不是難兄難弟

沈圖垮台的原因

沈圖垮台了。這是北京打擊經濟犯罪以來揪出的最大老虎。

沈圖是中國民航總局前任局長。前年卸任局長後，沈圖組織了一家半官方的空運公司，自任董事長。

沈圖的最高職務是部長級幹部（民航總局相當於部級單位）。中國政府有很多部長，雖同為部長，但權力和地位大不相同。如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比衛生部長大得多。民航總局局長的職務，在部長級幹部中，是相當重要的。沈圖之前的民航總局局長鄭任農，就曾同時在空軍兼有要職。

北京揪出沈圖、做為打老虎的典型，震驚了北京的機關大院，沈圖畢竟是知名度頗高的幹部。

官方非正式透露的罪名是：沈圖以個人名

義將大批中國民航的公款外匯存在海外，並且會自動用過這批公款。此外，權威人士透露，沈圖在與外商洽談生意時，涉嫌受賄。

以喬石、王兆國爲首而受鄧小平、胡耀邦直接領導的中央直屬機關整風領導小組已下達命令，對沈圖進行隔離審查。人們甚至估計，不久將會把沈圖依法逮捕。

沈圖的經濟犯罪，中央已經認定。然而，經濟問題是沈圖垮台的全部原因嗎？

最近，中央組織部、航天工業部及民航總局大院中傳出風聲：鄧小平揪出沈圖，是在向周總理的遺留班底開刀，是鄧小平企圖拆散周恩來班底、爲胡耀邦接班鋪路的一個嘗試。

鄧要求重新評價周恩來

要弄清沈圖案的來龍去脈，必須了解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認識，以及鄧小平爲什麼近來提出要重新評價周恩來。

在去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全國特別代表大會前夕，鄧小平在一次範圍很小的預備會上，語重心長地提出了重新評價周恩來的問題。

鄧小平說（大意），周恩來同志在文革中說過很多違心話，辦過很多違心事，雖然他迫於形勢和壓力，但也對當時的形勢發展起了推動助瀾的作用。現在看來，很多話他可以不必說，很多事他可以不必做。周恩來實際上應對文革負一定責任。

去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一次小型彙報會上（小型彙報會是鄧小平一項重要的領導方法），再次就評價周恩來的問題，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明年（一九八六年）一月份，是周恩來總理逝世十週年，宣傳調子要掌握好，不要把周總理樹成一個完人，周總理不是一個完人

，更不是神。周恩來總理的一些做法，今後不能提倡，比如他講假話的問題。我們提倡講真話，不講假話。我們有些幹部跟隨總理多年，對周總理感情很深。周總理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比如勤勤懇懇的工作作風，但是他隨波逐流這一點，不堅持原則這一點，就不能學。現在，這麼多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和稀泥，對改革曖昧，也對貪污、犯罪的歪風邪氣曖昧，這是否受了周總理作風的影響，要研究一下。

今年二月份，鄧小平到四川老家過春節，在接見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時，又提到周恩來。他指出，周恩來應重新評價，他說過很多違心話，但有些話也不見得是違心的。對評價周總理，現在不能大搞，只能小搞。將來我們這一代人都過去後，才能搞清楚。

透析一下這幾次內部講話，可發現其中心點有幾個：

- （一）周恩來應對文革負部份責任；
- （二）周恩來的某些作風不可取；
- （三）周恩來式的幹部不可要；
- （四）重新評價周恩來要謹慎。

鄧重新評周之背景

爲什麼自去年以來，鄧小平幾次在內部提出重新評價周恩來的問題？中央高級黨校的一位負責人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一九八六年是文革發動二十週年和文革結束十週年，在否定文革的聲浪中，提出周恩來要爲文革負一些責任，容易被一些人接受。

第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當前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一些高層決策者，對鄧的改革持

存疑、甚至反對的態度，給改革設製了很大的阻力。這些人當中，相當一部份人是周恩來的遺留班底。打破了周恩來的神化形象，可以使這部份人喪失凝聚基礎，進而削弱他們的權力，給改革開路（此點後面再分析）。

鄧是周恩來系統的人嗎？

有些人一直有誤解，認爲在文革前鄧小平是周恩來系統的人。其實，文革前，周恩來主掌國務院，鄧小平主掌中共中央書記處，並非屬於一個系統，從派系上講，鄧小平並不是周恩來的人。

文革前，周恩來的國務院派系有如下主要幹部：

- 李先念：副總理，財政部長。
 - 李富春：副總理，計委主任。
 - 陳毅：副總理，外交部長。
 - 聶榮臻：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
 - 賀龍：副總理，體委主任。
 - 余秋里：石油部長，小計委主任。
- 除這些骨幹外，周恩來派系還有一些部長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却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關係極爲密切。書記處統領的重要人事幹部則有：

- 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 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長。
 - 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 林楓：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
 - 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 宋任窮：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
 - 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 等等。

在思想路線方面，鄧小平較有主見，也較能堅持己見。鄧小平對周恩來不堅持己見始終存有看法。例如，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和鄧小平力主「包產到戶」，周恩來一開始表示同意，但當他瞭解到毛澤東極力反對時，周恩來態度即發生轉變。對此，鄧小平對周恩來是不滿的。

鄧小平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是黨中央的日常辦事機構，周恩來的國務院是國家政府的日常辦事機構，兩者的權都很大。按照黨領導一切的原則，黨中央書記處甚至有着更特殊的權力。文革前，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的磨擦與不和，在書記處及國務院高層間，並不是什麼秘密。

一個十分重要、但未引起人們充分注意的現象是：文革初期，周恩來利用手中的權力，保護了一些老幹部，包括上述的李先念、李富春、陳毅、余秋里、聶榮臻和賀龍等（賀龍雖最終被整死，但周的確費了不少氣力保護他）。然而，上面列出的鄧小平、劉少奇黨工系統的主要幹部，周恩來幾乎一個都未盡力保護過。安子文後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的人，實際上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合伙整倒的。換言之，安子文等認為，當年整倒劉、鄧所謂的一「走資派」，周恩來是積極參與的。

總之，文革前及文革中，周恩來與鄧小平並非屬於同一派。

周恩來派始終有權

劉少奇、鄧小平及其所屬系統幹部的權力，在文革中被剝奪殆盡。

周恩來國務院派則相反，他們在周總理的大傘下，始終掌握着相當一部份權力。例如周

恩來愛將李先念和余秋里，在文革期間不但始終未垮，權力反而增大了。

此外，周恩來利用他巧妙的政治手段，在文革中還拉起了另外一個新班底，以彌補國務院中靠邊站的人。這個新班底，一直維持着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這個新班底包括下述一些要員（所列職務均為文革期間的職務）。

方毅：科委主任。

姬鵬飛：外交部長。

姚依林：協助周恩來主抓經濟。

陳慕華：對外經委主任。

谷牧：協助周恩來抓基建。

葉劍英：國防部長。

李震：公安部長。

耿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此時

劉、鄧的黨工系統已被摧毀，由周恩來領導）。

沈圖：民航總局局長。

這個新班底再加上原有的李先念、余秋里，形成了周恩來很強的權力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周恩來的愛將們，在四人幫、華國鋒垮台後，都在周恩來的大保護傘下保留下來，而且繼續擔任要職。直到現在，方毅、姬鵬飛、姚依林和陳慕華等，仍是有一勢的一個大派，還握有相當的實權。

鄧小平二度復出之謎

一九七四年，鄧小平在林彪垮台三年後，二度復出，重新當上國務院副總理，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鄧的這次東山再起，令很多人不解其意。

一種外界流傳的說法是：鑒於當時的國民

經濟混亂局面，周恩來向毛澤東力薦鄧小平，讓鄧小平出來收拾局面。這種說法，是不真實的，可能是總理派的人在鄧小平重新掌權後，故意散佈的。

實際的情況是，一九七四年鄧小平的二度復出，是毛澤東自己的主意，是毛澤東說服周恩來，才讓鄧重反政壇。周恩來對毛重新起用鄧小平，開始大表疑惑，甚至有些不太樂意。隨後，聰明的周恩來立即領會了毛的意圖，他再次服從了毛。

毛的意圖是，起用鄧小平，並用鄧牽制周恩來。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林彪的勢力已垮，周恩來的勢力極度膨脹。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四人幫又不能成氣候，他們甚令毛澤東有些失望。毛想到了鄧小平，想到鄧小平的能力及他與周恩來派的恩恩怨怨。

不讓某一派的力量過度膨脹，而讓幾個勢力（至少是兩種勢力）互相牽制，是毛的一貫統治手法。林彪力量上升時，毛澤東重用李德生和許世友，並保存了周恩來的一部份班底，目的也在於此。

可是，毛沒有預料到，鄧小平重握令符之後，開始進行逐步否定文革、否定毛的工作。毛終於不能忍受，再次逐走鄧小平，而任用聽話的華國鋒。

從鄧小平二度復出看，鄧小平和周恩來，從來都不是一條船上的人。

留蘇派與總理派

現任副總理李鵬是周總理的養子，以他為首的留蘇派，是中國政壇上一支新興的派別力量（參見中國之春廿九期——編者）。周總理遺留下來的第一批元老總理派，如李先念、余秋

里、姚依林、方毅和陳慕華等，對總理的養子李鵬，都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基礎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留蘇派與總理派結合起來，是一支較大的力量，而他們又在陳雲的名下統一起來，構成了陣容強大的恢復派。

鄧要衝擊一下總理派

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復出並重握大權後，成功地打垮了「小四人幫」——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錫聯及他們的首領華國鋒。同時，鄧小平把他比較欣賞的胡耀邦的共青團系統推上了權力階層。

儘管凡是派大將紛紛倒台，對於總理派的大將，鄧小平却動不了他們（除了個別與四人幫瓜葛太深者）。這是因為，總理派的後面有一個大牌位——周恩來。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垮掉後，周恩來的形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愈來愈高大，以致連鄧小平在公開場合都不敢說周恩來一個「不」字。這樣一來，不少老幹部都以自稱爲是總理的幹部而驕傲，用總理做護身符。

如果李先念、姚依林、陳慕華等總理派的人都無保留地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政策，那就沒什麼麻煩了。可是，這些人偏偏對鄧小平的政策有相當大的保留，有時甚至公開表示疑義。比如，姚依林對鄧小平特區政策的挑戰，陳慕華對趙紫陽金融政策的疑義，都不是什麼秘密。

機智的鄧小平意識到，要想減少這些人對改革的阻力，推倒周恩來的牌位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於是，鄧小平在高層中吹了吹重新評價周



周總理的形象能否屹立千秋？

恩來的風。他並沒有一棍子把周恩來打倒，正像他沒有一棍子把毛澤東的神像敲碎一樣。他只要求「重新評價周恩來」，並定了一個基調：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是人不是神。這是鄧小平十分策略的做法。

想當初，鄧小平用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方法，迫使華國鋒的凡是派交了權。如今，鄧小平也想用重新評價周恩來的策略，迫使總理派的人在政策上做出讓步。

關鍵是安排權力轉移

在造輿論的同時，鄧小平還採取了實際步驟——把周恩來的愛將、總理派的沈圖揪了出來。人們在問，這是不是要「揪一懲百」？

鄧小平最關注的，是最高層的權力轉移問題，即：他想把權力順利地轉移到胡耀邦、趙紫陽手裏。要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消除胡、趙聯手接班的阻力，消除胡啟立——胡耀邦的繼承人——接班的阻力。在這方面，鄧小平顯然擔心總理派會製造阻力和麻煩，而把周總理由神降到人的地位，就成爲必做的事情了。說得再明確一些，打散總理派和李鵬派，對胡耀邦——胡啟立的順利接班，將大有裨益。

艱難的一步

不容否認，在注重倫理道德的中國，周恩來總理的形象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很高的。在總理派的遺留班底中，周恩來的完美形象，更是凝聚力的中心，不容半點兒置疑。這些人將維護周恩來的形象，視爲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命根子。據聞，鄧小平重新評價周恩來的建議（雖然僅是內部的重新評價），已使總理派大將們神經緊張。有意無意地進行抵抗，是預期的。另外，李鵬等人，會竭盡全力地維護周總理的聲譽，因爲養父的牌位一倒，養子的權力地位就要動搖。

可以想見，鄧小平在打好「重新評價周恩來」這場戰役中，將遇到比推倒毛澤東神位更大的困難。弄不好，鄧小平只能打打外圍戰，而無法打一個漂亮的殲滅戰。

無論如何，鄧小平想重新評價周恩來，是海內外觀察中國政局的人，值得注意的一個重要進展和信號。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中國民聯分、支部籌備紀念 「四·五」運動十週年

國內民運人士籌備紀念 「四·五」運動十週年

今年四月五日，是天安門「四·五」運動十週年紀念日。

偉大的「四·五」運動，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鐘，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光輝的轉折點。「四·五」的響亮口號——「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開啟了中國走向民主的大門。

為紀念「四·五」這個光輝的日子，國內民運人士準備開展各種活動，表達追求民主的強烈意願。

中國民聯國內若干小組，早在今年年初，就對紀念「四·五」運動十週年，做了一些準備。屆時，在四月五日前後，國內民運人士，包括「四·五」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們，將舉行座談，條件許可時，還可能舉行集會。

為配合有關活動，中國民聯國內小組早已準備好了一批傳單，屆時將向外散發。傳單的主要內容有：「紀念「四·五」運動十週年！」「要四化，也要自由民主！」「要求把「四·五」定為中國民主節！」等。

為紀念「四·五」運動十週年，中國民聯海外一些分、支部正籌備開展各種活動，以表達繼承民運光輝傳統的決心。

各分、支部準備開展的活動有：

(一) 四月五日前後，在大城市的唐人街建一個臨時的「模擬西單民主牆」，在「民主牆」上，貼上大標語，以擴大「四·五」運動的影響；

(二) 在四月份，舉行公開的演講會或座談會，宣揚「四·五」精神；

(三) 在華人聚集區，如唐人街，散發紀念「四·五」運動的傳單。

紐約支部選出新領導班子

中國民聯紐約支部於元月卅一日召開盟員會議，根據新章程，選出了新的支部委員會。主任委員由中國大陸留學生李然擔任，副主任委員由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擔任，台灣留美研究生黃九被選為委員。三人進行了分工。

紐約是中國民聯總部及中國之春雜誌社所在地。紐約支部的盟員們表示要主動承擔一些工作，減輕總部和編輯部的負擔。紐約支部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是擴大宣傳，爭取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途徑，將中國之春雜誌和簡訊傳入國內。

中國民聯在紐約州大石溪 分校舉行講演座談

中國民聯於三月一日下午，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舉行了一場演講會。演講會由該校中國同學會主辦，多名台灣、香港及大陸留學生參加。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以「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形勢」為題，發表了演說。他指出，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績。然而，經濟改革自去年起，出現了不少偏差。由於黨內高層恢復派如陳雲、李先念、姚依林、胡喬木和鄧力群等人的發難，改革派不得不調整步伐，提出了較為保守的「鞏固、消化、充實、改善」的新八字政策。海內外均對中國經濟改革出現的一些混亂狀況憂心忡忡。

講演和座談在中國留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回響。數名留學生會後說，聽了王炳章先生的演講並閱讀了中國之春雜誌後，一掃過去北京政府給他們灌輸的「中國之春是叛國組織」、「中國之春破壞改革」的觀念，他們被中國之春的誠懇態度和關心國事的熱情所深深感動，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民主運動做些推動工作。

王炳章指出，一些混亂狀況（如經濟犯罪等）的出現，與不平衡的改革政策有關。「不平衡」主要表現在：經濟改革上去了，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改革跟不上。要克服這個狀態，有兩種辦法：或使經濟改革停下來，甚至倒退，以適應落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或進行

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相應改革，以配合經濟改革的步伐。王炳章表示，民運人士及廣大人民顯然希望後一種路線。否則，改革繼續處於不平衡狀態，更多的亂子還在前面。

王炳章認為，社會改革有三種途徑：（一）由上自下；（二）由下而上；（三）上下結合。王炳章希望中國的社會改革能循上下結合的途徑。

講演會後進行了長時間的熱烈討論。

當天晚上，王炳章博士以及陪同他前往的中國之春雜誌編輯楊漫克和陳洪林，與部份熱心的台灣、大陸留學生又舉行了座談，座談一直持續到午夜。

中國民聯在普杰桑大學演講

中國民聯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在美國華盛頓州托克瑪市（Toooma）的普杰桑大學（Puget Sound）舉行了兩場演講會。

第一場在當天下午，聽眾多為該校的教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以「中國經濟改革的今天與明天」為題，發表演講。他對北京高層不同派別對於改革的態度，進行了分析，並闡述了改革形勢的演變趨勢。這場演講由該校政治及政府系主辦，由正在該系任教的中國民聯常委張俠教授主持。

第二場演講在當天晚上，聽眾多為該校的研究生和大學。演講由該校學生會主辦，張俠教授對主講人王炳章博士做了介紹。王炳章的講題是：「從紅衛兵到民主主義者——我的個人體驗」。

在演講中，王炳章敘述了他積極參加文革——失望與迷惘——反省——覺悟——投入民運的經歷，使聽眾們極感興趣。這場演講，是

該校學生會組織的「亞洲問題系統講座」的最後一講，也是參加人數較多、反應較為熱烈的一講。前幾講的主講人包括美國前駐菲律賓、泰國大使等。

聽眾們紛紛表示，他們從王炳章博士的演講中，加深了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張俠教授則認為，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應加強在說英語的人群中的影響，以便爭取更大的國際支持。為此，中國之春英文版的出版，是非常必要的。的確，在王炳章先生演講後，聽眾們紛紛提出希望得到有關的英文資料。

中國民聯在華盛頓大學演講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下午，由中國民聯西雅圖聯絡站主辦，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在西雅圖市的華盛頓大學進行了一場演講，講題是：「中國民運的新發展」。

在演講中，王炳章先生闡述了去年九月份以來國內大學生示威遊行運動的起因、發展及前瞻。他指出，新近學生運動以反日愛國為旗幟，實際上包涵了爭取民主的合理內核。他說：「不錯，日本去年對華貿易賺了大筆金錢，中國方面出現了巨額貿易赤字。但我們要問：為什麼數十年前，日本和中國一樣落後，而今天日本却如此強大，中國如此衰弱？」王炳章回顧了日本和中國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和學習現代化的道路。他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學習西方時，不但學習先進的科技，更重要的是也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社會制度。反觀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領導人都只強調學習先進的科學和技術，而視先進的人文思想為大敵。王炳章呼籲中國的領導人不但要進行經濟改革，而且還要從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相應變革。他也希望

留學生們能擔負起改造中國社會的歷史使命。

中國民聯活躍於亞洲學會年會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一日至廿三日，美國的亞洲學會在芝加哥市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學術集會，數百名亞洲問題專家參加了這次盛會。中國民聯約廿名成員與會參加了各種活動。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和中國之春雜誌編輯楊漫克，從紐約抵達芝加哥，參加了年會。

中國民聯給大會帶去了大批中國之春雜誌和中國之春簡訊。

廿二日晚，由亞洲學會台灣研究會與全美台灣同鄉會合辦了一場「台灣未來十年討論會」。北京方面派出了中共中央委員、台聯會會長林麗韞等專程參加，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也有六、七名官員與會。

在講演之後的自由討論中，中國之春雜誌編輯、中國大陸留學生楊漫克首先上台發言，他問林麗韞等北京方面代表：你們能夠容忍國民黨和台獨，為什麼不能容忍中國民聯？我們很多人是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少是幹部子弟（楊本人即是），中共連自己的孩子們都容忍不了，怎麼能使台灣方面信服你們的統戰抱有誠意呢？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民主？林麗韞上台回答時，沒有正面答覆楊的問題，但她說，中國要向民主方向一步步地走，這是沒有疑問的。她表示，她對中國的民主前途表示樂觀。

自由討論十分熱烈，中共、台獨、親國民黨人士各說各話。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國民聯芝加哥支部的劉英最後一個上台發言說，現在重要的問題不是去搞什麼統一或台獨，而是推動兩岸的民主化！他的話，才是整個討論會最理想的結論。

三梯隊式權力轉移：

鄧小平的突破與局限

(本刊責任編輯) 楊漫克

第三梯隊——一個關係到中國目前改革與開放政策能否延續的問題，正日益受到海內外的注目，也引起了國際上中國問題專家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梯隊接班模式，對今後一段時期內的中國政局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對目前的改革政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本期以專題形式發表知名學者專訪文章和國內民刊的文章，就第三梯隊展開深入的討論。

北京「人民日報」二月十八日發表了一則消息：「幹部離退休制度趨於正常化，二百一十多萬老幹部，已有半數以上離休。」從數字上可見，梯隊接班的安排，在中國去年九月黨代會以後，正密鑼緊鼓地進行着。無疑，這是中共改革派為保障改革政策延續所採取的一個重大措施，對鄧小平以後的未來中國政局會產生難以估測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三十多年裏，權力一直握在年事過高的第一代共產黨元老們的手裏。權力轉移的問題，一直困擾着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時期從劉少奇開始，歷經林彪、四人幫、華國峰，一次次的權力鬭爭，一次次的宮廷政變，連黨章都改過幾次，終未解決

。鄧小平重新上台後不久，便先後提出了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接班人的問題，以求改革開放政策得以推行和延續。第二梯隊是對黨的核心領導階層所作的人事調整，而第三梯隊，將對更大範圍的共產黨中高級階層進行大規模的調整，變動之大，前所未有。

客觀地評斷，鄧小平這一政治手筆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它是對毛澤東、周恩來時代遺留的、共產黨六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臃腫老化的幹部制度一次大整頓。在中共現實歷史條件下，取得這樣有限度的突破，也是難能可貴的，我們應該充分加以肯定。首先，鄧小平第一次意欲廢除共產黨的幹部終身制（如部長、省長級幹部原則上六十歲退休），結束共產黨幹部老化狀態。在中國歷史上和傳統的文化意識裏，官拜終身、不死不離的習慣，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縱觀世界上共產黨國家，自蘇聯列寧開始，沒有一個領導人是自動退位的，或在權力鬭爭中被整下去，或老死台上，壽終正寢。老年戀政，病夫治國，已經給許多極權的終身制國家帶來弊害與災難。這種現象在中國不能繼續下去了。鄧小平為打破幹部終身制而

採取的「一刀切」的果斷措施，顯示了他的決心與政治魄力。此乃鄧小平一大突破。

共產黨雖由「五·四」時期接受了西方馬、列主義的一代知識份子建立的，然而由於長期從事農村武裝鬭爭，形成了具有小農意識的中層力量。建國後，這種力量迫害知識份子，大搞反智主義，使共產黨的知識化程度日益低下。鄧小平注意到若無知識，便無「四化」，大力提高知識份子的政治、經濟待遇，使知識份子從「臭老九」的無權階層，上升到中權階層，個別的甚至上升到特權階層。歷史證明，知識份子階層對政權的穩定與否具有高度的影響力。鄧將知識化做為選拔第三梯隊的標準之一，甚稱明智。此乃突破之二。

依附於強大官僚體制的一大批共產黨中層幹部隊伍，是當今改革政策的大阻力，胡、趙的任何一項改革政策，下達到這裏，就會被化解得無影無踪或者改變面目全非。這批毛澤東時期的既得利益者，思想僵化保守，工作能力和知識水準低下，第三梯隊接班，就是要取代這批人。不取代這批人，任何實質性體制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此乃突破之三。

從第三梯隊的素質上看，許多跡象表明第三代共產黨人，包括很大比例的幹部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衝擊，來自基層，頗瞭解中國問題之所在。他們沒有接受多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反而思想解放，具有很多西方民主政治要求和求實的自由經濟主張，對「四個堅持」不以為然。這批青年民主派力量，會在不久的將來形成與黨內保守僵化勢力對抗制衡的力量，並做為改革的前鋒，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此乃突破之四。

然而，儘管第三梯隊是一種長足的政治運作，取得了某些突破，這畢竟是鄧小平在特殊

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究其本質，梯隊接班的模式，既沒有建立起健全的接班制度，又沒有穩定的民主依托。從九月黨代會以後中共的官方活動看，老邁的「第一梯隊」實權人物並沒有真正交權離職。就拿政治局來說，五位常委，三位是八十歲高齡。中央軍委也仍然操在年近八十的楊尚昆手裏。要開中國幹部年輕化之先河，非鄧小平先生帶頭不可。從政治運作上看，梯隊接班仍是一種人治的、自上而下的交接方式，帶有很大的思想世襲和政權世襲的色彩。梯隊接班的缺陷在於：（一）沒有民主選舉。非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便沒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權力既非民衆賦與，兩者之間便沒有親合力。（二）沒有政治適應力。第三梯隊是在第一、第二梯隊提拔和保護下接班的。一旦這種保護消失，就會暴露出接班無能的各種弱點來，權力又復喪失。（三）沒有制度化標準。知識化、年輕化只是量體裁衣的辦法，既死板，又籠統，並不成爲一種制度。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西方現代文官制度，都是可供借鑒的。（四）沒有可靠的保障。領導看好，順我者上，必會給一些善於官場逢迎的政客投機家們開方便之門，造成黨風不正。同時提拔上去的領導人，只對前任負責，易形成上下對立，用不正當的手段來保持權力。（五）沒有反對派存在。梯隊接班，總要把權力交給與自己意見一致的人，極易形成政策偏差，也容易走向獨裁統治。

敬勸鄧小平先生，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若沒有民主選舉和健全的制度，任何一種交權模式都是無濟於事的。當年毛澤東搞「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十年中先後換過四個接班人，甚至寫入黨章，都無一立穩，最終還不是民主運動的力量，把您推上台的嗎？重

覆歷史的錯誤，只會埋下權力爭奪的禍根，造成人亡政息的可悲後果。只有尊重歷史經驗，汲取教訓，儘快搞出一個以民主方式產生領導

●國內快訊●

爲何減少大學招生人數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文思

不久前因事回國，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城市與鄉村。改革使許多方面呈現生機，尤其是在農村。「包干到戶」數年來使農業生產大有發展，農民生活普遍改善。北京的許多街道比過去寬，寬得使人每過馬路都要頗費躊躇，心裏嘀咕修建如此寬闊的馬路的必要性。首都有兩件事依舊：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冷若冰霜的售貨員。

大學食堂的伙食明顯改善，雖然比過去貴。朋友說，北京、西安等地學生遊行示威之後，黨政領導人紛紛來大學做思想工作。一方面，「上級精神」傳達：學生遊行是「背後有人」；另一方面，高校伙食也改善了。爲防止以後的學生運動，領導人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一九八六年高等院校減少招生人數十萬。理由是：目前在校大學生人數太多，高校後勤設施不夠，學生易產生不滿情緒。第二、在今後的大學生、研究生招生工作中要加強政治思想方面的考查，不能培養思想上反動的人。

對於上述決定，筆者頗感憂慮。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還很落後，大學生佔人口比例也很低。一九七八年開始，高等院校招生人數逐年增加，一九八五年通過的「七五計劃」還強調了這一點。然而，「七五計劃」墨漬未幹，就要減少招生人數十萬，「計劃

人的接班制度來，才能保證改革政策的延續，國家才能有一個長治久安的未來，您鄧小平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會是不朽的。

「成了一句空話。由此使人聯想到「計劃經濟」及其它方面的「計劃」的命運。不錯，國內高校目前教學設施不足、生活服務不夠，這是事實。但這不能靠減少學生人數來解決。解決途徑應該是一方面讓社會來爲大學辦後勤服務，而不要大學辦「社會」，即學校把師生的吃、穿、住統統包攬；另一方面，允許民間辦學，利用各種渠道的資金。在前一方面，政府目前還沒有要採取行動，讓「社會辦大學」的表示；而後一條路則已被堵死。今年元月份「人民日報」報導，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未經批准，任何單位、個人不得辦學校，但是並未說明批准的條件如何。

至於在招生工作中加強政治思想考查，不免使人想起文革。雖然可以肯定今後的政治思想考查不會像文革中的「政審」那樣殘酷，但這畢竟會給人心留下陰影，給一些關心社會的青年進入高校設置障礙。

不論學生運動的主張是否正確，學生運動是學生們關心社會的表現。在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共產黨曾經在抗日救亡與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學生運動中起過領導作用。今天的共產黨也應該保障民衆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的基本公民權利。

專訪余英時教授

從歷史角度談

中共「第三梯隊」的問題



余英時教授在耶魯大學

● 本刊記者 ● 楊漫克

被訪問者：余英時教授

訪問時間：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

訪問地點：美國康州耶魯大學。

被訪問者簡介：余英時先生，安徽潛山人，早年曾就讀於燕京大學，後執教於香港新亞書院。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GRADE AND EXERCITION IN HAN CHINA」、「歷史與時代」、「史學與傳統」等。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後，未經余英時教授審閱，文責由本刊負。「記」代表本刊記者，「余」代表余英時教授。

記：余教授，我們「中國之春」近期將就中共「第三梯隊」接班的問題，搞一期專題文章。今天想請余教授從歷史的角度對「第三梯隊」的政權交接方式加以評價。首先請您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上權力轉移的各種方式。

歷史上的權力轉移觀念

余：中國講改朝換代，總括起來，不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征誅」，一種是「禪讓」。征誅呢，是一個老名詞，就是「革命」之意，是誅最後的壞皇帝，如武王誅紂。另一種就是「禪讓」。還有異族征服的特別形式。從漢以後，一直到宋，每個朝代更換的方式，表面上，還是採取「禪讓」的方式。王莽接漢、司馬氏接魏都是禪讓。

記：但是其中有強制的成份。
余：是的，故我說是表面上。禪讓的禮儀

非常複雜，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小看它。禪讓的理論是：天命變了，掌權人要相應更換。

古代人還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天命。當人們認為天命已轉移到另一家去時，就會出現禪讓。能不能受天命，要看你有沒有德。所謂有德者，實際上是獲得了人心，或獲得有勢力的集團支持。天命不是不可測的，它可從老百姓的反映中測知出來。孟子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西方最早的猶太人也有這種說法，即「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PEOPLE'S VOICE IS GOD'S VOICE」中國人傳統上認為，天下不是哪一個人的，「唯有德者居之」。王莽即位以前，「漢書」(是反對王莽的)記載，他收到幾十萬封信，讓他接受天命。因為「天下一家，萬世一宗」這種觀念在秦漢時代還沒有建立起來，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禪讓制與天命論是有關係的。王莽之前許多大臣都爭論漢代是土德呢？還是火德呢？都認為應換朝代了。古人真相信這個，這是一種力量，所以皇帝有時自己要禪讓。

記：可見中國在古時候還比較理性的。
余：對的，王莽之前的皇帝和大臣都認為漢代天命已盡，所以漢詔書叫做「更始」，王莽的朝代叫「新朝」，也即「周隨舊邦，其命維新」(詩經)。故王莽在漢兵打到宮門口時還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奈予何」。可見他真是信天命。禪讓時一般要讓三次，前兩次都不能接受，第三次才能接受，可見這個觀念是存在的，現在看像是做戲，但古人也未必是做戲。

記：那麼禪讓有什麼意義呢？
余：禪讓的意義在於使政權能和平轉移，

轉移是以民心為準。如天下大災荒時，大家都認為是天怒了，人民就要起義，黃巾起義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個天的觀念一直到了清朝，皇帝下詔書還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所以皇帝再厲害，也要有所畏懼。故董仲舒說，天在上，皇帝為天子。而祇有儒家懂得天，於是儒家上書總說，天告你怎樣怎樣。

中國古時雖無「民主」這名詞，但有這麼一個觀念，就是暴君無德是可以誅之的，即 TYRANNICIDE。這在西方中古以後才有的觀念，中國上古就有了。

消滅一切地方勢力， 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記：那麼，中國為什麼未出現民主制度呢？

余：原因之一是中國未形成典型的封建社會。中國在形成大一統局面後，皇帝把地方的封建貴族都消滅了，地方官員都是皇帝派去的。地方勢力形成不了，沒有人能跟中央的皇權對抗。

記：現在也是如此。

余：是的。你看西方就不同了。民主怎麼出來的呢？你在英國可以看得更清楚，英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年，就是王跟諸侯之間的鬥爭，諸侯勝了，要對王有所約束，就產生了這個 MAGNACARTA，規定了國民的自由權利。有組織、有土地的貴族勢力，逼着中央勢力就範。後來中產階級起來了，加上宗教力量，各種勢力互相爭持不下，才走上了民主這條路。可是中國消滅地方勢力是很殘酷徹底的，於是形成不了對中央的壓力。

另外，中國沒有宗教勢力，而西方的宗教



五子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

勢力一直很大。最強盛的查理曼大帝，也對教會畏懼幾分。

歷史上，中國的改朝換代都要訴諸武力。但文人有了各種勢力的支持也行，俗語說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並不盡其然，秀才也有成功的，漢光武帝劉秀就是秀才，他在太學唸過書。

記：為什麼中國換了那麼多朝代，中央集權總是改變不了呢？

合理的人事制度促成了 中國兩千年的穩定

余：這正是問題所在，皇帝換了，少數大臣換了，但一般的行政機構不變。所以，改朝換代，只是改了少數，廣大下層、即官僚階層的人事制度和辦事人員，並沒有什麼改變。中國的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兩個層次，二者有距離：政治史是朝代興亡，但制度史一直沒有大改變，漢隨秦，唐隨漢這樣一直延續下來。到後來，國民黨繼承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承襲清朝衙門變了，底下辦事的不變。

記：共產黨也接收了許多國民黨的人員，如學校、醫院和一些城市職員，不過要「改造」，尤其知識份子，後來被「改造」得不成樣子了。

余：是的。共產黨其實搞了完全另外的一套，它不僅把政治史打斷了，也把制度史整個打斷了，一切都廢掉了。正因為這樣，造成了

今天接不上班的一系列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少見的。中國以往的穩定，就是因為政權更迭而政體與人事不變。中國既往的文官制度和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西方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從中國學的，只不過考試內容不同了。中國科舉是全面性的，考取的做政務官；西方則是考取做事務性的職業官員。

「第三梯隊」是歷史上從未 碰到過的特殊現象

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什麼「第三梯隊」這樣的問題，唯一說有這樣問題的，是明朝朱元璋。因為他接替元朝，出現脫節。明太祖是要飯的，當了和尚還要飯，不學無術。後來機會來了，混世魔王就混上去了。有趣的是，毛澤東與朱元璋很像，他的問題跟毛澤東一樣。毛澤東很多事上有意地學明太祖，什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之類。

記：對。還有毛澤東搞文字獄也是學朱元璋。

共產黨不相信人民， 才出現了接班難的問題

余：是的，毛與朱都殺功臣。朱元璋把功臣都殺光了。後來下詔招大學生，一招就是廿萬，就是以前的紅衛兵，每一人發一本語錄叫「明大詔」。當時祇要有這麼本書，犯了罪是可以減刑的。這就是中國皇帝語錄的起源。朱元璋那時的情形和毛澤東的文革一樣，他把人都清算光了，於是不得不用學生。但那時不存在老化的問題。

共產黨在革了近三十年的命，掌權上台之後，全面換班。共產黨不信任何人，一切權力都要歸共產黨。

記：共產黨革命本質是農民革命，有大批農民出身的幹部，沒有文化和政權管理經驗。

余：是的。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全面換班，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的

「第三梯隊」癥結

在於沒有制度

中國歷史上的官制是非嚴格的，例如說，有地域限制，如果你是湖南人，或甚至你的太太是湖南人，你就不要去湖南做官，以免徇私枉法。在歷史上，這叫做「迴避」。還有，如果我當主考官，我的兒子不能參與考試，以防舞弊。這幾十年沒人講這些東西，祇是說過去是封建亂世，實際上過去的官制比現在好得多，比黨棍們的政治文明得多。

現在共產黨元老們都太老了，因急於轉移權力，才想出了一個「三梯隊」的辦法。它的症結在於，這是一個沒有標準、沒有制度的辦法。

記：第三梯隊不是要年輕化、知識化嗎？

余：這是勉強的標準，主觀的標準。聽起來好像是客觀的，實際上做起來是量體裁衣。它沒有穩定的、制度化的標準。換句話說，共產黨沒有規範化的人事制度。其實，它的一切都還沒有進入制度化，連法律、行政都沒有制度化。

記：假如鄧小平現在年輕十歲，就不會提出接班問題了。

余：是的，行政沒制度必然亂。它發生兩個問題：一個是老人不肯下去，發生僵化，水

準也提高不了，效率越來越低，政治越來越腐化；第二要全面換容易引起政治不穩的局面。而且選擇人也是問題。任人唯親這話說不出口，所以勉強提出個標準，就是現在三梯隊用的幾個口號。

記：鄧比毛還是好些了。華國鋒上台靠毛說一句：「你辦事，我放心」，就行了，毫不掩飾。

余：是啊！其實中國自古制度是健全的，選人有一套辦法，上層鬥爭亂了，下層不亂，故延續了兩千多年。漢朝已開始考試，叫「選舉」，不是今天的選舉，而叫「鄉舉里選」，如漢朝搞人口配額，二十萬人的鄉舉一人，去朝廷當官，再選優秀的當大官。

記：噢！與美國的眾院差不多。

中國過去並不封建

余：是的，跟人口有關，這是機會均等，而鄉里來的人知道本地的內情。還有漢朝較重要的是「郎吏」制度。人才入太學，成績好的，做皇帝的侍衛，叫「郎」，在走廊上走着，見習中央政府管理制度；成績差的到地方上去，叫「吏」，做知縣等。從地區分配、本鄉選舉、郡里篩選後，到中央，還要考試，合格的人入太學，畢業後再考試。分配時還有好治的縣與難治的縣，成績好去難治的縣。只要有制度，就能公平。農民的孩子也可科舉當官，一般是小孩子種地，小孩子讀書。人人都有機會，所以階級鬥爭不顯著。中國人說「河東轉河西」就是這樣。讀書做官轉上去，腐化之後再轉下來，有機循環。中國其實并不封建，封建

必須世襲，中國祇有一家世襲，就是皇帝，不能選。當官則都憑考試。皇帝下詔派官，也要經大臣同意。宋太祖派個官，中書宰相不同意，頂回去。皇帝不是為所欲為的，和現在想像不一樣。有許多不成文法規，按先朝例子辦。

記：好像英美法系的不成文法。

余：是的，祖宗之法不可變，不考中個進士不可能當大官的。舞弊者砍頭，全家充軍到新疆去。

中國歷史上唯一用封建世襲制度的就是南北朝。而南北朝王謝子弟雖然地位很高，但實際行政權並不大，寒人還是能做官的。所以現在是民族精華丟了，外國的先進文化又學不來。

記：這是中國歷史，請問目前世界上大致有哪些權力轉移方式呢？

兩種政權的比較

余：目前很複雜。可以分兩大系：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民主又分總統制和內閣制。民主制度是不易建立的。現有的民主國家都不出西方文化的影響。英國雖還有女王，但英國的民主程度比美國高。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英聯邦獨立國家民主也都搞得不錯。

日本若不是美國佔領，麥克阿瑟強令執行民主，它不會是今天的日本。

總之，祇有民主選舉，政權才能和平轉移，這是人類文化的唯一出路。

另外一個制度就是共產黨的制度。它是看「一元化」黨的內部鬥爭，看哪個派能佔上風，衝突往往很殘酷。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是平穩接班的。第一到第二代最難。

記：在封建朝代不也一樣嗎？例如秦二世而亡，漢初諸呂之亂等。

余：這有所不同。過去，祇是家族、宮廷之亂，不會波及社會，不會影響整個官僚制度。今天在共產黨國家裏雖然是黨爭，但它是無所不包的，即所謂極權（TOTALITARIAN），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一塊，一亂全亂。中國歷史上的專制王朝也達不到這樣的程度，使每個鄉村、每個家庭、每個社會細胞都受到影響。說句不好聽的話，就像 CANCER（癌）細胞擴散到全國，把原有的宗教、財產、地方勢力全部破壞，不允許黨之外有任何勢力。

共產黨政權是難以穩定的

過去的傳統政治結構也有平衡力量，縣官到一個縣要受到各種勢力的牽制，因此，就要調節好地方鄉紳勢力。孟子講為政不難，只要不得罪豪門巨室就行。共產黨要消滅一切地方勢力，才能為所欲為。

記：您說共產黨如果延續幾代會不會穩定？比如蘇聯現在的集體領導就穩多了。

余：這要看它改不改了。蘇聯現在政權能穩定還是靠鎮壓！比如波蘭的工會，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它是歷史上第一次工人組織起來和共產黨發生衝突的團體。這在實踐上和理論上證明了共產主義的破產。共產黨國家不是能否穩定的問題，而是能否延續下去的問題。捷克、匈牙利的動亂不是什麼外部「右派」挑動的，而主要是知識份子搞的，波蘭則是工人搞起來的。

記：共產黨創業時建立的下層基礎好像快消失了，這是不是個不穩定的新因素？

余：共產黨和以前的國民黨很相像，早期老百姓對它迷信，現在它自己失信於民。其實共產黨成功，很大原因是當時知識份子一邊倒，因此，也可說是知識份子的成功。

記：當時城市知識份子的反內戰和民主運動鬧得很兇。

余：共產黨是先靠學生影響教授，再靠知識界影響工商界，資本家都變心了，經濟就崩潰了，國民黨才完的。所以共產黨革命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沒幾個無產階級，農民也是被捲進去的，是被動的，以後才越捲越大。農民有什麼政治意識！連馬克思都瞧不起農民，說它有反動性的一面。

記：請問共產黨政權的轉移是否都要經過政變？中共和蘇聯共產黨在這方面是一樣的嗎？

余：共產黨政權建立至今已六十多年了，每次權力轉移都要經過宮廷政變的痛苦過程。拿蘇聯為例，斯大林逝世後，先是貝利亞，後是馬林科夫，到赫魯曉夫還是穩不住，一個個垮下去，整整十幾年，才穩定下來。中國和蘇聯不一樣，第一蘇聯有非常極權主義的東正教為基礎；第二，蘇聯有暴君傳統，如恐怖的伊凡以及彼得大帝等；而且還有農奴制國家的傳統。中國就不一樣，唐以後貴族消滅了，貴族世襲就不存在了。

權威人物和信仰消失了

以後的領導者要靠改革

記：現在共產黨政權能得以維持，是靠既得利益，而不是靠信仰。

余：凡是歷史上當政者，創始一代有威信、有感召力，以後的領導者要靠改革，否則靠既得利益也是維持不下去的。和平時代沒有什

麼功可言，接班的人沒有人服。

記：不按制度接班，將來一定要靠非法手段來維護之，必然走向玩弄權術和腐化。這幾年共產黨說話越來越不靈，再靠毛澤東那套鎮壓的方法就不行了。鄧小平還有點權威，第二代、第三代沒有這種權威了。人民也不吃那一套了。

現在的問題是中共要變，但到底會怎麼變？中共會變得和今天的蘇聯一樣嗎？還是會變得混亂？

余：你剛才問將來會怎麼變，這個很難具體地預測。但一開放，與外界擴大交流，民主思想必然要傳播進去。像你們這樣的青年人，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代表。再有，中國的情況不會像蘇聯一樣，歷史一般不會重覆過去錯誤的東西，這是由文化傳統決定的。中共搞的社會主義與蘇聯的不一樣，就是由於文化傳統的影響。為什麼二次大戰時日本人有開飛機的敢死隊，有回勁恐怖份子，也是由於文化、宗教在起作用。美國人就無法理解這一點。中國的文化寄託於人文倫理，它比較和緩，但也可回到一灘爛泥的狀態，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所致，人民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所以可說是「長不大的中國人」。知識份子也一樣，比如梁漱溟罵毛澤東，毛澤東也狠狠地批判他，他還是佩服毛澤東（笑）。根本沒長大，別說出什麼思想家了。

中國需要精英知識份子

記：那麼說中國靠什麼改變呢？

余：我看還是要靠知識份子中的 ELITE，就是精英人物，要出一批卓越人物開明地領導，逐步走向現代化，一步跨不到民主的境界的。如果共產黨制訂一個制度，吸收社會的精

華，逐步改變自己的本質，也是一條出路。我並不贊成暴力革命，去推翻共產黨，因為那還會產生一個新的共產黨。我基本上反對人為的暴力革命，因為那樣解決不了問題，以暴易暴是不行的。你們民運如果用暴力的話，你們自己變成共產黨，雖然得意一時，但還會和共產黨有同樣的下場，沒解決任何中國的問題。你用暴力、流血、掉腦袋拿到的東西，你決不肯放的。菲律賓的馬可仕，如果他能預料得到他今天的下台，而早就在菲律賓實行民主，他可以是不可朽的。

記：中國民主的傳統很薄弱。

余：東方就是沒有民主傳統，民主是要有修養的，有氣度的，失敗了還要向別人道喜的。你心裏感覺是一回事，做假不容易，但也要做。中國哪一個領袖能做到？哪一個領導肯認輸？

記：所以我們提出多元化，希望能進而達到民主。

菲律賓的馬可仕下台，證明一黨獨裁是無法持續的。



余：這樣很對。社會各政治派別，各職業派別，各行各業都要有獨立性，成為多元，這樣自然會講民主了，誰也吃不掉誰。所以我認為有個台灣，對大陸是好的，有促進作用。大陸對台灣也有好處，你不會放鬆自己，亦必須搞好。國民黨是從失敗裏再生。

記：沒有大陸壓力，台灣今天的成就也不容易出現吧？

余：但國民黨內部也有問題，只是不像大陸那麼嚴重。台灣的中產階級已經形成了，民主程度比大陸要高，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不應十億人的事情樣樣都管，應該地方化

回到剛才的話題，多元化的確是個方向。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指鹿為馬，假的非讓你說是真的。共產黨要存在下去，必須改變自己，要放權。沒有人能管十億人，而且什麼都管。有時想想共產黨也很可憐，因為它背不起這個包袱，越搞越糟。其實中國許多事情是完全可以地方化的。

記：共產黨的專業人員、書記啦什麼的，全拿國庫開支，不生產，花人民的錢，這不就是一種剝削嗎？西方有哪個黨能這麼做？

余：黨是政治團體，祇能捐錢，怎麼能夠拿國庫的稅錢呢？沒法律嗎？我聽說大陸要黨政分開，看來也沒什麼希望。

記：四個堅持，頭一條就是共產黨領導嘛！

余：四個堅持就是一條：一黨獨裁，其餘都是假的，都是為了一黨獨裁。但這些年歷史證明是持續不下去的。

記：我正想請余教授從歷史理論的角度上，評價一下第三梯隊的問題。它類似於歷史上

什麼方式的政權更迭？

第三梯隊的方式帶有世襲色彩

余：可以說是很特殊的。它相似於科舉以前以家世為依據的時代。南北朝的所謂「上品無寒門」，共產黨今天只是倒過來而已。加入共產黨是靠他的階級出身來決定的。而當官的也沒有不是共產黨員的。直到今天還是全靠出身，美其名曰：「革命世家」。高幹子弟接班，它還不明說，搞一種變相的形式，一種變相的封建，這就是「第三梯隊」的本質。比如華劍英的兒子、陳雲的兒子就是這種情況。這樣搞封建世襲制度，和沒有實行科舉制度以前的情形一樣，等於回到了南北朝某一時期的落後形式的時代。在那個混亂時代，沒有辦法選人，也沒有人可信任，故只能找王謝家的子弟。

記：本質上還是以個人好惡，任人唯親。

余：以忠誠為準，忠於我就行。唐朝武則天有個姪子叫武三思，不搞馬克思主義，搞武三思主義：凡是對我好就是好人，對我不好就是壞人。但這樣總是不完全的，政權要有制度，怎樣應該昇遷，怎樣去懲罰，老官員離休後怎樣選人？你必須考慮，而且還要糾正過失。

第三梯隊的方式是沒有別的辦法

余：這就沒希望了。它不可能應付未來的變局，應付越來越複雜的世界。它搞梯隊接班是不得已，我也能理解，因為它沒有別的辦法了。我祇能說些同情話了。選賢與能？它怎麼選？臨時編不出制度來，一黨制限制了它，黨

內有這種落伍選人的辦法，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事。所以這只是一場不得已的交易。共產黨的僵化也是原因之一。三十多年來，共產黨年齡老大，知識和思想却沒有長進，還停留在延安時代。但密洞時代的世界觀是不能適用於當今電腦時代了。

記：您認為第三梯隊，包括第二梯隊，能保證在鄧以後開放改革政策的延續嗎？

余：在共產黨的主觀願望看來還是可以的。實際上，第三梯隊的選擇，中心標準是要保證改革政策的延續。但歷史證明，這樣的接班方式，會使某些反對派的野心家很容易就混進去，裝一裝就行了嘛！以後抓到了權力一反目，什麼都解決了。再者，這種接班方式選擇出來的人是職業官僚，他們是沒有觀點的。只要能爬上去，什麼觀點政策都行，有奶便是娘，無所謂，上樓梯的不倒翁，永遠是機會主義者，這是官僚投機的基本心態。鄧小平對這種人也是沒辦法對付的，我現在也很同情他。

毛病是毛澤東、 周恩來留下來的

鄧小平現在的改革政策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不得不這麼選一批接班人。但這不是個辦法，他應該使接班正規化、制度化，參考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以及西方的民主制度，搞出一個穩定的模式來，可以選上，也可以選下來。我還是說，不必過份責備鄧小平，毛病是幾十年形成的，是共產建國時就開始了：毛澤東的權術治國，周恩來黃老之術的明哲保身，積累下來的問題乃愈來愈大。馬克思講的是西歐情況，跟中國不相干。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從中國文化入手，你要是脫離了文化層面而只

從政治層面去談問題，你永遠是膚淺的。希望中國之春能注意到這個問題。

記：余教授您的這個觀點我很贊同，我們「中春」隨着對中國問題爭論的深入，已經注意到文化和民族性的問題了。

余：不深入文化層面就不知道中國是怎麼回事，得了什麼病？要開什麼藥方？搞全面西化，喊民主口號，喊幾十年有什麼用？民主并不是不好，但要知道怎麼能拿到自己身上來，急是沒用的。

記：我在編輯部也看到一些年青人的觀點，他們認為：第一，今天的世界已經融合為一個整體，文化的相互影響是很大的。第二，今天的世界已經形成這樣的發展速度，而且越來越快，以致中國不實行民主政治，就解決不了包括經濟在內的一系列問題，中國跟不上這個速度，它祇有掉隊，永遠處於落後狀態。所以現在不是問題的性質，而是問題本身的迫切性，是生死存亡，不是別的。現在好像沒有戰爭，沒有列強侵略，但經濟落後同樣也會亡國！為什麼大陸大學生要反日示威呢？因為中國要變成日本的傾銷市場了。

知識份子挑起擔子， 中國才有希望

余：是啊！不改變政治，許多矛盾就會激化。從長遠說，我們是一致的，但我強調穩健和實際。舉例說：伊朗的問題，王室要給人民民主，結果得罪了宗教，現在霍梅尼搞得極權。還是孫中山講的訓政的說法有道理，要經過訓政的階段，才能實現憲政。若實行憲政，因中國無中產階級可依靠，只能依靠「士」，如果知識份子挑不起這擔子，中國就沒希望了。

記：知識份子怎樣挑起歷史擔子呢？

余：知識份子首先要修養自己，學會民主，要自己去做，要能容忍批評，有雅量。這大概誰都同意，不過沒幾個人能做到。罵到你頭上的時候，什麼手段都能使出來。要讓不同的思想存在，這是唯一的辦法，基本的條件。如果知識份子都做不到這一點，我請問你，你怎麼希望一般的農民能有這樣的素質呢？這個過程要一步步來，不能跳過去。我最近有一部十萬字的書就是講這個問題。知識份子不是有知識就可以了，要有民主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統治者好，不必去捧，你不貪污還要恭維嗎？那是應該的，是責任。不對敢起來批評。所以說，知識份子社會的良心，要以天下為己任。中國從來是知識份子在鬧革命，像你們「中春」還是知識份子，希望你們這一代不要有老一代的幼稚病，銳氣容易導致左傾，但掌權後立刻消失，變成貪婪的權力慾，變成盛氣凌人的權威人格。這種人格在潛伏着，一有條件就表現出來，忘記了民主。權力腐化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人。華盛頓曾被幾個記者氣得要宰他們，他沒辦法，就得讓他們說，不能用權力壓制。所以現在在美國罵總統普通得很，中國就不行。

記：鄧小平就不行。西單民主牆批毛，批華國鋒可以，批他就不行，馬上鎮壓。

余：人的內心深處有許多很髒的東西，下意識的東西，有了權力就表現出來了。首先希望中國的知識份子能有所起色，鄧小平已看到這一點，他的第三梯隊就是知識化、年輕化嘛！總之都要靠新一代知識份子，新一代知識份子是什麼樣子，中國的未來就有可能是什麼樣子。

記：由於時間關係，就訪問到這裏，謝謝余教授對「中國之春」的支持。

專訪唐德剛教授

——中國的前途在於接班制

● 本刊記者 ● 楊漫克



唐德剛教授

被訪問者：唐德剛教授
訪問時間：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訪問地點：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被訪問者簡介：唐德剛先生，安徽合肥人，一九四三年於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詳見本刊二十期八十七頁）。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後，未經唐德剛教授審閱，文責由本刊負。「記」代表本刊記者，「唐」代表唐德剛教授。

記：唐教授您好。鄧小平先生最近提出了「第三梯隊」接班的問題。中國建國三十多年來在接班問題上一直很不穩定，世界上其它共產黨國家也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所以今天請唐教授從歷史和現實結合的角度，對「第三梯隊」接班制作一個評價。

「從上到下」與「從下到上」不同

唐：這個問題談起來很大，可以寫本書，我們受歷史學訓練的人知道，接班制可寫大本書。「新獨立評論」前一段搞了個民主座談會，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的前途在於接班制」，很讓大家奇怪。因為中國歷史上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權力轉移問題。人類歷史上產生民主政體不過三、四百年，以前像古希臘有點民主制度，其餘時間，權力的產生都是自上而下的。祇是近三百年才出現自下而上產生權力的現象。從生物學角度講，群居動物都有王。你看猴子，就有猴王，人也是「猴子」變的嘛！此外還有螞蟻王、蜂王、狼王等。

記：是的，這是生物領域內一個普遍的現象。

象。

唐：這些王幹嘛呢？維持群體的和平、安定。沒王就亂，散夥，絕種。人類也有這種本性。到了文明社會以後，王的更換成了治亂興衰的根源。中國以前講禪讓，講得很好聽，目的是維持權力的和平轉移。和平轉移叫治，不和平轉移叫亂。中國三千年歷史可以說一半治、一半亂，亂大多因為是接班制的問題。

記：好像歐洲也不例外。

唐：歐洲戰爭更多，全是王位戰爭，數不清。人的本性不好，你看蜂王、馬王都祇和異種動物衝突，而猴子就是要自己打架才產生王，所以古人和猴子差不多（笑）。

記：除了王位問題，還有封建問題吧！

唐：那也叫「建制」問題。早在秦朝，秦二世把他哥哥、長子扶蘇殺掉才當上皇帝，把接班制也搞亂了。漢代亦是，諸呂之亂。現在也一樣，群體沒王就活不下去，美國的總統也是選出來的王。

記：現在哪種制度搞得好呢？

西方的民主是用血換來的

唐：一般講，英語民族搞得最好，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接班制沒問題了，不管你是什麼國家，它都是治，而不是亂。反之，不管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接班制沒搞好，就亂，故這是個基本問題。中國今天搞的一套馬克思主義，沒顧念到基本人性。說實話我們讀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幹部要多得多。

記：應該客觀地、批判地對待它，而共產黨把它當成了宗教。

唐：對馬克思主義，我們應取學術研究的態度。關於接班制，社會主義國家沒搞好，法

語民族也搞得不太好，德語民族也不算太行，西班牙語如拉丁美洲也不行。

記：西班牙卡洛斯王子目前搞得不錯。

唐：是的。總之，英語民族別的方面并不出色，就是接班制搞得不好，從而強大起來。

記：英語民族為什麼能如此呢？大概是議會制度吧！

唐：這要從歷史上看了。英國以前專制得不得了。亨利八世，光老婆就殺了好幾個。你到倫敦塔上去看，殺老婆流的血跡還在，用的斧頭還掛在那裏，他最後一個老婆哀求殺她時不要開斧頭，用刀行不行？所以最後一個老婆是用刀殺的。

記：英國如何能變成今天的樣子呢？

民主接班的條件與時機

唐：這有三個因素：一是社會發展結果；二是傳統；三是偶然性（BY CHANCE）。從社會發展看，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產生了中產階級，與皇家爭權，我在一篇「國共是非談」文章中講到這個問題，我談到英國民主是怎麼搞起來的。我們時常聽到，英美人愛自吹民族優秀。我說是吹牛，其實歷史上他們比中國人野蠻多了。祇是近代出現了工業和城市，形成 TOWN PEOPLE，大家聚集在一起，教育提高了，才有後來的民主。我在那篇文章中說：現在的台灣就是十八世紀的英國。五十年代我在台灣寫政論文章，後來不讓我回去。雷震當時是頭，給送到牢裏去了。雷震和現在的黨外比，那沒法比，現在黨外太厲害了，國民黨也不抓了。雷震被抓是因為他沒有階級基礎，光桿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在的黨外是個階級，你怎麼抓？你敢抓？

回顧歷史，英國就是這麼起來的，英國國會議長叫 SPEAKER，他坐的那把椅子，頭七個坐過的都被殺頭了。他們的民主是血換來的，你知道嗎？民主不像慈禧那麼幹，什麼「下詔立憲」，那叫恩賜。國民黨叫做「行憲」，共產黨叫做「開放」，都是胡扯。雷震那時為什麼不行憲？因他沒有資格，沒有階級基礎。現在的林正杰，就有資格，你不能抓他，因有一個階級在那裏，你敢抓嗎？

記：社會發展是普遍現象，再請您講講傳統問題，中國的傳統很厲害。

唐：台灣如果不是大陸壓它，它搞不出來民主，這就是機會的偶然性。它沒有民主的歷史傳統。一般人講「民主法治」，我一向講「法治民主」，這兩者之間區別很大。英國的馬考利教授講現代歐洲有三個「R」，第一個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第二個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第三個是羅馬法（ROMAN LAW）。文藝復興，我們的「五四運動」就是。宗教改革我們不需要；但我們就是沒有「羅馬法」這種東西，沒有這方面傳統。

記：但是許多學者認為中國也有法，如商鞅、刑鼎。

中國有王法，沒有民法

唐：是，但有區別。中國的法是王法，是王定的，非民所定。中國歷來最大的「賊」就是犯上，國民黨叫「叛賊」，共產黨叫「反革命」，古代叫「反大辟」。所以說中國的法是保護國家極權的。現在鄧小平不是讓人規規矩矩守法嗎？

記：孫中山先生也講軍政、訓政後才能實

施憲政。

唐：我是批評孫中山的，國民黨恨死我了，他們認為老祖宗不能批評。國民黨其實是軍政，搞亂亂條例，就是軍政嘛！講訓政，國民黨自己先要受訓，現在黨外正在訓它嘛。孫中山講訓政不對，是皇權思想。慈禧太后也搞「五大臣出洋」、「下詔立憲」。說穿了，天下沒有哪個統治者願意把權力自動讓給別人的？毛澤東、鄧小平都一樣。靠自己打出來坐江山的人，都退不下來，騎虎難下。為什麼？殺人太多了，沒有權就沒有腦袋，他能退嗎？斯大林、希特勒都不能退，菲律賓的馬可仕也不能退。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現在都有四個保鏢。所以，民主不是放下來，而是爭下來的。

記：怎麼爭呢？

唐：首先把皇權架空，把極權架空，英國女皇現在就是大花瓶。第二要有自治的中產階級，台灣黨外不自治，給他民主也不會使用，所以李敖叫他們「黨外棍」，這是民族素養問題。日爾曼過去也缺少民主素養，論聰明沒有哪個民族可與日爾曼比。日爾曼中產階級也了不起，他就要出個希特勒。馬克思、尼采都是希特勒：真理就在老子手裏，老子一切都對，老子就要專政。這實際是宗教傳統，我講地球是方的，你說圓的，我就殺掉你。

記：您認為哪個民族比較具有民主素養呢？

統治者與人民都要有修養

唐：我回大陸時講過美國史，也講過接班制。我講，美國革命八年成功（一七七六一—一八八四），中國革命二十幾年，有一點相同：

都出了革命領袖。美國革命成功後，比中國困難，亂得一塌糊塗。有位上校叫尼古拉斯看不行了，就叫華盛頓出來做皇帝，稱他喬治王（KING GEORGE）。一來局勢太亂，二來有英國傳統，很多人不反對。但是華盛頓是個修養很高的人，他那時并不老，比我年青多了。可是他拿出一副眼鏡，對別人說，你們看，我都戴老花眼鏡了，我是個老人了。於是堅決不做皇帝。後來一七八九年搞出個憲法，華盛頓當了總統。其實當得并不好，底下好多劉少奇、林彪打架，內閣幾乎倒台。但華盛頓堅持下來，做了八年，堅決不做了。後來亞當斯做四年，傑佛遜做八年，民主傳統才建立起來。

記：他搞了許多民權法案是嗎？

唐：對。然後是麥迪遜、傑克遜。傑克遜是第七任總統，他是獨立戰爭時的紅小鬼，那時才十二歲，是革命軍送信的。

記：和胡耀邦一樣。

唐：是的，是革命一代最末尾的。搞了七任總統下來，美國的接班制就算穩定了。中國四九年建國，搞了個「共同綱領」，比美國好多了。一九五四年選第一任主席毛澤東，毛澤東如果幹八年不幹了，讓給劉少奇幹，劉少奇幹幾年，林彪想幹，就讓他幹，然後周恩來、鄧小平也可以幹幹。這樣，哪來那麼多接班人鬥爭、路線鬥爭呢？如果當初毛有這種修養，現已輪到胡耀邦，正好第七任，胡是紅小鬼，和傑克遜一樣，這時接班制度也該穩定了。可惜，毛澤東不是華盛頓，現在中國仍為接班問題傷腦筋。不管什麼黨，什麼主義，能搞民主接班就行。

記：其實五九年毛被迫讓給劉少奇做了。

唐：是啊！可是毛澤東是什麼東西，做不成就把人抓起來，國家主席失蹤了，十幾年沒

有音訊，這叫什麼樣子。如果劉少奇做下去，再讓周恩來、林彪、鄧小平、胡耀邦幹幹，這不就行了嗎？中國就好了嗎？倒楣就倒在毛澤東，沒修養，中國政治倒退一百年都不止。

記：尼克松訪問北京時間毛澤東，他不是中國皇帝的繼續？毛說：「我就是他們的繼續。」

唐：是的，皇權傳統。提到傳統，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是「打落水狗」，五九年毛退下，別人就笑他，開始捧劉主席，人民不能正確對待毛。王光美也不大注意，又上天安門，又出國訪問。江青能受得了嗎？文化大革命是夫人之爭。紅衛兵小報我收了五百份，江青說王光美訪印尼前幾天沒睡覺，不知道穿旗袍好呢，還是穿別的好？和蘇加諾跳舞爾效還是跳擦擦？中國人的勢利眼要改，否則領導人不會有修養。所以不是不能民主，好幾次歷史機會，都失去了。

記：你認為現在或者今後有沒有機會呢？

人民應該有公平的機會

唐：現在的第三梯隊可從兩方面來看。現在的共產黨是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什麼都不能做，祇能管別人，外行怎麼能管好呢？養一批人作威作福，一個梯隊一個梯隊地養職業官僚。這就是我們的傳統。古代開科取士幹嘛？就是培養職業官僚。

記：第三梯隊相似於古時哪一種權力交接方式呢？

唐：所謂梯隊都是上面指定誰來接班，還不如封建時代。古時候是公平開科取士，誰都有機會。現在是由幾個上面的人來選擇，吹牛

拍馬的肯定被選上去，那還用說嗎？中國從漢代開始，官僚接班制那是沒得說，公平得很，世界第一，誰也比不上。歷史上沒有這麼公平有效的接班制，無論羅馬、印度都不行。這也是中國兩千年下來比較穩定的原因。國民黨把科舉制破壞了，共產黨乾脆全部取消。

記：您認為梯隊接班在於不公平是嗎？

唐：就是。你鄧小平說胡耀邦好就行了？別人誰能服呢？你政策對頭，我為什麼不許幹，非讓胡幹？你憑什麼？憑能力呢？還是憑功勞？憑選票？什麼都不憑，憑拍，誰會拍誰上得去。大家如果公平考試，誰都會服嘛！古人很服的，認為考取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說明大家服氣，沒有後門可走，文革時搞的「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真是胡來了。國民黨也混，搞小山頭，小宗派，什麼「CC」之類的。還有國民黨以前辦「中央政治學校」，出來當官，黨天下嘛，人民沒份嘛！其他大學出來就失業。入黨做官，不入黨不行。

記：共產黨也一樣。

唐：共產黨動不動開除黨籍，比判刑都厲害，不像話。總之，梯隊不公平，老百姓意志無法表達。極權之下，上面指定的接班人必是奴才。國民黨失去大陸，是蔣家外戚「孔、宋」造成，老百姓認為孔、宋要殺。蔣認為孔、宋有功，因為國民黨抗戰後，國庫是最有錢的。

記：抗日時，共產黨屯兵，國民黨屯錢。

唐：就算蔣說的對，孔、宋有功，問題是為什麼非一家包辦？別的人也能幹，就不能辦？抗戰是全民的事情，怎麼能一家包辦？所以抗戰一完，所有的人一邊倒，都倒向共產黨，你國民黨不讓我幹嘛。現在共產黨搞改革，你讓人家來搞嘛！胡、趙有本事，就沒有更行的

人了嗎？給大家公平機會，不要一個人說了算。走後門哪都有，美國前國務卿黑格，沒當師長，一下子當了盟軍總司令，也是靠人事關係。但不能全靠走後門。

記：第三梯隊廢除終身制，還是有可取之處吧？

要在適當時機搞個接班制

唐：廢除終身制是好的，但是，關鍵是不能搞出一個自下而上的制度來。大家都有機會，不可領導人包辦，鄧小平、胡耀邦就沒有看錯人的時候嗎？是神仙嗎？一千多年前唐太宗都能看清楚的問題，你共產黨就看不清嗎？共產黨講到底是封建的，但是我們也不必悲觀，制度需摸索，英人說：「A 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GE.」制度是智慧與機會之子。現在中國是一個好機會，就看鄧小平他們有沒有智慧了，他們能否看清楚機會了。

記：您的意思是鄧小平和共產黨面臨着一個建立民主接班制度的機會？

唐：不論選舉、考試總要有個太平制度，不能靠個人說了算、靠上面指定。應像登山：誰爬得快誰行。過去考「八股」，也是非常 LOGIC（邏輯）的東西，頭腦不清楚考不好的，文章都作不好，還能幹事？要能寫奏章、寫文書的。

三梯隊作為暫時過渡可以，總這麼搞，搞不好的，我們可以看下去。但願第三梯隊是最後一個梯隊，別再搞第四、第五個梯隊了，要抓住現在的機會，搞出個民主接班制度來。

記：由於時間關係，就到這裏，謝謝唐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不祈禱

（中國大陸詩人） 葉文福

峨嵋金頂，原有廟宇，燬於大火，獨剩露天一尊銅佛。八方香客圍擠着那佛像，爭相以手或手絹在它身上磨蹭幾下，再趕緊在自己臉上狠蹭，大約是討點靈氣吧；擠不進去的，則長時間跪在附近泥地上虔誠地祈禱……

三天艱難攀登

難道是來朝奉這塊青銅

到底有什麼靈氣

值得八十老嫗冒死前來祈禱

我的父老鄉親呵——

這傢伙對自己的苦難尚且無動於衷

如何救得了你的命運

沒有偶像

造也造一個供奉

你們跪去吧

——我不祈禱

若果有上帝，果有天尊

就請它老人家將我碎屍萬段吧

我將它如此放肆地詛咒

難道詛不殛刑於我

以捍衛神的自尊

讓我下地獄吧

——我不祈禱

——我不祈禱

我正好施展手段

把那裏攪它個水覆山傾

為什麼要祈禱

大地舉我上九重碧霄

我就該在這裏叱咤風雲

人，既然經過漫長歲月才站立起來

既然是站立才區別於動物

為什麼還要跪下

不想作人的奴隸

為什麼要作神的奴隸

活見鬼

難怪別人敢肆無忌憚地糟塌我們

難道僅因為我們是奴隸的子孫

這顆心，就永遠打上了奴隸的金印

看看我的峨嵋吧——

看看我的雄偉的

俊秀的

神奇的

迷人得如同夢境的峨嵋吧——

我們自己的山難道不是我們的榜樣

壯麗的風光難道不正是來自巍然勃挺

難道不該似這山一樣做人

一任風寒雨熱，高舉着我們的自尊

跪着的父老呵

叩頭的鄉親

今日能站立是何等的不易

多少屍骨的丘山將我們高高舉起

為什麼還要跪下

有什麼權利跪下

跪下，就失去了高度

就失去了平等

就失去了抗爭

學我們自己的山吧

像山一樣頂天立地地站立吧

誰還在那裏下跪

——起來

——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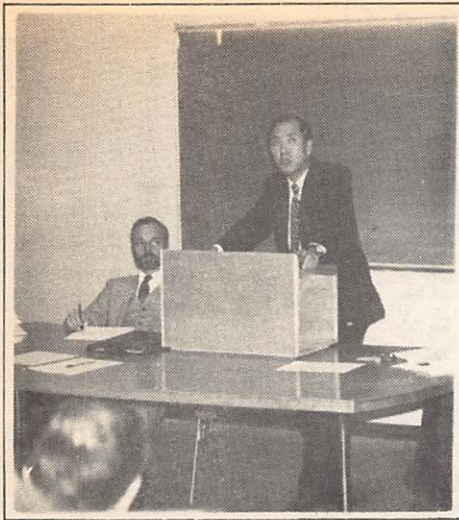
——起來

●文藝園地●

大陸的政治繼承問題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系主任) 楊力宇

作者簡介：楊力宇教授，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主任。近年，楊力宇教授曾多次訪問中國大陸，並與鄧小平等高級領導人會見。著名的「鄧小平關於中國統一問題的六點意見」，就是由楊教授首先向國外披露的。楊力宇教授近來對海峽兩岸的政治發展發表了很多持平的見解。



楊力宇教授在演講

(本文原為「新獨立評論」所撰，但「中國之春」編者一再約請撰稿，討論政治繼承問題，徵得「新獨立」編者之同意，將此文移至「中國之春」發表。——作者)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政治繼承一直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中共是「一黨專政」，而毛澤東則是「一人專政」。他一直是個人意志來決定接班人，不顧憲法及黨章的規定及民主政治的精神。在毛氏的個人獨裁之下，祇有「人治」，而無「法治」。首先，他似乎選定了劉少奇，文革開始後不久即把劉鬥倒，劉終於慘死於毛的殘酷鬥爭之下。其後毛又選定了林彪為其接班人，號稱「最親密的戰友」及「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甚至指名是「全黨、全軍、全國的副統帥」，最後竟將這些名詞列入黨章，成為歷史笑談。但不到兩年，林毛鬥爭，林系失敗，舉家逃奔外蒙，死於墜機。

林彪死後，毛又培養其妻江青及「四人幫」。「四人幫」既無經歷，又無能力，但經過毛個人的刻意培養、扶持及安排，在短短數年

內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出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及副總理。毛死前不久又安排了一個無才無能的華國鋒，希望由他來協助「四人幫」承繼大權。然而，毛澤東死後，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將可能奪權的「四人幫」逮捕，繼續毛的「個人崇拜」傳統，以毛的偶像來抬高他的個人身價；經濟上則大搞「洋躍進」，人民生活陷於困苦艱辛之中。華不但承繼了毛的個人獨裁及「家長式」的統治，同時也承繼了毛的倒行逆施的政策。這些都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毛的封建思想及個人選定接班人的獨裁專橫作風令人心悸。

華國鋒垮台後，中共提出各級幹部必須年輕化的政策，要求老幹部退休，並培養年輕及有專業知識的年輕幹部，逐漸接班。本文現就政治繼承問題發表我個人的看法。

「傳位式」的繼承、「安排式」的繼承，甚至「禪讓式」的繼承（根據中國歷史的傳統說法，堯、舜以後，禹即傳位給其子，開始了中國「世襲制」的傳統），均不能真正解決政治繼承問題，將來可能造成一個派系或一人承繼大權或無才無能之人承繼權位，甚至可能走向權力鬥爭。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有政治繼承問題，而美國從未有過「接班」問題？一個重大關鍵就是制度問題。所以，一個完善的繼承制度必須建立。

政治繼承必須以法律為基礎，根據法律的規定來繼承權位，不能以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來培養或選定一人或一組人士來接班。因為個人的判斷（無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是有錯誤的可能性。古代有舜選定禹的錯誤（禹建立了家天下），現代有毛澤東選定林彪、華國鋒及「四人幫」的錯誤。換句話說，接班人的產生必須以「法治」而非以「人治」為基礎；政治

繼承人必須來自人民，從選舉中產生。

所以，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接班制度，必須發展兩黨或多黨民主議會政治，產生監督制衡的作用，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士從選舉及人民的考驗中出任領袖，承繼大權。天下為公，任何國家不能搞「一黨專政」或「一人專政」。一黨或一人專政極可能產生極權獨裁的接班人。

爲了防止軍人奪權接班，軍人必須退出政治，實行「以文統軍」。軍隊非一黨所有，更非一人所有。「軍隊國家化」是一崇高的理想。美國共和及民主兩黨均未擁有軍隊，故美國永不可能發生「林彪式」的軍事政變，美國的接班永遠是和平的。尼克森違反了美國的法律，必須辭職；福特和平地根據美國的憲法而繼任總統，未有任何問題。「無法無天」的毛澤東違反了憲法黨章，不但未辭職或免職，更未受任何調查或審判，反而繼續其家長式的統治，甚至以個人意志來選定華國鋒。美國重法治，一切以法律爲依歸，而毛重「黨治」及「人治」，所以尼、毛違法便有完全不同的下場。所以，一套完善的接班制度必須建立；此一制度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一黨專政」或「一人專政」均會造成嚴重的接班問題。真正的各級選舉及兩黨或多黨的議會政治是一套比較完善的接班制度的基礎。此一制度當然亦非絕對完善，仍有許多問題，但與其它模式比較，自有其明顯的優越性。

口號教條不能解決問題，經濟現代化也不能完全解決大陸今日所有的問題。今日大陸必須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從經濟開放走向政治開放，從經濟現代化走向政治現代化，意識形態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及制度現代化，并建立完善的接班制度，才能逐漸解決大陸的重大問題。

絕對權力必然造成極端的腐化及自私，也必然形成永久佔據權位的慾望。最近菲律賓的馬科斯及海地的杜維里爾均是極好的例子。他們排除異己，建立絕對的權力，結果造成高度

● 思想論壇 ●

簡論鄧小平當前的改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甘犁

鄧小平在當前所推行的改革，足見他本人的智慧、魄力和勇敢，在推行改革後的短暫期間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稱頌的，這主要表现在：

1. 向一個封建、保守、僵化和毛的餘毒、習慣勢力還相當頑固的社會制度提出挑戰，這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偉大事件。

2. 在不足十年的時間中，鄧成功地批判了以毛的言論作爲評判真理是非的標準，而代之以「客觀實踐」爲標準。取締了「以階級鬥爭爲綱」和個人崇拜；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爲建國以來無數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

3. 陸續制定了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規，並在縣以下試行直接選舉。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論自由，人和人的關係也不像毛時代那樣緊張，甚至出現像罷課、罷工等在毛時代被認爲是大逆不道的行動，也並未實行無情的鎮壓。

4. 開放對外貿易、開放市場經濟，初步改善和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像電視機、電冰箱、沙發、電扇……等高檔消費品，在毛時代普通職工連想都不敢想，現在已較普遍使用。

的腐化及自私，并欲永久佔據總統的權位，結果被推翻。中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以法律及選舉爲基礎的接班制度，絕不能允許第二個毛澤東出現。

雖然無論在政治民主、生活提高等方面，離人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而且出現了不少甚至比較嚴重的問題，但畢竟是在改革、在前進，而且在繼續改革、繼續前進。改革本來就是艱巨的、錯綜複雜的，歷史上如商鞅、王安石等的變法都是改革，但也幾乎都以失敗告終，足可證明其不易。現在如此人口衆多的大國中進行改革，矛盾重重，阻力很大，問題很多是不足爲怪的。特別是當前改革正處於剛剛起步的時候，穩一點，慢一點，以免給人民帶來損害是完全必要的。相反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甚至可能帶來惡果。

因此，我認爲任何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都應對當前的改革大力支持，要補台而不要拆台，多提些切實的建議，同心同德使改革能夠獲得成功。不要因改革中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便大驚小怪，橫加指責，評頭品足，諸說紛紜（這裏指的是態度而不是說不能寫批評性的文章）。

總之，不論什麼學說、什麼主義，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指導下行動，祖國的前途將是大有可爲的。

第N梯隊

人治長鏈的伸延

(國內) 肖平

編者按：本文為中國大陸民運刊物「野草」一九八五年九月號的文章，為配合本期專題梯隊接班問題，特予轉載。

越接近神秘的九月黨代會，中國政壇內部的結構振盪便越劇烈。這種振盪首先在政壇的最後根基——軍隊內——觸發。六月上旬結束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除了裁軍一百萬及把十大軍區合併為七大軍區的引人注目的決定外，更有深遠意義的是以年輕化為標準，對軍區領導人的更換。而在政壇的中心——黨內，稱為第二梯隊的胡耀邦和稱為第三梯隊的胡啓立，在國內外的會議和接見中，頻頻亮相和作權威性的講話，處處顯示其政治的份量。在這裏也是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在表明其作用。在政壇的前台——政府內，屬於第三梯隊的兩位年輕的副總理，李鵬和田紀雲也非常活躍，除了出國訪問外，李鵬兼任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也是增強權力和地位的徵兆。在基層方面，包括中央一〇七個部委和二十九省、市、自治區的高級職位已進行或即將進行動員。上海市、貴州省等省市的省市書記和省市長已換人，

其他的也陸續進行。

對於這次九月黨代會的主要任務，鄧小平在七月下旬接見外賓時已提前作了透露，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使中共高層年輕化，這一目標在十二大中解決得不理想，故要在這次徹底解決。現在要搞第三梯隊，以後還要搞第四、第五梯隊，以達到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鄧小平在這裏提出了鄧氏連續性鎖鏈的概念，這條連續性的鎖鏈的起端是由他為代表的老革命家所組成的第一梯隊，接著是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第二梯隊，跟著可能是以胡啓立為代表的第三梯隊，往下就是無法預測代表人的第四、第五……第N梯隊。如果說十二大是第二梯隊開始掌權的標誌，那這次黨代會則是第三梯隊正式佔據政壇的開幕禮，也可以說是第一梯隊形式上退出政壇的閉幕禮。

對於這種鄧氏的百年設計，這種令他安心也希望令國際上對他的政策連續性懷疑的人安心的接班安排，我們並不覺得安心和有信心。這條長鏈儘管是爲了改革政策的穩定和延續而安排的，在內容上與中國連綿的宗法世襲，和毛澤東的接班體制有所不同，但在更深層次上

，它們都是相同的。

在鄧氏的接班體制中，我們看到了沉重的歷史因襲，近的來說，就是與毛澤東的接班體制相似。雖然鄧小平把毛澤東政策作了重大的修改，但在接班的思想却似乎沒有修改。他們兩人都擔心自己的政策能否延續，他們都沒有那種歷史的胸襟，讓後世的政策由後世的人決定，而不介意於這種將來的政策一定要與自己制定的相同。他們都不甘心做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的人，硬要超越時空，做一個不可能做到的偉人或神仙。這種奢望和野心，注定了不能實現，他們唯有靠自己的慧眼找到一個或一類衣鉢傳人作滿足。可惜這種衣鉢傳人往往是選錯了，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林彪是前一类



田紀雲



李鵬

第三梯隊的李鵬和田紀雲風頭正健



胡啓立是第三梯隊的代表人物

例子，華國鋒是後一類例子。被選中的接班人只向提拔者負責而不向時代負責，就免不了被時代所淘汰，馬林科夫和華國鋒都是這樣的悲劇人物。

沿著鄧氏這條連續鎖鏈往上追溯更遠，便會發現這一段不知可連續多長的短鏈，只不過是漫長的封建社會人治長鏈的一個伸延。從鄧氏的N次梯隊的接班體制可看到宗法世襲的隱約痕跡，秦始皇的狂想，秦一世、秦二世……與第一梯隊、第二梯隊……難道沒有一點歷史的聯繫嗎？當然古代的延續是赤裸裸的血統延續，而現代的延續是政策的延續；前者肯定是私慾的強烈表現，後者却似乎沒有私的成份，但不讓體制和政策由後世變化的環境和後代人自己決定，而硬要按「既定方針」去辦，這不是私利的表現又是什麼呢？何況鄧氏的接班體制也並不是沒有絲毫的宗法世襲和血緣成份。從鄧氏所挑選的第三梯隊人員的家庭背景看，不少人是高幹子弟。不是說他們不能接班，而是說到底是他們的血統還是他們的才幹成爲他

們接班的決定因素，構成了兩個大時代的分野。

鄧氏接班方式的後果，永遠產生不出一個民主的體制。在這個錯綜複雜、變化萬端的現代社會，他還抱著在一個凝滯和簡單社會裏或許可能的治國方式——人治的方式。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以爲自己制定的政策，可以確保中國在下一個世紀達到繁榮富強。問題便簡化爲如何找正確執行政策的人了。如果問題真的這麼簡單，則只需把鄧的政策變爲機器語言，設計一個程序，輸入給機械人，便可以解決了。但是，想想看以前不是也有人說過，毛澤東思想夠我們用一百年嗎？結果又是怎樣呢？複雜和變化的現代社會，需要一個民主的體制相配合，我們不可能選擇一個不會犯錯誤的領導人，但我們可用民主的體制，確保我們可隨時撤換犯了大錯誤的領導人，可以使我們的政策隨時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在這種民主的體制下，便不存在著以年齡劃分的第一梯隊、第二梯隊……第N梯隊的問題。年齡不是決定人選的因素，由效果所體現的能力和才幹，才是選擇人選的決定因素。這裏不需要老中青三結合或一、二、三梯隊搭配的機械比例。在這種民主的體制下，也不存在著政策的穩定性問題，而只有政策隨環境的適應性問題。這個適應性，在民主體制下，是能夠通過相信人民的能力，由自我調節而達到。在這裏更不存在著「四個堅持」，一切以人民的意願和實際利益爲依據。

在七六年，人民已喊出了「秦皇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難道我們現在還需要什麼第N梯隊的牽領和指引嗎？我們應該以自己的力量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原載國內民刊「野草」一九八五年九月號）

雜感二則

（大陸老移民）

馬衛康

人民刑場

中國的銀行謂之「人民銀行」，其喉舌謂之「人民日報」，其軍隊謂之「人民解放軍」，其政權謂之「人民政府」……，連郵票上也不忘記印上「人民郵政」。那麼她所設的監獄也該稱作「人民監獄」，勞改場應該叫作「人民勞改場」，而行刑之所在該稱謂「人民刑場」了。

廿世紀的后羿

有人說毛澤東過大於功，因爲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在這裏我不禁要問，難道生母就可以虐待其兒女？想不到毛澤東受爭議的頭像仍高掛天安門，其腐屍尚存，孽魂不散，他生時被捧爲紅太陽，但下了山的太陽餘熱仍多烤折磨中國人，中國傳說中射下九個太陽的后羿，何時才呼之欲出？

中國民主運動面臨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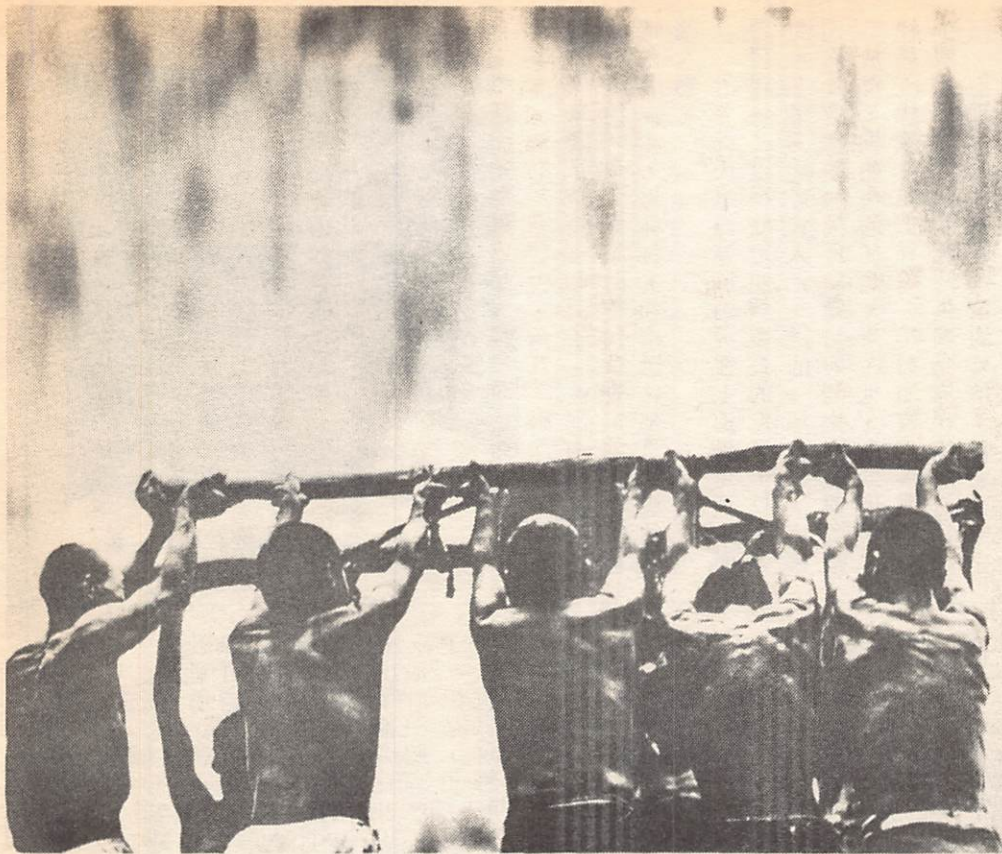
王炳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個海內外配合運作的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已堅持了兩個年頭。今天，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得以順利召開，本身就向全世界揭示了一個不容抹煞的事實：儘管不少中國人已對自己祖國的民主前途知難却步，但仍有一部份堅定份子並未絕望，他們仍在呼喊，仍在做着極為艱巨的鋪路工作……我們明明知道，在未來的民主大廈落成典禮時，我們可能不是典禮的剪綵者，不是民主大廈的享用者，因為任何一座大廈的建成都必須先填平那地面的坑穴，但我們寧願做填平坑穴的碎石，以便讓後來者有一個更高的起點。沒有這些碎石，任何輝煌的建築都不會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我們二年來的成績已經記錄在歷史上：

一、中國民聯堅持了下來，並有所發展。雖然一些人可惜地離開了民聯，但更多的優秀份子加入了民運行列，使我們的有機體更為朝氣蓬勃。海內外組織結構的逐步健全，已使中國民聯能以整體性地協調運作，顯示出壓力團體的作用和力量。中國民聯已成爲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變數。不少人認爲，從政治上看，中國共產黨無疑是中國的第一大政治實體，國民黨是第二大政治實體，台灣黨外爲潛在性的第三個政治實體，中國民聯雖然力量尚小，還算不上什麼政治實體，但已是除國、共兩黨及台灣黨外之外的一個組織健全、能夠獨立運作的政治性壓力團體。不管中國民聯未來發展如何，中國政壇上遲早要出現共產黨——大陸黨外——國民黨——台灣黨外的四足鼎立的局面。中國民聯不敢說代表大陸黨外，但可以毫無諱言地說，我們在推動中國大陸合法反對派的形成。

中國民聯當前只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壓力團體與政黨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作用是影響執政者的政策，後者是問鼎政權。海內外不少熱心的人士在鼓吹中國新政黨的成立，看來，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新政黨的出現只是早晚問題。我認爲，成立新政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有一批拖不垮、打不爛、有民主理想和水準的骨幹（人數不見得很



多)；(二)有一個有號召力、凝聚力的綱領；(三)有支持政黨活動的財力基礎(不一定十分雄厚，但起碼能維持基本活動)。三個條件中，第一條是最主要的。條件不成熟時推出新的政黨，則會得早產病；條件成熟而不及時推出，則可能貽誤良機、胎死腹中。

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共兩黨這兩個政治極端之間，可能需要一個政治緩衝體的存在，這將為新政黨的成立提供客觀條件。

二兩年來，做為中國民聯機關刊物的《中國之春雜誌》，已成為最受中國大陸留學生歡迎的刊物之一，對中國政局發生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之春月刊由最初的簡陋形式正在向專業水準提升，這是全體盟員努力的結果，是國內民運人士和廣大留學生支持的結果，是愛國華僑慷慨捐助的結果，是海外學者、作者關懷的結果，也是編輯部工作人員辛勤勞動的結果。中國之春將記錄着這一代人為中國民主奮鬥的軌跡，我們有責任將她辦得更好。與中國之春雜誌配合的《中國之春簡訊》，以輕騎兵的形式馳騁於留學生、海外華僑及國內某些地區，起到了擴大中國民主運動影響的作用。

下面，我僅就個人的一些感受，重點談一下兩年來民運所遇到的一些困難。

一、如何克服中國人的畏懼情緒，

是民運面臨的一大難題

應該承認，對於民運，中國人中現今存在着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況：敢於公開參與的人是極少數，完全反對民運的人是極少數，精神上同情及支持民運、但不敢參與、不敢提供具體協助的人佔絕大多數。民主運動面臨的，是一個被專制制度整怕了的民族。

中國當代的專制制度對人的控制是歷史上少見的。它是一個上級層層向下級授權、下級層層受到上級恩庇的官僚制度，它對社會及人群的保甲式的連環控制，伸入到每一個基層單位、每一個街道，甚至每一個家庭。雖然這種控制近來由於經濟上的放鬆及開放政策而有所紓解，但絕大多數人仍感覺被置於專制者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之下。人們追求自由的行動，稍有不慎便會被查覺。一旦超出了當政者容忍的範疇，便會遭到制裁。

再者，中國當代專制制度對持不同政見者制裁的殘酷性是歷史上罕見的。歷次政治運動給不只一代的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創傷和恐懼

感，心有餘悸的現象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殘酷性不僅在於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本人，更在於株連九族，旁及師友。不少人並不懼怕自己受到迫害，而是一想到自己的親人將會受到連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子女將會失去前途，便受到良心的約束而裹足不前。應該說，專制制度不但發揮了人性的醜陋面而鞏固專制，而且還利用了人性的某些善良成份而鞏固統治。

長期的專制統治，把中華民族造成了一個怯懦的民族，一個明哲保身的民族。的確，殘酷的專制把中華民族的品質大大降低了。大概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當你請求別人參與或幫助民運時，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同情你們、支持你們，但我還有親人在國內，我不能不為他們着想。」有的華僑則說：「我還要經常進出大陸，我不能把與中國聯繫的線斷掉。」

如何克服這種局面，祛除大家的恐懼感，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我初步想了幾點：

第一，要以我們自己的表帥作用感化別人。我們自己從事民運的人，首先要帶個頭，要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別人才會被感召，才會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自己畏畏縮縮，怕東怕西，畏首畏尾，怎麼能有感召作用？我考慮，在適當時候，應該有更多的人公開站出來，打破組織的神秘感。越來越多的人公開出來，就會給公眾一種感覺：亮了相，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當大家認為公開加入成為自然的事情時，潮流就形成了。這種趨勢起碼在海外可以促成。

我們應該摸透共產黨專制者的脾氣：你對它不滿時，你越怕它，它越整你，一直把你整得服服貼貼。反之，你風骨凜然，胸襟坦蕩，仗義執言，它反而會敬你三分，甚至會讓你三分。

譚純先生以真實姓名捐款獎勵中國之春優秀作品並親自代表中國民聯溫哥華聯絡站與中國大陸官方代表團接觸，贏得了人們的尊敬。香港分部的同志們面臨着九七大限，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公開開辦中國之春書屋，其大無畏的精神值得稱許。

第二，要認識中國大陸這幾年來的政局演變，要體識中共當局向外塑造開明形象的心理。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來，中國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變化。十年前，誰也想像不到今天會有二萬多名大陸留學生在西方國家學習。沒有新的開放政策，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也就沒有中國民聯的成立。儘管一派人士認為，中共開放及改革政策

的目的之一，是挽救自己的危機，但不容否認的是，它在客觀上也給人民、尤其是農民帶來了一定利益。當局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專制手段的殘酷性，較毛澤東和四人幫時代已有相當程度的減輕。像王若水、劉賓雁、于浩成這樣的人，在四人幫時代早就關入牢籠了。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等人，在四人幫時代必會遭受到像遇羅克、張志新被槍斃的命運，他們的家屬也免不了挨批鬥的下場。當然，這些有限的變化，是無數愛自由、爭民主的人士用生命換來的，但我們還是不能抹煞這些變化。我指出這些變化的目的，是想說明，我們今天公開投身到民主運動中來，無可避免地要承受一些風險，然而，這點風險比起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魏京生所承擔的風險，畢竟小得太多了。如果一個民族連一點風險都不敢承擔，那麼，這個民族根本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

我們還要向支持我們的海外學人和華僑講明，中共當局正在急於向華僑、向各國尋求外匯，以挽救千瘡百孔的經濟。爲了吸收外匯，給外資建立信心，就不能完全的無法無天，爲所欲爲，就必須向外塑造開明的形象。否則，經濟崩潰了，中共自己也要同歸於盡。由於中國的大門已經敞開，隨着中國經濟突破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與世界經濟聯繫起來，中共官方就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國際法的制約和世界輿論的監督。北京當局沒有把曾在美國要求政治庇護的張政高長期囚禁起來，就是顧忌美國輿論的結果。針對中共當局這種需要向外國人樹立開明形象的心理，我們的民主運動可以做很多有益的推動工作，甚至在國內開展一些公開的合法活動。我們要告訴那些支持者和同情者，正因爲中共需要外資而對海外輿論有所顧忌，就不必那麼怕談「共」色變。說不定，你公開支持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中共還要在必要時向你統戰哩！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教授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論文，還公開將中國之春雜誌寄給國內的朋友。中國大陸並沒有因此與他斷絕關係，前不久，他還訪問大陸，受到與往常一樣的接待。我們的體會是，中共最卑視那些膽怯的人，對於巴結之徒，中共僅是利用一下而已。像馬思聰、傅聰這樣不卑不亢的硬漢，中共反而會求上門去。有人說，中共這樣做，因爲他們是名人。事實上不見得，徐松林先生訪問北京時公開聲明支持中國之春，北京當局對他還是客客氣氣。要對中共持不同意見，若同情國內尚在坐牢的民運人士，支持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不如將自己的立場光明正大昭告於世，這樣，就將自己置於世界輿論的保護之下。反之，心中有話不敢說，專制者反而會利用你不敢吭聲的膽怯心理整治你。

第三，要給參加中國民聯的盟員建立安全感。

在當前中國民聯力量尚小、尚未「成氣候」的情況下，每一個加入者的大無畏的精神都值得稱許。做爲一個團體，我們必須對每一位入盟者的安全着想。一個成員有危險，整個團體都要動員起來營救他。這樣才會給每個入盟的人員建立安全感。去年，中國民聯將處於危險狀態的耿晨同志從香港營救到巴黎，今年年底，我們又將另一名面臨危險的盟員許醒民同志營救到民主國家。這是整個團體努力的結果，是自由民主國家發揚人道主義的結果。相反，類似於耿晨、許醒民的境遇但沒有組織協助者，大有人在，但他們孤軍奮鬥，獲救的機會要小得多。有些人一味反對搞組織，認爲搞組織沒什麼價值。組織有用嗎？耿晨、許醒民兩案已對此問題做出了明確答覆。可以說，反對搞組織，就像反對爭自由一樣沒有道理。在多元民主社會裏，政黨、壓力團體、宗教等組織，簡直多得不可勝數，整個社會就是在各種團體環環相扣、互相制約的狀況下，穩定存在的。我們的組織與國共兩黨的不同之處在於，參加我們組織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其個人選擇都受到尊重。我們曾看到很多人有無助感、孤獨感。怎麼辦？加入團體、與大家團結在一起，相互啓發，相互幫助，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第四，要尊重每個人政治上的自由選擇。

要進行一項長遠的工作，要使我們的團體札實而健康地發展，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人（每個盟員）政治上的自由選擇。歸根結蒂，這是個尊重人權的問題。加盟自願、退盟自由，是我們組織的基本原則。加盟的，我們歡迎；不加盟的，我們尊重，決不搞強迫那一套，決不要人家不願加盟就斥責人家。已經入盟的，不願意繼續留在團體裏，可隨時退出，參與共產黨或加入國民黨，都請自便。像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互相跳槽的是一種常態，沒什麼大驚小怪。我們要學會尊重別人政治選擇的原則。

我想，只要我們把握上述四點並把它們向世人講清楚，人們參與、支持民主運動的恐懼感就會減低。

二、理想主義號召力的減弱

不管從世界的現實、還是從中國的現狀看，理想主義做爲政治力量凝聚因素的作用，都在減弱。尤其在中國，理想主義曾被國共兩黨濫用過，人們再難以相信任何天花亂墜的理想宣傳了，人們比較重視的是眼

前的實際利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個大字的崇高理想，雖然對每個人都具有吸引力，但很多人認為，在自己的一生中，這八個字在中國實現的可能太小了，因此不如解決自己眼前問題來得重要。這是當前民主運動面臨的另一項困難。

辛亥革命曾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宣傳，獲得成功。民國建立後，國民黨曾用三民主義的理想號召人民進行北伐，取得了打倒北洋軍閥的勝利。後來，國民黨由於權力的腐蝕作用，其治理大陸的結果，與其宣傳的三民主義理想相去甚遠。人們失望了。共產黨抓住時機，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實用主義口號動員了農民，用共產主義和民主、自由的理想凝聚了對國民黨和舊軍閥不滿的、充滿革命激情的知識份子，把國民黨逼到台灣。然而，共產黨三十多年的統治，把中國人民帶入的不是共產主義天堂，而是一座人間地獄。連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都不再相信「人民公社架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的理想夢。鄧小平不得不採用「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徹頭徹尾實用主義的理論，來挽救共產黨的危機。

國共兩黨都舉過理想主義的旗幟，但實際結果都背離了其理想主義所宣傳的目標。理想主義還值得相信嗎？理想主義是否僅是一小撮政客騙人的口號？這些問題深深地刻在了人們的腦海之中。人們對國共兩黨的失望，也導致了對理想主義的懷疑。可以說，理想主義被國共兩黨、特別是共產黨糟蹋了。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劣跡，降低了理想主義的信譽。這樣，當民主運動再用理想主義號召人民時，顯得不那麼有力。我們常聽到有人問：「誰當權還不都是一樣。你們搞民運的人怎麼保證當了權不走國共兩黨的老路？」這是理想主義受到懷疑後自然產生的疑問。

怎麼克服這個問題？我暫提兩點看法：第一，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用我們長時間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來向世人表明新一代民運人士與國共兩黨的不同之處。每一個中國民聯的成員都必須清楚，外人對中國民聯的認識，往往是從他所接觸的中國民聯的具體成員那裏獲得的。我們每個人在與外界打交道時，都要想到，別人正在通過自己的形象來判斷整個團體。這樣想，就增加了責任感。對民主、法治的深刻理解，注意聆聽別人講話、善於聽取批評意見的風範，尊重別人不同見解的理性態度，站在對方立場為之設身處地着想的同情感，服裝整齊，態度不卑不亢，都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不同的政見

，因為，民主的重要內涵之一就是不同政見和平相處、公平競爭。只有當公眾相信我們真正懂得民主運作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理想主義的希望火花，才會在他們的心中重新點燃。第二，我們決不能停留在理想主義的普通號召上，而應該為飽受專制迫害的苦難中國人民多做些具體的、有益的事情。如服務留學生，服務大陸新移民，幫助嚮往自由、民主的青年出國留學等。過去一年，我們曾為多名自費留學生找到假期打工地點，曾為很多留學生提供信息服務，曾為一些自費留學生找到了經濟擔保人。有的留學生深有體會的說：「你們真是人民的大使館！」應該說，為中國大陸同胞解決一些具體的困難，本身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類工作做多了，自然而然增加了民運的向心力。

三、中共步向「理性」專制的迷惑性

我們時常聽到一種論調：「中共在改嘛，現在較以前自由多了，你們何必還搞民運呢？」這種論調的背後，隱藏着很多模糊觀念：

(一)認為中共當權派可以自發地進行改革，並將不斷地改革下去；

(二)認不清中共改革派與民主運動的區別；

(三)認為當前的中國社會已與毛澤東時代有了本質的差別。

對於第一點，用不着費力去加以澄清，因為連改革派都承認，他們是在人民的推動下向前邁步的。如副總理萬里就承認，農村的包產到戶是農民先走在前頭，隨後才有黨的政策。

下面，我想就中國社會當前的轉變趨勢，粗淺的談一下看法，因為，對形勢正確分析的本身，即可澄清很多模糊認識。

我認為，中國社會當前的發展主要有兩個趨向：其一，民主派人士正在將中國社會向多元、民主的方向推動，但自覺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似乎不多；其二，中共當權派正在將中國社會推向一個「理性」專制的模式。我重點談一下後面這種趨勢。

世界上有二種類型的奴隸主：

第一種：完全不顧奴隸的死活，給奴隸吃得越少越好，想讓奴隸們幹什麼，就讓奴隸們幹什麼，而且幹得越多越好，以便榨取更多的血汗。死些奴隸並沒關係，因為還有眾多的奴隸供驅使；

第二種：適當照顧一下奴隸的生活與身體，以便讓奴隸們有較壯的身體去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有一條嚴格的禁令：絕不准許奴隸翻身做人。



廣東演出輕音樂、現代舞(右下)、農村青年身着西服(右上)、上海少女時裝展覽(左),都是「理性」專制的一些表面現象。

第一類奴隸主的現代代表為毛澤東，他的專制或可稱為「非理性」專制；第二類奴隸主的現代代表為鄧小平，他的專制或可稱為「理性」專制。與毛澤東的控制一切、運動人民的「非理性」專制模式比，鄧小平的「理性」專制有如下特點：

(一) 允許人民從事一定程度的私有生產，如開辦城市小服務業、小商業和經營農村的承租土地，即允許人民有些經濟「小自由」。

(二) 允許引進一些西方社會的表面層次的生活方式，如穿西裝，跳「迪斯科」，唱流行歌曲，舉辦時裝展覽，甚至選美活動等，即允許人民有些生活「小自由」。

(三) 允許學術界在一定範圍內爭論、探討學術問題，允許科技人員自定科研題目，自己管理科研經費，即允許知識份子有些學術「小自由」。

(四) 鼓勵非政治化傾向，有意識地將人民和青年的視線從政治問題上移開，似乎是：談吃喝玩樂可以，談發財可以，但談政治不可以。為配合這種非政治化傾向運動，當局有意將共青團從一個政治性團體轉變為一個聯誼會性質的團體，令共青團組織舞會、介紹婚姻、舉辦夏令營及一些文藝活動等。這與毛澤東時代的一切事物都貼上政治標籤的泛政治化傾向，形成鮮明對照。

但是，鄧小平與毛澤東有一個根本的相同點：都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不允許持不同政見的言論及團體存在。基於這個相同點，我們都稱他們為「專制」，但鄧小平的「專制」，是有一定彈性的，並非感情用事的，故我們稱之為「理性」專制。

中共某些領導人有意識地將中國社會導向一個「理性」專制的模式，對全世界、對中國人民，都有極大的迷惑性。如果讓一個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只求安居樂業的民族來進行選舉，如果讓一個容易滿足、寄希望於好皇帝的民族來進行選擇，我想，可能相當多的人歡迎鄧小平的「理性」專制，而不願接受毛澤東的「非理性」專制。當然，如果給他們多一種多元、民主社會的選擇，可能這種選擇對他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可惜，中國老百姓並不熟悉外部世界，他們喜歡與自己的過去比，而不習慣與他人的今天比。

「民運無用論」論調的流行，與中共向「理性」專制邁進的現狀，直接相關。

如何掃除中共步向「理性」專制的迷惑性，從而加深對民主運動必要性的認識呢？

首先，我認為要反覆強調鄧小平改革派與民主運動的三個本質區別

：(一)經濟上，鄧小平堅持國有企業佔主導地位，堅持土地國有並給私營企業的發展處處設限；民主派則主張多元經濟、土地私有並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二)政治上，我們主張取消四個堅持、實行多黨競爭、制衡的民主政治；而鄧小平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三)意識形態上，我們反對鄧小平定馬列主義為一尊的路線，主張放棄共產黨對全國人民意識形態上的控制。人們只有瞭解了共產黨改革派與民主運動的根本區別，才能決定支持對象。

其次，要對改革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做實事求是的理性分析。他們改一點，我們要承認一點，支持一點，讚揚一點。同時，指出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像國民黨頑固派那樣，對中共改革派一杆子打死，對改革的成績一律抹煞，對改革出的亂子幸災樂禍，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是爭取不到大陸留學生和大陸人民的。事情往往這樣：你在肯定了改革派所取得的成績之後，再指出其不足和問題所在，並提出我們的主張和解決方案，所收到的效果常比單純的批評要大得多。我和某些留學生接觸時，有時甚至退到最底線來啟發對方：「即便退一萬步講，鄧小平的政策都是正確的，但用什麼來保障鄧的政策能夠延續呢？我們的看法是，保障正確政策延續性的措施，只有實行法治，而這正是中國民聯的主張和爭取的目標。既然如此，就沒有道理來否定和打擊中國民聯。」事實表明，只要我們堅持理性的態度，就會爭取到處於中間狀態的群眾的理解和同情。

第三，我們要不斷強調如下觀點：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當前執政者的某項政策正確與否，而在於是否已經建立起一個合理的制衡系統（或者稱反饋系統）。合法制衡系統已建立的社會，執政者犯些錯誤（任何人免不了出現判斷錯誤）並不足慮，因制衡系統可以將其糾正。反之，合理制衡系統缺乏的社會，即使執政者的現時政策百分之百的正確，也不要樂觀，因執政者一旦失誤，社會便無法將之糾正，結果常常是前功盡棄。不容否認，鄧小平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農業恢復的作用，很多人對此津津樂道，忘記了建立合理制衡系統的重要性。待到政策失誤、社會受傷害時，才想到制衡的必要，却為時已晚。正確的態度是，越是在開放時，就越應該抓緊時間促成合理制衡系統的建立，以便防患於未然。從根本上講，一個國家有沒有前途，決不在其一时的政策正確與否，而在於有沒有健全的制衡系統。

第四，我們必須對鄧小平等執政者踐踏人權、壓制民主和自由的言論和行為，進行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要為那些為了爭自由、爭民主

而受到壓制、迫害、甚至坐牢的人士講話。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我們區別於那些投共、媚共，昧着良心為中共歌功頌德的人士的根本之處。只有撥開中共天花亂墜的宣傳迷霧，只有把中共有意掩蓋的「大好改革形勢」的另一面展示給人們，才能解除中共步向「理性」專制對一部份人的迷惑。

四、我們面對着一個盼望「好皇帝」的民族

我們曾反覆強調：當代民主運動面對的，不僅僅是強大的專制制度，而且也包括締造了這一專制制度的整個民族。有同志指出，「孩子是慣壞的，專制是捧出來的。」專制者長時期的奴化教育，使很多人的理想停留在「盼望好皇帝」、「盼望清官政治」、「盼望包青天」的水準上，甚至一些教育程度很高的人，也是如此。最典型的論調是：「鄧小平已經不容易了，真盼他多活幾年。」

盼好皇帝的人，永遠把個人的命運依附在統治者身上，這也與強調群體、忽視個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有關。應該說，中國讀書人中，有獨立個性的人並不多，多半是毛澤東所形容的依附在統治者這張「皮」上的「毛」。

問題在於，很多習慣於這種依附關係的人，除自己不願獨立外，還反對別人的個性獨立。就像魯迅所說的，一些猴子想站起來做人，其它的猴子却把它們咬死，結果，猴子永遠站不起來，也永遠變不成人。有一種論調說：「黨內改革派已備受壓力，我們只能幫助改革派、依靠改革派。搞民主運動，會給保守派向改革派進攻製造口實，對改革只能起破壞作用。」更有人主張：「知識份子的問題要獲得解決，只能和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聯手作戰。」

對待依附論者，民運人士不要性急。我們在與他們交談時，沒有必要否定他們，而應該在傾聽他們的意見之後指出：「我們尊重您的選擇，我們相信你們也是會推動改革的。我們所要求的，是希望您也尊重我們的選擇，尊重我們建立獨立制衡力量的努力。」尊重個人的選擇，歸根結底是尊重人權的問題。經驗表明，只有首先尊重他人，自己才會受到他人的尊重。不尊重他人，自己永遠不會贏得他人的尊重。要牢牢樹立民主運動的運作本身也是多元的概念，盡量避免「只有我的辦法才是唯一正確」的絕對主義觀點。我們切不可夢想把別人都說服過來，我們爭取的第一步，是希望別人逐漸能夠尊重我們的觀點，尊重我們的存在。

對待指責我們「反對改革」的人，更不用性急，只要讓他看看我們的有關文章就行了。對於「搞民主運動會給保守派向改革派提供口實、給改革派製造麻煩」的論點，倒要認真對待。對於這個論點，我們用以下數點來回答：①保守派是客觀存在的，它一定會用各種藉口反對改革；②民運派是支持改革的，只是要求改革的幅度再大一些，要求政治、經濟協調的改革；③改革派在面對保守派的抗拒下進行改革，的確很難。在此情況下，改革派有兩種選擇：一是過份遷就保守派、甚至有時用壓制民運的作法換取保守派的諒解，以求妥協；二是真正地相信人民，相信青年，相信民主運動，與民主派聯手合作，迫使保守派作出更大讓步，將改革不斷向前推進。歷史的教訓表明，改革派（改良派）往往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常把民主派人士視為一種「破壞、搗亂」的因素加以壓制，甚至犧牲民運人士向保守派妥協。這樣做的結果是孤立了自己，在保守派的反撲下，勢單力薄，最後導致失敗、覆滅的命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等，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保守勢力太強，而改良派又不依靠人民之故。我們擔心，今日改革派也會步他們的後塵。反之，如果改革派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就應該給民主運動的力量聚集創造一定條件，就應該與民運人士聯手作戰。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地抵銷保守派的力量，才能頂住保守派的反攻，才能保全改革派自己。如果中國共產黨改革派中出現匈牙利納吉和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那樣敢於依靠人民的有魄力的人物，他們一定會贏得人民和民主派的支持，一定會成為劃時代的巨人。

當前，民主運動與共產黨改革運動同時進行，在這一特殊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認識是難免的。我們一定要用理性的態度去分析、去對待。至於民族性的改造及國民素質的提高，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我們最好的作法是，先從糾正我們自身的民族性的劣根性開始，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民運團體內建立起一整套的規章制度，並帶頭遵守這些規章制度，把中國民聯辦成一個民主運作的試驗場。只有當中國民聯向世人展示出，她本身可以學會民主運作時，民主運動才會發揮出巨大的凝聚力。

五、國共兩黨頑固派對民運的干擾

海內外配合的民主運動是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開展起來的。這個政治夾縫的條件，給民運既帶來了某些方便，也帶來很多困難。

截至今天，中國民聯不能擺脫國共兩黨頑固派一推一拉的干擾，維持獨立形象十分不易。

先看一下共產黨頑固派的「推」。共產黨頑固派及其代言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場合，散佈一切可以散佈的言論，將中國民聯往台灣國民黨方面推。他們利用黨報「人民日報」著文、向留學生灌輸、借某些「中立」人士的筆撰文攻擊等手段，企圖把中國民聯打成「國民黨出錢支持」、「跟着國民黨跑」的一個團體，恨不得把中國民聯一下子推到國民黨的懷抱裏。他們利用中國大陸人民過去對國民黨沒有好印象的心理，以為只要把中國民聯打成國民黨，就萬事大吉。他們操縱海外左派報刊，指令左派報刊歪曲、封殺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消息，甚至拒登中國之春的廣告，以此給讀者造成一種假象：中國民聯只與右派報刊聯繫。

奇怪的是，中共頑固派從來不敢正視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的觀點，中共頑固派也從來拿不出中國民聯受國民黨資助的任何證據。

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某些頑固派則想盡一切辦法把中國民聯往自己的懷裏「拉」。他們在中國之春運動早期，除一廂情願地宣傳「中國之春」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產物外，還曾拉攏中國之春雜誌社的工作人員。當這一行動被我們揭露並將投靠國民黨的人清理出去之後，他們仍不甘心，例如，他們費盡心思策劃以前曾在中國之春雜誌社短期工作、但因觀點右傾等原因而早已離開中國之春的某人士訪問台灣，在「中央日報」大幅報導時，竟給該人士仍冠以「中國之春骨幹」的頭銜。受國民黨影響的親台報紙，在報導中國民聯活動時，常經過過濾加工，使中國民聯形象向右扭曲。有的親台報刊刊登中國之春雜誌廣告時，有意把批評國民黨的標題刪除。國民黨的某些頑固派人士以為，只有將中國民聯劃入國民黨的勢力範圍，才能壯大他們自己的聲勢。另外一種國民黨的頑固派，則以「非友即敵」的心態看待中國民聯，把中國民聯打成中共改革派的某一派別。

看來，國共兩黨的頑固派都不願意看到一個獨立力量的形成。在國共兩黨一推一拉的配合下，某些人對中國民聯的獨立性的確產生了懷疑。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某些以「中立」面貌出現、實則與中共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士，也跟着中共頑固派的指揮棒，千方百計把中國民聯打成國民黨。這種人比中共頑固派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因他們往往打着「中立」的旗號，更能迷惑不明真相的群眾。

我們如何解除「一推一拉」的干擾呢？
首先，我們要在邏輯上粉碎中共頑固派的宣傳。我們要問中共，你

們不是一再向國民黨投以統戰微笑嗎？不是稱呼國民黨為「兄弟」嗎？那麼，你們把中國民聯打成國民黨的「一部份」，你們為什麼不對這「一部份」進行統戰呢？你們為什麼非要把這「一部份」置於死地而後快呢？你們這樣做，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統戰誠意嗎？連一個中立的團體都容納不了，怎麼能讓人相信能容忍國民黨？

其次，我們要以果斷而有效的措施，停止中共頑固派及其幫腔人的誹謗和造謠中傷。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它既保障言論自由，又不允許造謠誹謗。如果他們繼續無端地製造謠言，在適當時機且有充分證據時，我們準備理直氣壯地對誹謗者訴諸法律，以正視聽並維護中國民聯的尊嚴，使造謠者在拿不出證據的情況下，自破其說。

第三，用實際行動、而不是只用語言維護中國民聯的獨立。凡發現有人在行動上投靠國共兩黨的，我們都勸其不要留在中國民聯之內，因中國民聯不依附於國共兩黨。願意依附國共兩黨的，我們尊重你的選擇，但沒有必要再加入中國民聯。比如，中國之春運動的初期，我們發現個別人被國民黨頑固派拉了過去，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然措施，請其離開了中國之春。過去，我們堅守了這一原則，今後也要堅守這一原則。

第四，我們要奉勸國民黨的某些頑固派，不要再在暗中配合中共損害中國民聯的形象。我們希望台灣的宣傳媒介能夠客觀地報導中國民聯。國民黨應該認識到，自己的那套反共八股宣傳，已對大陸人民和大陸留學生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們也希望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支持中國民聯，支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只有大陸有了一個制衡共產黨的力量，台灣的安全才有保障。

第五，我們要向世人講明，我們現階段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這點無須諱言。然而，批評大陸的專制制度、促進大陸的民主化過程，並不等於認同國民黨。就像台灣黨外批評國民黨並非認同共產黨一樣。

六、我們尚未學會民主的運作

我們都自封為搞民主運動的，但是，要問一下，民主的基本涵意是什麼？民主政體要具備哪些特點？什麼叫民主的運作？現在各個主要民主國家的民主運作方式是什麼？不能圓滿回答上來的人，恐怕並非極少數。自己都不懂得民主運作的精神及實質，怎麼能把民主運搞好呢？

以下幾種情形曾經發生、或者正存在於我們的組織之中：

一、一個小組只有三、四個人時，一般相處不錯；但當擴大成八、九個人或十人以上時，便開始了糾紛，有時甚至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

二、有人在組織內一提不同的意見，馬上就有別人指責其「別有用心」；

三、稍不合自己的意，便揚長而去，批評某某人獨裁，甚至否定整個團體；

四、不注意制訂規章制度，工作人員權責不明，作事毫無章法；

五、有的人要求事事知道、事事表決，否則就稱：「這是不民主團體」；

六、有人寫稿給中國之春雜誌，稿被拒絕時，抱怨中國之春雜誌不民主、中國之春雜誌沒有言論自由；

七、有人對團體內的某個人、特別是某位負責人有不同看法時，抱著「有他無我」的態度，稱什麼「除非把某某清除，我才留在團體之內」；

類似現象，我們還可舉出很多很多。

這些現象說明了一個事實：我們還沒有真正領悟到民主的內涵，我們還沒有真正學會民主的運作。

民主的內涵之一，是不同見解互相包容，互相諒解。如果我們這一群本身嚮往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之間，都不能互相包容，互相諒解，還談得上什麼推展民主？金無赤足，人無完人，這是人類建立民主社會的前提，否則，我們找出一個聖人，讓他永遠統帥我們就行了。誰能無錯？誰能永遠順心？當我們看見團體內不合己意的現象時，當我們見團體內某位負責人和某位成員不順眼時，第一個心態往往是抵觸和排斥，發展下去，則是分裂。錯了，我們應該把第一個心態換成容忍和耐心，以此為出發點，再設法改變現狀，在改變中，不斷調整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國人難以合作、沒有團隊精神，多少篇文章，多少個演說，多少個生動的比喻，都討論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為什麼至今仍然收效甚微？我看，主要是大多數都停留在口頭上。我們應該在團體內開展一個活動，叫作「我如何與別人合作」的活動，是從「我」開始做起。看到一個成員，辦任何一件事，先要問一下自己：我怎麼與他合作？我怎麼與有關的人協調？

當然，目前中國民聯內缺乏團隊精神，也有其客觀原因，那就是我們在海內缺乏專制制度的外在壓力。往往是，外界壓力越大時，內部就越團結。但客觀缺乏外在壓力決不是內部不協調的主要原因，西單民主牆及民刊運動時期，外界壓力夠大了，但民運內部還是四分五裂。

我們應該汲取教訓：如果民運內部不能學會互相容忍，互相合作，



盼民主

那麼，民主運動就永遠是一群烏合之衆，就永遠沒有絲毫的希望！你個人追求民主的目標也就永遠不會達到！

民運團體內部顯得分散的另一客觀原因，是我們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量，而且，我們本身也不能建立強制性的約束力量。世界上，最有戰鬥力的組織是軍隊，因為全體緊密結合、目標一致，逃兵者，必受外在強制力——軍法的處置。帶有幫會性質的各國共產黨，大都演變為靠強制力維持的組織。你只能加入，却不能脫隊和背叛，否則，托洛斯基的被刺就是你最好的下場。共產黨執政後，其組織的穩定除靠幫會性質的強制力外，主要靠官僚架構及權力所提供的利益。中國民聯要牢牢記住共產黨的悲慘教訓，永遠不走共產黨的老路，永遠不搞靠外在的強制力維持的嚴密性幫會性組織。那麼，中國民聯靠什麼來維持呢？我們要靠一致的信念和每個成員自身的名譽。那些不顧個人的名譽、自己背叛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一不合己意就造民聯的反、鬧反戈一擊的人，也是難的被其它的民運團體所接納的。想一想，你今天殺回馬槍，明天反戈一擊，就已經在「能否與他人合作」這一條上做了記錄。有了這樣的公開記錄，有誰還敢與你合作呢？如果說，民運團體也需要一些外在約束力的話，這種約束力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和社會對喪失信譽者的無情。你加入民運團體時，滿口「民主」、「容忍」、「團隊精神」、「奮鬥到底」，可實際的作為却是反戈一擊式的「不容忍」、「不合作」，是一不順心就退陣的動搖，這也是一種信譽差的表現。多元民主社會的穩定，靠的是法治、制衡、宗教（道德）和信譽。在美國等多元民主國家，信譽差的人，只能做個「小混混」，成就不了大事業。

我之所以談這一點，是因為我為某些人感到可惜。中國之春運動早期及中國民聯建立初期的個別人，表現得比誰都積極，能力也不錯，但就因為缺了點容忍與合作，後來脫離了隊伍。默默從事其它工作也罷了，可就是有那麼極個別的人，發聲明，寫文章，來它一個回馬槍。到頭來，被中共利用，給民運帶來了一些損壞，自己也終將被社會所無情地冷遇。

我們與國共兩黨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不去譴責他們，我們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我們只是為他們感到惋惜。我們要做的，只是檢討自己，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說錯了話，做錯了事，以致傷害了他們的感情，同時，也檢討自身規章制度的不完備性和不合理之處。

在民運團體內，不順心、不完全符合己願的事會經常出現。怎麼辦？既然你投身了這個事業，既然你堅信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既然你相

信民聯大多數人是崇尚民主原則的，就應該設法使別人接受你的見解，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團體內部施展你的影響。另一方面，當你的意見被否決時，就應該服從多數。

講到這裏，我要着重談一下尊重少數的觀念。任何一個團體，分裂出去的人總是少數派。固然，分裂出去的人往往有不甘服從多數的意向，但多數人（他們是在民主選舉的團體內掌權的）不尊重少數人的意見，也可能是導致少數人憤而離去的原因。只講服從多數，不講尊重保護少數，不是完全的民主概念。例如，十個人的組織，九人舉手要將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送上斷頭台，如果服從了這九個人的多數，這個團體不能算是民主團體。只有給那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表達、說理的機會，保留他的組織成員資格，允許他今後申辯並爭取別人的支持，才叫民主的原則。要知道，保護了少數，也就等於保護多數本身，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隨時變成少數，在甲問題上你屬於多數，在乙問題上就可能屬於少數。懲罰少數的人，最後的懲罰定落在自己頭上，這就是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命運（在中共「九大」時，他們的確是黨內的多數）。少數派，也就是一個團體內的反對派，我們一定要使反對派在中國民聯內部合法化。關於此點，我要在另一篇發言稿中詳談。

要記住，把反對派合理意見悄悄吸收過來的人，是最強的人。

要把民主觀念與泛民主意識區別開來，當然，區別兩者需要很高的民主素養，有時，兩者的概念甚至是部份重疊的，而且，重疊多少，常常隨時空而變。這裏，有個掌握分寸的問題，待人處事，最難的，就是把分寸。比如，在美國這個目前最徹底的民主社會裏，現在很強調公民「知」的權利。但是，老百姓應該「知」多少，一直爭論不休。國家機密不便叫普通老百姓知道，這是常識。可是，什麼算國家機密，又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一種看法是，機密的定義權應該歸於權力機構，然而，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競選權力機構的官職，你做上什麼官職，就有權知道什麼級別的機密。這是民主嗎？你可以批評它不民主，因為，你即便當了市長，也不知道州政府、白宮的機密，「知」的權利被剝奪了。反之，你也可以讚揚它很民主，因為你可以通過民主選舉，競選州長、總統之職，選上了，「知」的權利就有了。在多元民主社會，總的傾向是老百姓「知」的權利正在擴大，然而永遠達不到平民與總統共知的程度。如果你不在其位，却謀其所有之「知」，大概屬於泛民主意識之列。

在我們中國民聯內部，也有一個「知」的權利問題。盟員們當然想

知道的多一點，但顯然並不是一切秘密都必須讓每個盟員知道。如與國內的商業聯絡，某些要求保密的捐款人等。就是一個普通的商業機構，也有它的商業機密。怎麼解決「知」的權利與保密之間的矛盾？只有用民主運作的辦法：每個盟員都有平等的競選民聯各級負責人的權利，選上了，自然就知道有關的情形了。至今，我仍承受着這樣一種輿論壓力：「為什麼王炳章能找到有錢的人？為什麼他與國內有那麼多聯繫？為什麼我不能？他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們在民聯裏有什麼權？」這種輿論甚至散佈到組織外部。其實，從我決定獻身民運時起，我已沒有什麼個人秘密可言，我是民聯中「不可告人秘密」保留得最少的人——我的私生活，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很多弱點、毛病和錯誤，早被新聞界掀開了。我的觀點、立場和理想，也都毫無保留地向世人公開了。正因為我已沒有太多的個人秘密可言，別人才瞭解我，相信我，才肯把一些秘密交給我，讓我替他們保守秘密。就我個人而言，我何嘗不願多保留一些個人的隱私？何嘗不願讓別人多分擔一些我所承諾的替人保密的工作？試想一下，你不願在全世界面前公開你的身世、你的立場、甚至你的真實姓名，不願做一點兒犧牲，有誰敢把錢捐給你？有誰敢把國內的關係交給你？事實是，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能找到有錢的人、能找到國內那麼多關係（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多半是別人找到我的頭上，因為他們認為與我聯繫更為放心。在一次演講時，一個留學生說：「留學生回國，四化才有希望，你有那麼好的專業知識，做民運工作實在可惜。」我應答道：「此話不錯，我們就是鼓勵留學生都回去，我在適當時機也要回去，留學生都成了王炳章，天下大亂，中國沒有希望；然而，留學生中一個王炳章不出，一潭死水，中國更沒有希望。我們起碼開創了一個自由討論的氣氛。現在的問題是，像我這樣不顧一切站起來講話的人太少了，應該多出幾個。」我誠摯地希望大陸留學生中多出些有膽識、有魄力的人，積極參與民運的工作，並在我卸任之後，接替我的職務。

民主觀念與泛民主意識容易混淆的另一個問題是：什麼議題應該表決？是否事無巨細一律表決才是民主？美國議會在通過法案時，一定要表決，一人一票。美國總統做決策時，只是諮詢、協商，不能叫幕僚們一人一票地表決。即使多數幕僚反對，總統下了決心，其命令照常下達。是否可以說，美國總統很獨裁呢？這裏有一個立法與行政的區分問題，也有一個權限的明確劃分問題。立法時，一定要一人一票；行政辦事時，講貫徹執行，只要最高行政首長是民選的就行了，二者都是整個民

主運作機器的一部份。我們中國民聯總部及分部的日常辦事機構，也是一個行政機構，不可能事事交由大家表決。

在民主運作上，中國民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章法不細，權限未明，各項規章制度不健全。二年來的教訓說明，規章制度不健全，是產生內部磨擦的重要原因。將來，隨着組織的發展，大家越來越會感覺到，健全組織運作的程序法則和規定各級負責人的職權範圍，是整個團體健康發展的決定性一環。比如說，現在有人批評我搞獨裁，有些事情未跟大家商量就做了。我可以辯解說：組織法中沒有規定主席有權做什麼，無權做什麼，沒有規定什麼決策應交付常委會表決，什麼決策可由一人做出。我相信，各部份負責人也有類似問題。因此，健全組織法，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一切照章行事，是防止內部無原則爭論所必須的。立法不全，必然滋生「人治」現象，使組織處於不穩定之中。我們要用健全的組織立法，而不是用權威把組織穩定下來。我們不是追求「法治」嗎？先要在自己的團體內實行「法治」。沒有「法治」，根本說不上民主運作。有人不相信「法治」及規章制度的作用，總是強調用感情和良好的人際關係維繫團體。不可否認，兩者都是必要的，但中國人缺少的，正是「法治」的精神，我們應加強此點。從長程來看，只有在團體內實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團體才有希望。在這方面，我們要汲取共產黨的教訓。共產黨的組織法對主要負責人的任期、權限根本沒有明確的界定，給家長式的獨裁統治提供了方便。

民主運作是在實踐中學會的，我們不可能先學會民主運作再來搞民主運動，就像不能先學會游泳再下水一樣。關於如何在民聯內實踐、演習民主運作的問題，我將在另一篇發言稿中詳談。

七、民運工作者的某些具體問題

中國民聯全時間工作者的某些個人問題不能解決，也是民運工作發展中的一大具體困難。這方面的困難，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

大陸留學生都有學業在身，中斷學業到總部、編輯部工作，面臨着學生簽證如何延續、如何申請合法工作等具體問題。假期的短暫參與，使人員流動較大，不是長久之計。

大陸留學生還有一個身份暴露問題。參與工作容易暴露身份，在北京當局尚不能容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情況下，身份暴露後回國如有政治迫害跡象，暫時留在海外一段時間是必要的。居留簽證怎麼延長？

是否申請政治庇護？都是棘手的現實難題。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工作待遇問題。整個團體靠盟費、銷售雜誌和募捐維持，經費十分拮据。工作人員的薪俸較低，有能力、有獻身精神而又拖家帶口者，我們無力聘請。

很多有價值的計劃，在上述一個具體困難面前，均無法執行。俗語稱，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涉足我們的具體工作，的確難以體會到它的艱辛。

大家總以為中國民聯人才濟濟，不錯，盟員中有才華的真是大有人在，但能夠克服重重具體困難，做全時間工作的，却很缺乏。

總部及編輯部急需具有如下條件的人才：①有工作許可（移民或公民身份更好）；②有大陸生活背景（近年出國者更好）；③不求高薪，主要求工作的榮譽感和成就感、有一定的獻身精神和敬業精神；④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水平；⑤認同中國民聯目標。希望大家給我們推薦人才。

八、結束語

向困難挑戰，是我們的光榮職業；克服困難，就意味着創造。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是在歷史包袱最沉、專制最久、人口最多的國度中開展起來的，其任務的艱巨性，自人類有史以來，可謂首屈一指。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為能夠承擔這一艱巨的任務而感到榮幸。

中國大陸自文革之後，整個社會開始解體，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都在發生劇烈的變動。海峽的另一面，受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衝擊和面臨中共統戰壓力的台灣社會，必須突破陳舊法統的束縛並在不久的將來面對大陸。海峽兩岸的中間地帶香港，在十二年的過渡期內，將充滿中共干涉與港府反干涉的鬭爭。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是大陸、台灣、香港都在尋求出路的時期，是中國社會真正「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有條件向民主社會起步的時期。歷史已把機會呈現在我們這一代人的面前，我們把握時機，將會大有作為，我們錯過時機，將會永遠受到後代的譴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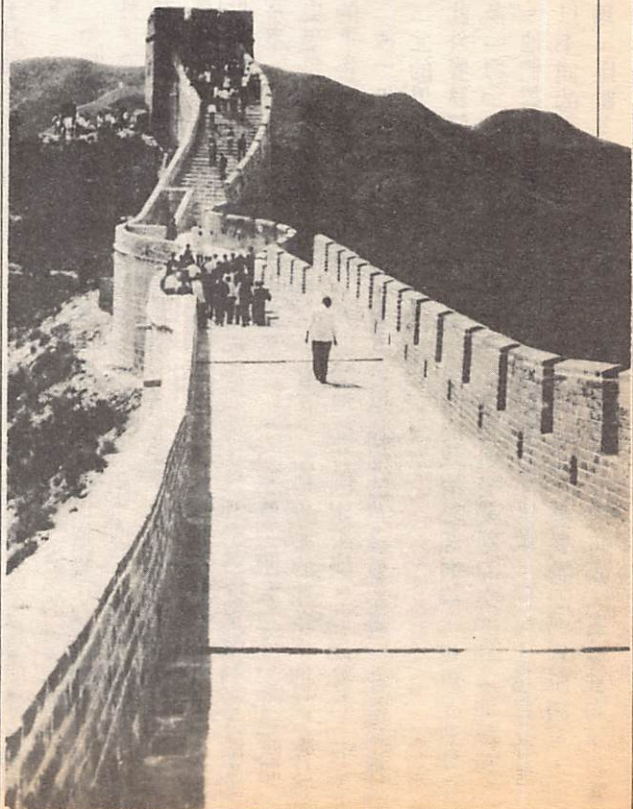
我們大家既然認同了推動社會大變革的事業，就要積極參與這個事業，就要細心愛護這個事業。只要我們既有遠大的理想，又能面對困難的現實，我們就能把民主事業不斷向前推進。

我們應該豪邁地宣佈：再過二十年，中國必將屬於我們這一代。

爲實現中國文化由一元 向多元的轉化而努力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民聯二大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王策



目錄

引論：福澤諭吉的啓示——「一個因素」與「兩個因素」

一、中國文化一元化結構形成的歷史

1. 「皆原於一」——夏、商、西周時期形成的政、學、神三位一體的一元化文化結構雛型。

2. 「諸侯異政、百家異說」——春秋戰國時期多元論思想的萌芽及其多元政治局面對一元性文化的反動

3. 「焚書坑儒」與「獨尊儒術」——秦漢時期一元性文化結構的確立與鞏固

二、中國一元性文化的特點及其消極後果

1. 中國一元性文化的特點

2. 中國一元性文化結構通過共產主義而「借屍還魂」

三、中國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的途徑

1. 西方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途徑之對照

2. 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嘗試

3. 中國當代文化轉型的途徑

結論：散勢——當代中國的縱橫論

引論：福澤諭吉的啓示——

「一個因素」與「兩個因素」

研究近代社會發展史的人往往會注意到：同位於亞洲的中國與日本兩國，過去也都是封建專制國家，何以會在走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道路上經歷其不同的命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作了比較順利的過渡，而中國則歷經坎坷，至今仍陷於類似封建主義的專制制度之中，原因何在？

對這個問題會有許多人嘗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予以解答，但最富於啓示意義的當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一番分析。他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對該問題所作的探討，實際上已觸及了一種文化的結構形態如何制約影響社會發展的問題。

概括起來說，福氏認爲中國的封建文化表現爲一種「神人合一」的政權，這種政權把君主尊貴的道理完全歸之於天，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爲一，用以統治人民，其結果使人民的思想「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他說日本之所以不同，是由於到了中古武人

執政時代，逐漸打破了這種集至尊與至強於一身的社會結構。從此王室不能掌將軍的武力，而幕府也得不到王室的尊位，至尊與至強的思想取得了平衡，在這兩者之間留下了思考的餘地，為思想自由開闢了道路。所以他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中國人是單純的，日本人是複雜的」。原因即在於「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因而日本人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文明。他預言在這種文化心理結構上「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改革，就不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

福澤諭吉的這一分析，其意義即在於指出了中國文化的一元性本質結構及其影響民族心理與社會發展的嚴重性，予人以深刻的啓示，本文亦將以此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而要討論這些問題，還得從中國文化形成的歷史說起。

一、中國文化一元化結構形成的歷史

1. 「皆原於一」——夏、商、西周時期形成的政、學、神三位一體的一元化文化結構雛型。

我們看到，福澤諭吉所指出的中國「神人合一」政權的歷史，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夏代及隨後的商代。根據文獻記載，「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禮記·表記」）他們尊崇天命、上帝，把最高的統治者視為「天之元子」，有「步於上帝」（「尚書大傳」）「格於皇天」（「尚書·周書·君」）的神權，其祖先神與上帝幾乎是合一的。可見中國從開始進入文明社會時，其意識形態已具有一元性的特點，統治者是把天命神權和社會政治上的統治權結合在一起，以維持其氏族宗法之治。進入西周時期，我國出現了最初的大一統局面。「周監於二代」，繼承了夏、殷「神人合一」的意識形態，史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聖治」）

但應當指出的是周代雖然繼承了天命神權的意識，但實質已有所變化。由於周取代殷，故在理論上必須說明殷之天命何以會移於周？為此，周代統治者提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的解釋。文王是作為道德的化身而與上帝配祀的。如周人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頌·唯天之命」）所以周之「道術」雖然仍認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莊子·天下篇」）但是其「以天為宗，以德為本」（同上）的思想，通過以社稷祀天與上帝，以宗廟祀先祖先王的二元神崇拜，而微露其天、德二元的因素。

隨着政事與意識形態的日趨複雜，在西周更確立了「學在官府」的文化制度，由一些祝、宗、卜、史等政府官吏來職掌文物冊典，以執行其敬天、崇德、尊親、孝祖的宗教祭祀及文化教化工作。至此，在中國文化中政治不僅與宗教，而且還明確地與以倫常道德為核心的學術文化結合起來，形成政、學、神三位一體的一元性結構雛型。

不過西周形成的這種實際上含有天、德二元因素的一元文化在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曾經一度動搖。

2. 「諸侯異政、百家異說」——春秋戰國時期多元論思想的萌芽及其多元政治局面對一元性文化的反動。

可以說正是西周的天德二元的因素，給人們的思想留下了思考的餘地，進入春秋時期，曾產生我國古代政治多元論思想的萌芽。如史墨認為君與臣作為二元的存在，甚至可以易位，條件就在修德與失德。他與趙簡子討論「季氏出其君」一段，實是我國古代政治多元論思想的輝煌表述。

「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衿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史墨指出了事物有兩，有三，有五，都是多元的存在，即使是作為副貳的事物也可轉化為主位，君臣的地位非固定不變，問題在於「世從其失」或「世修其勤」。這一君臣可以易位的革命性認識，顯然來自天、德二元的思想，並進而以德來取代天了。

此外春秋時期關於「和」與「同」的政治思想討論，也就是哲學上的「多」與「一」的問題的探討。如史伯與晏嬰都力主「和」而反對「同」。他們認為臣屬的政見如一味聽同於君，叫做「同」，毫無足取；只有以不同的政見去匡正其君，才是「和」。晏嬰說：「君所謂可，而去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獻其可，以去

其否。」「左傳·昭公二十年」從而在哲學上得出要「講以多物」的觀點，應為「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主張和多而反對「剽同」。總之「和」「同」問題成為春秋時期理論界所討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如孔子也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在意識形態領域這種反對同一思想行為的多元論傾向為隨之而來的百家爭鳴時代作了思想解放的先導。

周代的政權，從西周末年的厲王、幽王開始已走向衰微。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的權威更為下降。由春秋而戰國政權逐步下移，以至出現「陪臣執國郭」的現象，而經濟基礎也經歷着一場大變革，「土地所有制由氏族貴族的所有制，轉化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45頁）隨着中央政府權威的下降，權力的下移，學術也由「官學」變成「私學」，而走向民間，出現了庶民議政的現象，而且形成不同的學派，互相辯論詰難。所謂「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徙而訟。」（「淮南子·俶真訓」）從而揭開了我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最富有生氣的百家爭鳴時代。

應當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政治史上是一段政治比較民主，學術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而百家爭鳴實際上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多黨議政的一種嘗試。首先由於周代的敬德保民思想，產生了对民及其言論的重視，如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左傳·季梁諫追楚師」）孟子曾引「泰誓」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亦可表明那個時代的空氣：從西周末至春秋，庶民議政已較普遍。史載周厲王因禁「國民之謗」，即不准人民自由發表議論，結果被國民所流放，產生共伯和的攝政，史稱「周室共和」。鄭國人游於「鄉校」，議論政治，子產不予干涉，孔子稱之為仁。鄭國在春秋後期，當是思想比較自由化的地方，早期的法家兼名家的鄧析，就是當時一個在鄭國很活躍的民間政治法律革新家。他自著「竹刑」，為人家包打官司，也許是中國有史記載的最早的律師，收費標準是「大獄一衣，小獄襦褲」（「呂氏春秋·離渭」）開個玩笑說，他還是中國二千多年前貼大字報辦民刊，搞民主牆的老前輩。據說：「鄭國多相懸以書者（把大字報在牆上掛起來），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寫成小字報等送上去）；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把它們刻在牆上）。」（「呂氏春秋·離渭」）後來鄧析為變革犧牲了生命，而「竹刑」也終於被統治者所採用。

隨着庶民議政，及政權與學術下移，戰國時期出現了一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荀子·解蔽」）的政治學術多元局面。思想禁錮的衝破

，使國人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據說「中牟之人，棄田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庶民議政由個人而形成集團，這些集團雖然說是學術團體，而事實上即是持不同政見的政黨。前人指出：「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淮南子要略」）即揭明了其政治意義。打個比方說，儒家講復周禮，行仁政，重德治，近於保守黨；墨家兼實，重利，尚賢，近於維新黨；法家講法治，鼓勵耕戰，廢公族，開阡陌，近於革命黨；縱橫家講外交上的離合，策略的運用，是智囊式的政治家，道家一部分講崇尚自然，無為而治，是自由主義者；一部份講陰柔權謀近於法家與兵家；名家近於法家，揚朱一派則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還有陰陽家則通過觀察推演陰陽五行變化消息來預言國運的興衰，朝代的變換，是一些神秘主義者，有「五德始終」之說。史稱「鄒衍以陵陽主運，顯於諸侯。」（「史記·封禪書」）

最具組織的當推儒家與墨家。如「呂氏春秋」說：「儒、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有度」）孔子集團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司馬遷說：「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記」）戰國時的儒家領袖孟子也很有氣派，出遊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敢於當面批評國君，儼然為一黨魁。墨家組織更為嚴密，墨子有「弟子禽滑離等三百人」，是個敢死隊，「皆可使赴火蹈湯，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曾以此為後盾，止楚攻宋。墨者穿統一的衣服，「以裘褐為衣，以跣履為履」；領導人稱「鉅子」，訂有墨者之法，對成員操生殺之權，被鉅子派往各國作官的門徒如不能推行墨者的政見，就要辭職，收入要上繳部份作「黨費」。足見其組織十分接近於政黨而非純學術團體。

春秋戰國時期，除了民間組黨干政外，當政者也掀起養士之風。有私人身份的養士，如著名的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四大公子，都養有大批的門客。也有國家開學宮的養士，如齊國的「稷下學宮」，就有點像議院的味道，「稷下學士」像「議員」，人數達千餘，有七十六人列為上大夫。學士們皆「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人員各派「兼容并包」。荀子曾三次出任「祭酒」，相當於「議長」的職務。

春秋戰國時期的多國并立，多黨議政的政治局面，產生了與其相應的多元文化哲學理論，這種哲學當推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為最高成就。從西周的天、德二元因素，發展到荀子的「天人相分」，是當時哲學思想的一大飛躍。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荀子明確地區分了神與政主張「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論」）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明確地把神與政區別開來，是對政、學、神三位一體的一元性文化結構的衝擊。荀子主張「制天命而用之」，代表了當時的多元文化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此外，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齊物論」）的多元真理觀，也代表了否定權威，思想解放的傾向。

百家爭鳴造成了中國古代文化最繁榮的局面，以後除佛教文化影響之外，古代中國文化的內容基本上沒有超過先秦百家的範圍。許多學說即使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都還有值得繼承借鑒之處。如儒、墨中的民主、博愛的人道主義因素，法家的法治精神，道家的重自然與自由的精神等等，都是可貴的中國文化遺產。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運動，本質上是一場以較自由民主的方式討論如何實現封建大一統的專制之治的運動，存在着一種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因而隨着專制大一統國家的建立，百家之說既已完成其歷史使命，爭鳴的局面也就隨之結束，而統治者為鞏固其一元化的專制之治，又重新開始尋求一種一元性的文化理論為其服務，歷史也就進入了由多返一，重建一元文化的秦漢時期。可以說百家之說為封建大一統的文化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根據，使之有可能形成一套嚴密完整的理論；但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坟墓，這就是先秦百家的歷史悲劇。

3. 「焚書坑儒」與「獨尊儒術」——秦漢時期一元性文化

化結構的確立與鞏固。

秦漢初期，曾經歷了一個以儒、法、道三家何者為統治思想的探索鬥爭階段。

在秦統一中國前夕，秦相呂不韋曾集門客寫成「呂氏春秋」一書，試圖為秦統一後的文化模式提供藍圖。此書以道家為主，所謂「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高誘：「呂氏春秋·序」），「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但由於秦始皇用韓非以理論統一中國，而且秦早期又是以商鞅變法走向富強，所以迷信法家學說，終於在統一全國之後，出現「焚書坑儒」，毀滅文化以「愚黔首」之舉。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恢復了西周「學在官府」的文化專制傳統。秦亡之後，漢初鑒於秦之嚴刑苛法，暴虐百姓之非，採取了一條道家「無為而治」的不干涉主義路線，與民休養生息。這種不干涉之治，在漢初尊道家的「淮南子」一書中似乎得到理想的表述，所謂「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分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教，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淮南子·齊俗訓」）漢初六、七十年自由的經濟政策終於造成了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國家元氣得以恢復。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形勢出現一變，史稱漢武帝雄心勃勃，好大喜功，「外攘夷狄，內興功業。」（「史記·平準書」）通過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他不僅在政治上削減郡國侯王的地方權力以加強集權，在經濟上也實行了一條所謂「統一則民不二」的政策。除土地國有外，還將重要的生產及生活資料的製造與買賣權收歸國有。如實行鹽、鐵、酒的官營及平準、均輸政策。國家設經濟官員「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易。」（「鹽鐵論·本議」）還開發起所謂「告緡」運動，史稱「楊可告緡遍天下」，造成「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史記·平準書」）

隨着政治與經濟上的集權加強，漢武帝需要有一套與之相應的大一統的意識形態，而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為出發點的天人一元論文化觀即應運而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甚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度，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一段文字實是此後中國二千餘年實行文化專制的宣言書，而其設計的「天人合一」的一元性文化結構也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架構垂二千年

而不變。

董仲舒天人一元論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陰陽家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及儒家的倫常之序上的。在董仲舒的理論中，天是至高無上，有人格，有道德意志的，人間的君王則秉此意志而進行統治與教化，神權與王權是一致的。他還通過陰陽、五行、四時變化的宇宙圖式，把法律、政治、道德、倫常等統統納入天命的軌道，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春秋繁露·基義篇』）他說：

「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出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董仲舒傳』）「是故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正端』）

此外還說：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王道通三』）

可見董仲舒把大至國家的政治法制，小至個人的性情欲望，全部由上而下地納進了一個封閉的文化模式之中，個人的思考與行動已失去自由的餘地，一切均要由上面為你作出安排，什麼「正」之，「制」之，「教」之，「防」之，已把你死死管定，不容出軌。中國二千餘年的封建文化結構自此定局，其罪魁就是「始推陰陽，為儒者宗」的董仲舒。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董仲舒雖被認為是儒者，但實際上與原始的儒家已大有不同，原始的儒家尚有大量的民主主義因素。拿君臣一論來講，孔子講「君君臣臣」，意思是要君要守君道，臣要盡臣道；孟子講「民貴君輕」，也認為君臣關係是相對的。可見原始的儒家並沒有鼓吹君王的極權專制。到了董仲舒則明確地提出「君為臣綱」，認為春秋之大義是「屈民而伸君」，並且對君進行了神化：「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為神。」（『立元神』）主張人君要「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王道通三』），發起了「一個選神運動，臣民與君主也祇有絕對的服從，聽其宰割了。所以我個人認為『五·四』以來我們把反封建專制文化看作是反孔孟之道，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孔子祇不過是被統治者抬出來騙人的，借用他的一些講仁政愛人民的言辭來粉飾門面。中國自漢以後封建文化政策的實際制訂

者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子。打孔子實是一大冤案。像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主張，實體現了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多元性文化的一種寬容同情精神，值得發揚。

話再說回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在實行文化專制上，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漢一代，就是在官方統制下使儒家學說國教化，一元性的文化走向確立與鞏固的歷史。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博士，立弟子員；宣帝時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常親自「稱制臨決」；平帝時起明堂辟雍，為學者擴充學校，廣置博士，嚴密組織，還召集全國儒生千餘人來京辯說，「正乖謬，壹異說」，文化思想之統制達到「儒外無學，儒內亦不得有派」（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P. 194）的程度；東漢光武帝隆重地召開白虎觀會議，討論儒家經典，連綿好幾個月。會議結果由班固撰成『白虎通義』，由董仲舒為倡以儒家學說為國教的文化體系到白虎觀會議終於取得了欽定「國憲」的形式。此後靈帝時更進一步正定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儒家的學說成爲一種宗教已處於不可動搖的地位。可以說儒家學說在漢代對封建帝王發起了造教運動，從此二者緊密結合，榮辱與共，與中國的封建社會長始終了。

總起來說，中國的一元性文化由夏、商、西周形成雛型，經春秋戰國多元化之反動而動搖，入秦漢而再次確立與鞏固。這種文化在本質上就是福澤諭吉所謂的「神人合一」的文化，也就是「政教合一」的文化。儒家作爲一種法定的宗教與政權緊密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政教合一」政權，此即是中國一元性文化結構的具體表現形式。

二、中國一元性文化的特點及其消極後果

1. 中國一元性文化的特點

中國一元性的文化是一種要素不全，功能呆滯的文化。它以政治淹沒了宗教與學術，抑制了文化在不同層面的發展，造成不健全的民族心理，起了維護專制制度的作用。它是使中國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

首先，作爲中國式的「政教合一」——文化，由於採取了以儒家學說爲宗教，所以使獨立的，具有超越意識的真正宗教在中國得不到發展

。儒教本身是一種政治與道德的世俗說教，其宗教意識僅是其簡陋的天命觀，而作為宗教一開始就成為政治的附庸。漢末雖然傳入了佛教，也產生了本國的道教，但也一直未曾駕凌於政治之上，或取得與其平等的地位。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政治一直大於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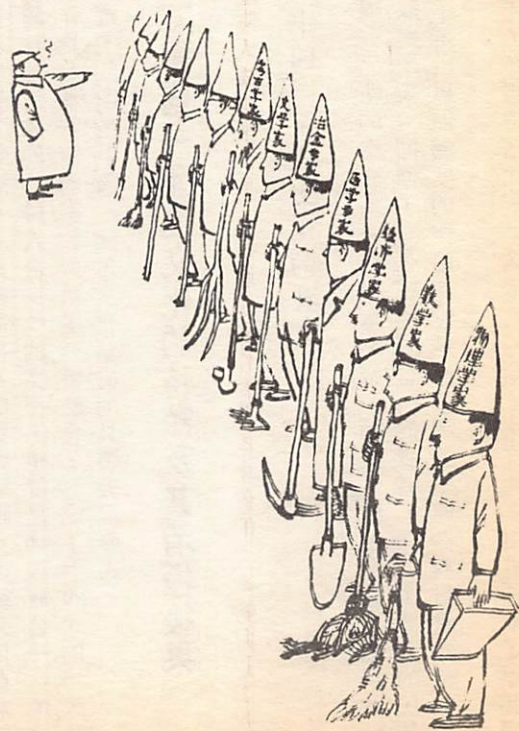
對照西方文化，則經過了一個以宗教為重心的階段。中世紀基督教作為社會文化的主體，深入人心，成為人民的生活方式。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曾指出西方人民的宗教活動在融鑄陶冶其進行近代社會之社團活動及平等交往精神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其論可取。不過我個人則認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宗教存在於近代社會的重要作用，在於轉移了人們對政府權威的崇拜。如西方的大教堂往往矗立在市中心鬧市區巍峨高大，氣勢駕凌於市政府之類的建築物之上。反觀中國的寺院則大都隱匿於山林，對人之心理影響甚微。西方的政治學者曾注意到中國人民對政府權威崇拜的現象，其根源實在此中。

西方文化經過政教分離之後，在人們的心理上產生了兩個并列的權威，用福澤諭吉的話來說，就是至尊與至強得到分離。在心理上投射下兩個重心點，使心理趨向平衡，如產生二重真理觀，科學與宗教也能并行不悖，對不同的事物持寬容之態度，思想也有了自由的餘地，這就是多元性文化的社會心理基礎。

中國的一元化文化由於缺乏宗教與政治的對立，人們的心目中祇是一個中心權威，投射在心理上也就祇有一個重心。這種單一重心的心理結構，產生出如福澤諭吉所批評的思想偏執，胸懷狹窄，頭腦簡單的不健全民族心理功能；持主觀獨斷的一元真理觀，好排他而少寬容；祇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心理容易失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更可悲的是把精神寄託在最高統治者身上，視其為神明，為上帝。什麼「民不可一日無君」，「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完全是認定一個單一主子的奴才心理。如毛澤東已死，竟還奉其殭屍，以為神明，用以鎮壓人心。要知道政治并非神學，政治家也不是神，中國人民如不從這種甘為精神奴隸的心理中解放出來，恐怕永遠也無法擺脫其為政治奴隸的地位。真是「淒涼讀盡支那史，哪個男兒非馬牛？」

中國一元化文化使學術依附於政治，這一現象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不良後果。

首先是學術成為利祿之途，對社會與知識份子都十分有害。從漢初的立博士弟子員，以經師為吏，到隋唐起正式開科取士，實行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科舉制度，千多年來知識份子竟奔於「學而優則仕」的窄門



知識分子命運依賴於政權，喪失獨立人格。

，而金榜題名的畢竟是極少數，廣大的知識份子一生困頓，造成人才智力不能充份利用之損失。由於知識份子之命運依賴於政權，使知識份子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對政權依附的奴性也就成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痼疾。同時由於官方控制學術，使純學術的研究成為不可能。所謂天下之是非析於勢而不析於理。知識份子祇能在官方指定的範圍內進行思考，辯來論去，終不能超出官方的框框。如明代朱元璋還命人刪去『孟子』書中八十五條有關民主性的言論，定『孟子節文』以作考試之用（事見黃廷美：『雙槐歲鈔』）。知識份子既失去獨立思考之權利，也就逐漸失去其獨立思考的能力。可見學術成為利祿之途，對知識份子的人格及思維能力均起了消極的作用。

反之，這一情況對一元化文化結構的維持却起了積極的作用。科舉制度不僅為專制政權解決一個人才的網羅選擇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堅持「政教合一」徹底化的問題。大小官僚既是通過考試儒家教義而甄選的儒生，而且因為精通儒學而獲榮華富貴，自然不會對政權產生離心的傾向。儒教與整個官僚制度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專制統治趨於穩固。這種情況就像現在中共的大小官僚幹部，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工廠

車間、居民委員會的小組長、生產隊隊長均由共產主義的信徒充任一樣，有力地維護了「政教合一」的政權。

其次，從文化的層面來看，這種學術依附於政治的特點造成了偏重對政治倫常道德的研究，從而限制了知識層面的擴大，其直接後果就是造成中國文化中哲學的不完全與科學的不發達。

拿哲學來說，它所研究的對象基本上不外於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宇宙的本質是什麼？二是人與社會的本質是什麼？三是認識的本質是什麼？由第一個問題產生本體論或宇宙論的問題；由第二個問題產生人性論及社會政治倫理學問題；由第三個問題產生認識論與邏輯學問題。中國哲學這三個問題界綫不明，實際上是由第二個問題統率消融了其他兩個方面的問題。對第一個問題則通過簡單的所謂「天人合一」的關係加以處理；對屬於認識問題的知行關係的探討，也僅限於對道德的認識與實踐上，因而本體論、認識論與邏輯學均不發達。也可說，西方哲學的發展路線由宇宙本體論到認識論、邏輯學，而且與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產生近代的邏輯哲學、科學哲學等；中國哲學主要路線是由倫理學到認識論，「爲學之方」祇是研究如何「修己安人」，尋求一種做人的道理，總之與科學的認識論沾不上邊，既然認識祇限於道德，則邏輯學也不必要，所謂：「不能，無害於君子。」（『史記集解』）這種哲學路線將偏向與認識方法的缺乏，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加上利祿之途在皓首窮經，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也祇成爲少數異能之士的興趣，而不能形成社會性的文化活動。這就是中國一元性文化對自然科學的局限。

反之，由於這種文化傾全力於如何加強專制統治的政治理論與倫常道德的研究上，故使中國的專制制度特別發達。自韓非子提出以「法、術、勢」爲核心的專制政治理論以來，中國的治人整人的法術堪稱上乘。而且這種文化所造成的封建倫常禮教對普遍人性之發揚及人格的成長都形成極大的束縛與摧殘。戴震所斥的「後儒以禮殺人」，無異於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以「異端」的罪名殺人。

總之由於中國這種一元性專制文化的早熟，垂數千年而不衰，其形成的硬殼束縛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停滯不前的現象，難以從自身產生向不同形態文化的轉化。到了近代，這種自我滿足，相對穩定的老大文化，終於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戰。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強暴地叩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驟然面對一個完全陌生而強大的文化，真有點手足失措，又羞又急。因而如何調節自身文化，以步入現

代世界文明之林，就成了中國社會命運攸關的課題，從此也開始了中國近一個半世紀來艱難坎坷的歷程。中國人民曾爲此付出了重大的代價，然而這一苦難的歷程至今尚未結束，歷史給我們的課題仍有待於我們去解答。

2. 中國一元性文化結構通過共產主義而「借屍還魂」

中國人民爲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已進行了近一個半世紀的努力，但爲什麼現在的社會反而比過去更專制落後，其原因何在？其主觀原因就在於中國人民在尋求如何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未能自覺地認識到要變革中國的社會，必須要抓住文化結構形態這一環。中國人民雖也曾追求過自由與民主，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都曾提到這些問題，但實際說起來尚浮在表面上做文章，未曾深入到文化結構的層次，所以還會被一些打着民主的招牌，骨子裏却是專制的文化所迷惑，錯誤地認爲這是救中國的藥方，結果給自己反而套上了更大的鎖鍊，至今悔之不及。

問題的嚴重性即表現在中國人民爲求社會的轉型，結果却轉入了共產主義專制文化的死胡同，使曾經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衝擊而一度動搖的中國的舊文化結構終於通過共產主義而借屍還魂，中國社會不能前進，反而倒退，其經驗實爲慘痛。

共產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其原因不外於時代的與文化的這兩個方面。中國社會自鴉片戰爭起進入了一個大動蕩、大混亂的時期，爲了民族之救亡圖存，建立現代富強的國家，人們會先後作過不同的嘗試，但由於舊文化勢力的強大及其他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現代化的目的未能順利達到。社會正處在要變革但又困難重重，作了一些變革但又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不知如何才能變的嘗試階段。正在此時傳來了俄國共產黨人成功的消息，共產主義作爲資本主義的否定物并以其反傳統的面目出現，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因爲近代的中國正承受着資本主義侵略之苦，而要發展資本主義又感到能力不足；同時對封建舊文化的負擔也有所覺，「五·四」以後人們把反帝反封建作爲兩大首要任務來看，而共產主義正以其反帝與反封建傳統文化的面目出現，適逢其時，故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人們天真地認爲共產主義能使中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就能進入一個比資本主義更發達的美好社會，它能徹底解決中國社會的現代問題，這些美好的願望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熱情，爲之奮鬥努力，終於導致了中共在四十年代末接管大陸，這是時代的原因

共產主義學說在目的上散發着一種理想主義的光輝，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正好合拍。中國自從「札記」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以來，一直為人們所嚮往。如太平天國戰爭要在人間建設平等的天國，康有為寫「大同書」，孫中山寫「天下為公」等等，都與中國舊文化理想一脈相承；毛澤東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之路。」（『論人民民主專政』）儼然以實現大同為己任，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實現大同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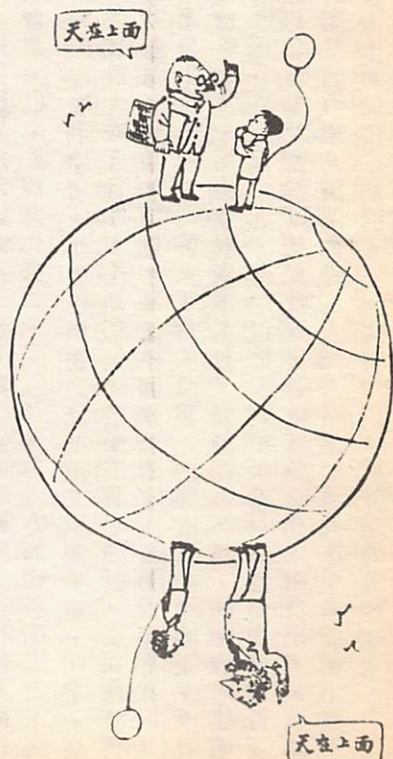
共產主義不僅在理想目的上與中國舊文化有相似之處，其所採取的專制手段也正好與中國舊文化的專制性一拍即合，它們具有一元化的同構性，使共產主義能在中國駕輕就熟，它與中國舊文化的母體結構密切相關。被馬克思設計出來為醫治歐洲先進國家之病的共產主義方案在歐洲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不能取勝，反而在一些原來比較落後的封建國家安家落戶，其原因也即在於此。接受過多元文化洗禮的人民自然不會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絕對的、普遍的真理，至多也祇是被看作是百家學說之一種；而長期一元文化陶鑄的中國人民具有信仰唯一真理的心理結構，一旦儒家學說發生動搖，則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取代心靈的空虛，於是共產主義終於作為新的宗教而取代了儒教，在中國取得了絕對的地位。這就是共產主義何以會被中國人接受的文化背景。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具有宗教的信仰性與排他性，與儒家學說一樣是一種政治性的宗教。它要清滅一切已存在的宗教也從反面證明它自己即是一種極端排他的宗教。具有唯我獨尊的宗教意識。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政權，即是現代「政教合一」政權的新變種，馬克思就是所有的信徒死後要去拜見的上帝，其學說成爲一種政治神學，具有經典的神聖地位。毛澤東作為中國教區的大主教，也已「超凡入聖」，由人化爲神，死後其殯屍還被供奉在聖殿之中，由人民頂禮膜拜。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信仰，用暴力強迫人民無條件接受，稍有不滿即被視爲異端，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將其迫害致死，猶如中世紀基督教迫害異教徒，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如張志新之被割斷喉管再予槍殺，臨死前還不許發絲毫反抗之聲。凡此種種均顯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宗教的黑暗性質。

共產主義在其以政治爲統帥的口號下將學術、文藝、新聞、道德、教育等等領域全都納入自己的軌道，而且通過現代化的國家機器與統制手段，使一元化的程度遠遠超過原來的封建社會。在組織上凡是有人群

天在哪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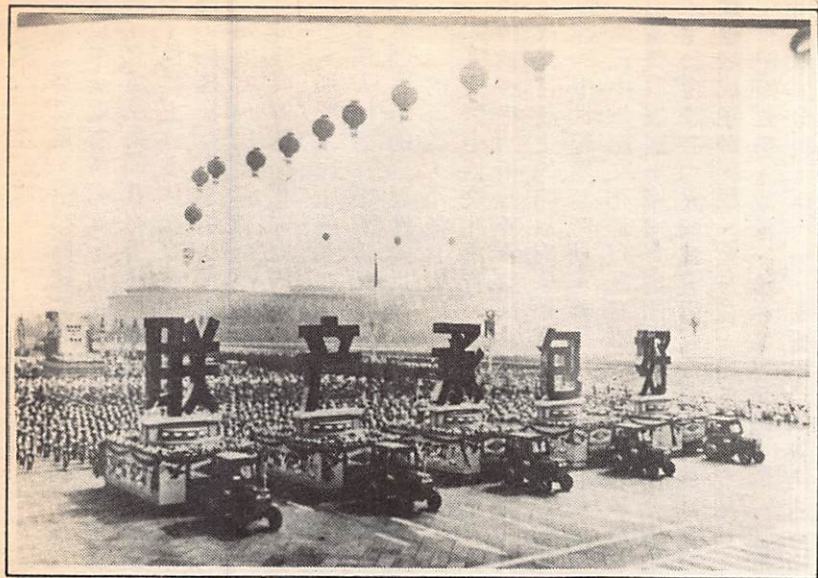
存在的地方全部由其黨徒來加以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動完全喪失自由。使共產主義的「政教合一」達到空前徹底程度的，還有所謂「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制度使黨基本上控制了人民的經濟命脈，從而使中國從封建社會倒退到奴隸社會。

之所以稱在共產主義統制下的中國爲現代奴隸社會，是由於人民的地位更具有奴隸的特徵：即徹底喪失生產資料及人身自由。人民真正是一無所有，等於零。舉個簡單的例子即可以說明問題。如在中國農村某些人民公社食堂，曾實行一種「飯牌」的辦法，生產隊長，也即中共黨官，掌握着農民的飯牌，如認爲你勞動不好或出於自己的好惡，即可把你的「飯牌」吊銷，不給你飯吃，而且可以任意吊打，送監，這不是奴隸性質的勞動是什麼？封建社會的佃農租田耕種，農民與地主的關係尚祇有租稅關係，佃農祇要繳租即可，生活尚能自立，還不致於三餐吃飯要人批准。同時中共在城市實行的戶糧制度及不能自由選擇職業等措施，事實上也就是套在奴隸身上的無形枷鎖。人們不僅喪失遷居、工作的自由，而且喪失其購買直接賴以生存的口糧的自由，使你不得不俯首貼耳，任其宰割。中共要把人變成任其擺佈安插的「螺絲釘」——即古羅馬奴隸制時代「會說話的工具」。而且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猶如張志新。

但算盤總不能全部如意，這種奴隸性質的勞動使人民的生產意願大

大倒退，再加連年政治運動的衝擊，使中國的經濟建設處於崩潰的邊緣。民窮財盡，使堂堂大國蒙羞。中共到了如不再改變其經濟政策就統治不下去的地步，故近來試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如農村的生產責任制與城市的承包制等，改變其奴隸性質的勞動，恢復租佃僱傭關係；同時實行門戶開放等使經濟體制產生帶有多元性的改革，提高了勞動者的意願，經濟有了起色，其成績值得肯定。

但應當指出的是，如果祇有經濟領域的改革而缺少政治文化的自由與民主，則這一改革至多祇是使奴隸社會再恢復為封建社會，而決不能使中國從根本上轉化為現代化的社會。在「四個堅持」與「四個現代化」之下，人們的腰包可能要滿些，但腦袋仍然空空，祇能做一個僅



聯產承包制，改變了人民公社時期奴隸性質的勞動，恢復封建性質的租佃僱傭關係。

得溫飽的愚民。而且沒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經濟改革隨時都有夭折的可能，一個政治運動就可使之蕩然無存。必須使整個文化結構隨同經濟一起由一元轉為多元，才能使中國的社會根本轉型，這就是我們必須加以探討與實踐的歷史課題。

三、中國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的途徑

1. 西方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途徑之對照

由於中國在向現代多元民主社會轉化的途中飽受挫折與困難，造成了理論界的一些錯誤的認識，以致形成輿論，以為在中國文化中缺乏西方民主、法治的傳統，或以為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方封建社會形態不同，所以不可能向現代社會轉型，好像中國人民最適宜於專制之制。實際上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

對這個問題，早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就與嚴復爭論過。嚴復認為古希臘羅馬時期有貴族共和制，這是以後民主制度的胚胎，由於中國沒有這種胚胎，故難以在現代實行民主。梁啟超則認為如果這是民主政治胚胎的話，在我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有過，其實質不過如魯之三桓，晉之六卿，與實行民權的現代民主政治還是兩回事。現在又有人認為西方有羅馬法的傳統，有講法治精神，殊不知我國春秋時期就鑄刑鼎，作「法經」，商鞅早就提出過：「以法治則強，以政治則削。」（「商君書·專強」）主張「法不阿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法治精神決不遜於「羅馬法」。

應當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完全是晚近的事。三百多年前歐洲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布魯諾還曾為宣傳科學及不同的哲學觀點而被宗教裁判所判處死刑，在羅馬活活燒死，哪裏有什麼人權民主可言？就在發表「人權宣言」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繼法皇路易十四之後，連搞革命起家的丹東、羅伯斯庇爾、羅蘭夫人等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在被認為世界最民主自由的國家美國，也是在百多年前通過南北戰爭才廢除了野蠻的黑奴制。所以說西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現代社會的要素與其說是來自傳統，還不如說是由於人類理性的覺醒，通過腥風血雨的鬥爭而得來，其本質是反傳統的。

我們現在之所以着重於研究專制的傳統文化，其目的也祇在於要認清轉型的困難所在，以便在節骨眼上開刀，而不是為現代中國的缺乏民

主尋找藉口，開脫罪責。現代中國未能實行民主之治，其主要責任在中國共產黨的摧殘壓制，而在傳統文化；是共產黨利用了傳統文化的落後因素以為己用，已非傳統文化本身。近代中國人民對民主的重要性自戊戌以來是就有所認識，而在中共佔據大陸後把這一切進步的民主理論統統斥之為反動的資產階級理論而加以批判，這一切都是中共倒行逆施之罪。世界上許多傳統文化比中國落後專制的國家，由於沒有共產黨的干擾，先後都進入了現代民主社會，這就是最好的說明。

如果當代民主運動祇限於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不進而指出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的同構性及其在中國現代民主進程中所起的主要障礙作用，那麼，民主運動在理論上將是軟弱無力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反而會使人民對在中國實行民主法治等失去信心，而且還有可能為中共實行專制之治的合理性提供傳統的支持，對這些理論上的重要關節，必須有明確的認識，不能含糊。

如果要對中西文化進行一比的話，撇開枝節的不談，大抵說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相當於希臘羅馬古典時期，都由於具有多元文化精神而產生政治言論上的開放與學術思想的繁榮；我國秦漢以後的歷史則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黑暗時期，都是一元性文化統治時期。

歐洲中世紀文化是以基督教為主體的「政教合一」文化。自公元四世紀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奉為國教，即開始了宗教迫害與文化思想的統制，天主教會設有「異端裁判所」作為鎮壓機關。宗教凌駕於政治之上，同樣也形成了神、學、政三位一體的一元化結構。正如馬克思曾指出：「中世紀把哲學、政治、法律等思想體系的一切形態囊括在神學之內，變為神學的分科。」（『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種情況對我國過去以儒家為國教，現在以共產主義為國教囊括一切思想體系一樣，雖然神學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其性質是完全相同的，都屬於一種專制的一元性文化結構。

那麼西方文化如何從一元轉向多元，其途徑何在？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到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這是一個人文主義開始覺醒，國家爭取擺脫羅馬天主教會的控制，在理論上出現政教分離的要求，宗教自身走向多元化的階段。歐洲從十四世紀開始，由於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在封建制度內部逐漸形成，同時在文化上由於重新發現、翻譯、傳播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形成了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其人文主義的思潮表現為一種人性對神性的反

動，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與宗教觀，隨着人性與獨立人格的覺醒，個人主義開始抬頭，人們已經無法容忍教會對人的思想的束縛，從而對神學與經院哲學展開猛烈的批判，其人文主義的思潮終於促成了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

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以一五一七年德國人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抨擊教會出賣贖罪者為導火綫，在歐洲各國迅速蔓延。這場運動實質是新興市民階層對封建的教會文化與政治發起反叛的一場思想解放與政治改革運動，其結果使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權威受到嚴重打擊，在英國與北歐，世俗君主擺脫了教皇的控制，把教會置於自己的權力之下，權威的重心開始了轉移，宗教改革家們在理論上都主張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情。對上帝的意旨，教皇不得專制解釋，國王亦不得干涉。他們認為要維持宗教生活的淨化，必須將凱撒的權力回歸凱撒，在理論上已有了政教分離的要求。與此同時，在天主教內部產生了分裂，出現了新教，即反抗宗的各派。如在德國和北歐各國有路德宗，法國、瑞士、荷蘭和蘇格蘭有加爾文宗，英國的聖公會等等，宗教自身也出現了多元的現象。宗教改革運動使人們的思想從羅馬天主教神學的一元統制下初步得到了解放，反映在哲學上即表現為一種二重真理觀的流行。如弗蘭西斯·培根認為有兩種不同來源的真理同時存在，一種來自哲學與科學，一種來自神的啟示與信仰，是神的真理，二者各自獨立，互不干涉。這種多元的真理觀反映了哲學與科學自身為擺脫神學的積極要求，是人們的思想走向多元化的一個途徑。

第二階段從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到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再經十九世紀以至於今。這階段主要的民主國家都完成了政教的完全分離，隨之實行了政治的多元化，包括政府的三權分立與多黨政治；社會文化由一元轉為多元。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頒佈了「寬容律」，實現了宗教上對不同教派的容忍。洛克曾作『論寬容書』劃分了宗教信仰領域與世俗道德領域的不同。總之由宗教自身的多元化導致對不同教派的容忍，更經法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極力抨擊教會，使其權威進一步下降，最後導致政教分離。在美國，傑佛遜反對建立國教，在維吉尼亞州憲法上就曾註明不能建立單一宗教。美國獨立後憲法上也不定國教，政教分離的原則得到了確立與實現。主張政權機構多元化理論的主要思想家首先有英國的洛克，他推崇代議政治，提出了立法、行政與聯邦權的分立；然後由法國的孟德斯鳩參照英國的立憲政體，明確地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理論

。由於在政治學上分權制理論的確立，引伸出多黨制，以防止單一政黨的專制。總之現代政治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貫徹了多元的精神，其建設性的方面即表現為多權的制衡與多黨的競爭促進了政治的日益修明；其保衛性的方面即是打破了一元化的權力機構，使專制政治無從發生。與多元政治相應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化，確保人民思想言論的絕對自由，崇尚理性與人道，對各種思想學說均持寬容精神，既不定某家學說為「一尊」，也不視某家學說為異端而予以禁止，使人們的思想處於自由的狀態，可以對各種不同的學說作出自己的認識與選擇，促使了學術的繁榮。

由以上所述可見，西方中世紀文化向近代轉移的途徑首先是進行宗教改革，政治從宗教的控制下求解放，通過政教分離，使世俗的權威與精神的權威分家，確立了文化在大的領域的二元化結構（為思想解放開了路）。在這基礎上引出了政治上的三權分立與多黨政治，進而確立了政治的多元結構及意識形態領域的自由多元化。這就是西方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的大致途徑。在具體的一些國家中階段性并不如此明晰可分，但基本是按這一邏輯的路綫發展。

2. 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嘗試

令人感興趣的是中國近代社會最初的幾次轉型的努力也是以宗教改革入手的，這說明「政教合一」的文化從一元向多元轉化時，基本上是服從同一規律的。

首先是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戰爭。洪秀全從西方傳教士那裏學習到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義，時代的變化使他敏感地覺察到這是可以用來進行社會變革的意識形態武器，於是他創立了「拜上帝會」，并砸碎「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以示與中國的舊禮教之決裂。洪秀全宣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試圖在人間實現「天國」的理想。這一美好的願望也曾激起人民極大的熱情，終於釀成燎原之勢。但是，太平軍雖曾席捲十八個省，歷時十四年，成定都南京之局，最後仍歸失敗，其原因何在？大致說來不外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的內容，二是體制的形式。首先由於崇拜天主這一外來的宗教，與中國的孔教為國教的舊傳統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一外來的宗教來勢突兀，激起了中國舊式知識份子的反抗心理，以致招來曾國藩組成湘軍與之對抗。曾國藩指斥太平軍「崇天主之教」，他在討伐太平軍的檄文中說：「士不能誦孔孟之經，而別

有耶穌之論，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討粵匪檄」）他撤開了太平天國反清的民族內容而着重於中國數千年名教之變，打起了維護傳統文化的旗幟，以孔孟的衛道士自居，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可以認為太平天國戰爭是中國近代試圖進行宗教改革而引發的一場宗教戰爭。由於舊宗教之強大外來的新教未能取勝。

其次是太平天國把人人平等的近代政治內容納入宗教的說教，雖然不失為一種方法，但在其尊崇「皇上帝」的神權與皇權一元化專制形式之下，難以實現真正的平等。而「以平等為主旨」的政治內容也終於在這種「神人合一」政治中消融淨盡，其後期趨向腐化衰敗也在必然之勢。

隨之而來的戊戌變法運動。戊戌變法的倡導人康有為也許鑒於洪秀全之利用外來宗教的失敗，走上了一條從孔教改革入手的道路。康有為以孔教的馬丁·路德自居，打起了「託古改制」的旗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手法也算高明。他所著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二書一破一立，奠定了戊戌變法運動的理論基礎。前書將被尊崇了數千年的古文經學考定為偽經，認為是劉歆所造，從而使舊國家政治文化所恃之理論基石根本動搖；後者則揭櫫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三世學說，認為孔子作六經是改亂世之制，託堯舜以為太平之治是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所在。根據「公羊三世」學說，社會的進化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康有為認為中國的封建專制是亂世，必使之改變為君主立憲制以進入昇平，然後由昇平而轉為完全民主的太平之世。康有為的公羊三世學說巧妙地近代民主政治的內容納入了孔教的形式，使二千多年前被董仲舒用來創建春秋大一統專制理論的今文經學，成為轉運近代民主精神的媒體，孔學再次面目全非，真是回首前塵，恍如隔世！

戊戌時期維新派的民主思想包括提倡民權，主張三權分立，開國會以行民主之治等內容。梁啟超說：「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古議院考』）梁氏把君主專制稱為是「以獨衛治群」。以設議院君民共治為「群衛治群」。認為「以群衛治群，群乃成；以獨衛治群，群乃敗。」（『說群序』）梁氏理論中的「獨」與「群」的觀念，已隱含「一」與「多」的性質，反映了其要求變一元專制政治為多元政治的近代精神。

戊戌變法失敗後，以孫中山為主要領導人的民主派則徹底拋棄了孔學的外衣，直接運用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論以鼓吹革命。孫中山提出

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權能區分、直接民權、全民政治，并援引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以比喻三民主義等等，都充滿了近代民主精神。在該路線的指導下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但遺憾的是辛亥革命猶如電光火石般的爆發一時，迅速走向失敗。由於革命黨人的力量不足，不得不在革命爆發之後與舊勢力妥協，將革命成果拱手讓給近代中國政治中最醜惡的人物袁世凱，從而葬送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後，之所以未能在中國建立近代民主政治之秩序，除了舊勢力之強大外，各民主黨派自身未能互相寬容，和衷共濟，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民國初年是一個實現中國社會轉型，建立多黨政治的好機會。由於革命打破了舊秩序，一切都處在變化之中，形式式的大小政黨紛紛成立，最大的當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兩黨在民國初年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願望基本相同，但由於歷史上淵源不同，在清末一主革命，一主立憲，展開論戰，矛盾甚深，入民國後仍不能合作。有人認為本來兩黨一主激進，一主溫和，正是建立兩黨政治的理想格局。如能求同存異，攜手併進，未必不能對袁氏造成壓力，打消其專制復辟之念，而導中國於多黨政治之局，但終因鷓蚌相爭，互相傾軋，使北洋派得利。

反過來說，使袁氏能有華盛頓之雅慮，以北洋武力作為實現中國民主政治之後盾，而調劑進步、國民及其他大小各黨，使之走上正常的政黨競爭之軌道，則中國社會之轉型亦不難實現於民初，豈輪到中共再陷中國於黑暗。袁氏以一身而兼出賣扼殺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之罪魁，使中國近代兩次社會轉型之機會均斷送其手，自己也終於在做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之後，在全國一片討伐聲中結束其可耻的一生。袁氏死後，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之局，終於為中共之學生提供了機會，歷史又進入另一黑暗時期。

3. 中國當代文化轉型的途徑

從前面的論述來看，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努力可分為兩條綫索。一是太平天國與共產主義的綫索，它們均是外用外來的一元性宗教文化來取代中國傳統文化。拜上帝也好，拜馬克思也好，其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權，其性質是專制的而非民主的。同時在經濟上它們都是走一條以公有制與小農平均主義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主義道路，這一經濟

路線也決不可能使中國轉型為現代工商社會。

正像太平天國以最平等的口號建立了一個最不平等的專制政權，共產黨人以最革命的口號建立了一個最反革命的政權。嚴格地說，革命一詞祇有使用在社會文化結構轉型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事實證明太平天國與共產主義運動屬於一條錯誤的綫索，它祇能把中國導向新的災難，原因即在於在一元文化之樹上開不出民主政治之花。

另一條綫索是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綫索。在理論上前者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媒體來轉運近代民主政治的內容，後者則直接利用近代民主政治理論的原形，加工整理，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論進行革命，在實踐上都試圖建立近代的民主政體。其政治政策也要求變社會為工業社會。該一綫索的方向是正確，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就是要繼承這一路線，努力爭取完成其未能完成的歷史使命。

隨着共產主義在中國試驗的失敗，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再次蓬勃興起，而在其繼承其前期民主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在理論上目前也分別出現了兩種傾向，其對應脈絡依稀可辨。一種可以稱為宗教改革派，即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神學加以修正從而進行政治改革。如中共理論界提出的異化論，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等，以及民主青年王希哲提出的要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與人道專政等理論。他們打着恢復馬克思主義正統神學的旗號以轉運一些民主政治的內容，其手法近於康有為的「託古改制」，其積極面在於在中共思想專制下便於發表，其消極面則是這些理論仍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框中討生活，在理論上未能批判其專制本身的一元化結構性質。想用專政的理論去實踐民



大軍閥袁世凱斷送了中國近代史上兩次社會轉型的機會。

主的內容，實際上難以達到。這一傾向可以說是一條維新的路線。另一傾向則可稱為宗教否定派，他們鄙棄馬克思主義神學的外衣，而直接運用在西方已取得成功的現代多元民主政治理論以鼓吹民主運動。如魏京生等提出的人權、平等、民主及當前海外民運人士力倡的多黨政治、三權分立及多元論等，這些理論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專政的理論而要求建立現代化的民主政體，可以說是走一條革命的路線。

走維新路線者在大陸思想禁錮嚴厲的條件下，能運用當代宗教的話言以轉運民主人道的內容，造成思想解放之空氣，其功不可沒，而且這方法仍是當前身在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所能運用的策略。但要引起注意的是手段與目的不可混淆，不能使自己被策略本身所迷惑。我認為在一旦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應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神學的外衣。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國外傳入不通數十年，中國人民對之感情不深，且近三十多年的實踐已使之聲名狼籍，徹底割除這一外來文化的毒瘤毫不可惜，不比康有為時代的孔學在中國持續有數千年的歷史，已融入民族文化的血液，難以一旦拋棄。

當然割除這一毒瘤雖不足惜，但并非容易，它已像附骨之疽將其脈絡伸進一切器官而窒息機體之正常功能，這就是中國當前社會主義轉型的主要困難所在。參照西方的歷史，要向多元化文化社會轉型首先要實行政教分離，由政教分離進而實現政治多元化。那麼如何處理當前中國的政教分離問題，實為中國當代社會文化轉型的關鍵。

對於中共來說，其前途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是堅持「政教合一」，在運作上強化其宗教功能，如繼續進行「清除精神污染」之類的宗教異端迫害運動，加強思想禁錮，限制言論自由，這樣做可能為保護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而收效於一時，但不能收效於永久，也不能解決中共面臨的問題。中共這樣做必然會釀成社會更大的衝突，而危及自身的統治。原因可分內外兩方面來看。從外部來看，多元民主的文化已成爲世界發達國家的文化主流，中國不可能再關起門來稱孤道寡。否則中華民族將會繼續淪爲愚昧落後的民族而貽笑於世界大家庭。中國人現在國外備受歧視，即是辛酸的見證。外部的影響必將促成內部的變化。從內部來看，如不再走經濟自由化的道路，難以改變生產落後、國家貧窮的困境，中共也無法繼續統治下去。但是一元化的文化結構難以與經濟的自由化相適應，必將引起衝突，而且廣大的人民亦已覺醒，其要求社會自由民主的熱情必將隨着經濟改革的浪潮而益發高漲，中共如對之採取鎮壓措施，必將引起更大的反抗。中共應該說是最懂得得人民群

衆力量的政黨，當年若不是人民對之抱有幻想，予以支持，哪能取得政權？現在人民一旦認清其本質，它還能繼續欺騙下去嗎？中共如不能明智地處理與人民的敵對情緒，矛盾將走向惡性的衝突，其下場將要比西方基督教更爲悲慘。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也曾盛極一時，但轉眼在中國的大地上煙消雲散，成爲歷史陳迹，即是其前車之鑒。

另一途徑是中共明智地認識到政教不能兩合，在人民群眾對共產主義信仰徹底動搖的現實面前捨教保政，自覺地走一條政教分離的道路。具體地來說，就是要放棄其宗教功能，改善而保持其政治的功能。即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部讓出其一元專制之權，解放思想，開放「言禁」，讓學術、宗教、文藝、新聞、教育等完全自主獨立，以造成真正百花齊放的文化繁榮局面。一方面對自身進行徹底的改革，使自己成爲一個現代化的民主政黨，以適應實行當代民主政治的社會功能。在具體的運作上必須開放「黨禁」，讓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勢力形成黨派，以參加正常的社會政治活動，收其互相砥礪促進之功，逐漸導中國進入多黨政治的局面。中共如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開放「二禁」，作中國社會轉型的促進派，還有可能使自己從一條將死之蝨而蛻變成一隻彩色的蝴蝶，但願這一設想不會被共產黨人譏爲是階級敵人的「善良願望」。

那麼從人民民主運動這一陣綫來說，也應該認清其努力的方向。首先要促使各個文化領域擺脫當代共產主義宗教的控制，在學術、文藝、新聞等領域，多爭得一分自由即進步一分；同時也應鼓勵各種宗教活動使之得到真正的宣傳與信仰的自由。要知道，沒有精神文化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是無法實現的。戊戌時期嚴復就有「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的認識，很難想像在一個思想統一禁錮的國度裏會有民主政治。必須力求打破思想一元化控制，在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基礎上以求百家爭鳴的多元政治局面。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就是由於學術下移，打破了官方控制，才產生了我國歷史上政治比較開放活躍的局面。

當然，我們這樣提問題并不是說現在爭政治的民主可暫緩一步，實際上政治與文化要雙頭並進。因爲共產主義是一種政治性的宗教，政治仍是其核心問題，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二者緊密結合，互相制約，從這一角度來看，文化思想的自由化也取決於政治的民主化，所以政治上爭民主也是重要的環節。特別現在有些人迷惑於經濟決定論時，提出這一點更爲重要。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必須要有一個強硬的理論，打出鮮明的旗幟以號召群眾，方能形成對中共的衝擊之勢，否則恐怕會淪爲中共新洋務派

的雙簧。理論上的軟弱將會引起人們對民主運動有否必要存在表示懷疑，他們會覺得中共自身既已領導進行了經濟改革，還要你們這些黨外的人士奔走呼號幹什麼？民主派如果不在理論上指出僅有經濟改革而不觸動文化政治等一系列結構社會根本不可能轉型的道路，則會使自己隨着中共經濟改革的浪潮的興起而逐漸消解於無形，難以完成使中國社會步入現代民主多元社會的歷史使命。

同時，我還希望在這裏指出，由中共一黨來包辦經濟改革這本身就是一個一元性的觀念，要知道即使是僅僅需要經濟改革，也并不一定就是中共搞得最好。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經濟是人民的經濟，人民要發表自己的意願，要有自己的代表參與領導改革，而不容許一黨包辦。任何依賴高高在上的單一力量來恩賜改革的想法都是奴性的表現。一種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這種單一中心的觀念與現代民主社會水火不容。要向現代社會轉型，人們必須建立起獨立、自主、多中心、多方向的多元觀念。擺在當代中國民主運動面前的任務就是要以多元的革命觀念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理論與組織，去衝擊瓦解當前中國文化的一元性結構，促使社會轉型。

結論：散勢——當代中國的縱橫論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之困難何在、途徑何往通過上面的論述已略見端倪，而現在本文將進入一個核心問題加以分析探討，以求進一步揭開其



戰國時法家的韓非，建立了一套「法、術、勢」結合的封建專制理論。

迷霧。

要解開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從中國現代政治中一個最重大的，同時也是一個最基本的事件分析起，這就是毛澤東一人何以能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全國陷入一場浩劫，歷時十年而不能自拔，直至毛死後才出現一點轉機？這個問題至今仍使許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以致有人將這一悲劇歸罪於十億「愚民」，以為是人民自己愚蠢，才會上當受騙。本人認為這種看法從對人民「怨其不怒，痛其不爭」的心理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則是錯誤的，事實上並不是由於人民愚蠢，受騙上當，而是由於「勢」使之然，不得不然。

對這個問題二千多年的政治學家慎列與韓非已作了簡單而明確的說明，我們不妨援引如下：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龍霧霧，而龍蛇與蟻蚋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五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誦賢者也。」（《韓非子·難勢》）

在這裏韓非深刻地揭出了專制政治中所謂「勢」的奧秘。我們知道韓非所建立的一套封建專制政治理論是「法、術、勢」三者的結合，而「勢」論實為其核心，「勢」即代表了專制制度的一元性結構及其功能。用韓非的理論來對照中共的政治，我們可以看到兩者如出一轍，中共朝令夕改的政策命令即相當於「法」，其花樣百出的整人運動，如「引蛇出洞」的反右「陽謀」，即是其「術」，而其由上而下地實行黨的一元化專制統治即是其「勢」，這三者的結合就是中共統治的封建專制本質。毛澤東對「勢」也最重視，說什麼「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一生自許有超越秦皇漢武之概，對韓非之論想必自有獨到的領悟與發展！

韓非指出「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誦賢者」，無疑是揭明了專制社會中的一條真理。在專制政治的運作中人民的聰明或愚蠢實是一個不起作用的系數，「文化大革命」一來，多少專家學者、碩學通儒不是就乖乖地進了「牛棚」，經歷了賢智屈服於勢位的可悲命運嗎？所以從專制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民的愚蠢，也不是毛澤東一人智能超人，其根源就在於造成他有可能作亂的一元極

權之勢。「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其原因就是天子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峯，其居高臨下統制一切所產生的勢能，使人們不得不按其意志行事，最聰明的賢者也祇有俯首聽命。可以說現在把任何一個人擺到當時毛澤東的勢位上，都可以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如果認爲中國人民經過教訓，頭腦已經清醒，不會再受騙上當，那麼爲什麼「清污」運動一來，又是氣勢洶洶，當時的策劃者如已處於毛的勢位上，中國不是又要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嗎？再看八三年在上位者一聲叫殺，下面不就又分配人頭名額，殺人如割雞嗎？所以不散其專制之勢，終難免其後患。祇要中國還存在着一元專制的勢位結構，中國每時每刻都有可能產生毛澤東二世、三世，而第二次、第三次文化浩劫亦可隨之而來，這并非危言聳聽。現在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首要政治任務，就是要拆開專制統治者所乘的一元化結構，以散其專制之勢。結構一散，則極權之勢無從產生。獨裁者一旦從權力的雲端跌下，神龍也變成蚯蚓一條；把毛澤東從水晶棺材裏拋出去，還不是殭屍一具？揚灰猶聞其臭，追論神聖！

現在，本文再從另一角度來試加分析，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何以會有強大的同化力，西方近代文化一進入中國就會變形？對這一現象，熱衷於介紹西學的梁啟超早年就曾發出慨嘆，他說：「執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新民說』）其嚴重性至今尚存，引起人們的重視與憂慮。我覺得在這背後同樣是文化結構的問題在作怪。由於存在着一種一元化的文化結構，故所有外來文化一進入，均被這個勢納入自己的結構；而按其單一中心的由上而下的程序而運作起來。如西方的政黨政治是多黨並立，和平競爭，被引進中國則成爲一黨專制或一黨獨大，所謂的「民主黨派」則成爲「花瓶黨」、「衛星黨」，對其「霸政黨」真猶如群星之拱北辰，隨其一元化運作之指揮棒而作木偶之循規蹈矩、跪拜歌呼之戲。（作者附註：在這裏我不稱中共之類的政黨爲「執政黨」而稱之爲「霸政黨」就是爲了區別在兩種不同文化結構中的政黨，以免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爲在西方「執政黨」與「在野黨」是相對而言的，而且有執政的時候，也有不執政的時候，而中國的這種政黨是「終身制」的，它的執政并非出於多黨競爭的合法選舉程序，稱之爲「執政黨」會使人誤以爲這就是西方通過民主程序而產生的政黨。正是這種概念上的混淆爲專制政治造成了民主的假象，以爲人家有什麼，我們也有什麼，而事實上正如過淮之橋，已成枳而非橘了，此即是一例。）再看如選舉本來是由下

而上的推舉，進入這個勢位結構，就變成了由上面指定名單，然後由人民加個圈子以認同的遊戲。如報紙本來是群眾的喉舌，用來監督政府，表達人民的呼聲，進入中國則變成政府自辦，用以控制愚弄人民，進行自吹自擂的工具。總之現代西方民主文化之優良設施，一進入中國就變成了極權政權上點綴的紙花，其作用都倒了過來，推其原因無不在文化結構。這種一元性文化產生一種勢不可逆的力量，能將一切納入自己的運作程序。打個比喻，這種文化結構就像一座魔宮，其產生的勢能就像一根魔棒，進入魔宮的一切事物給這魔棒一指就會變形，最美麗的公主也會變成癩蛤蟆，令人作嘔不已！而要解除其魔法，恢復美好事物的本來面目，就要拆除魔宮，折斷魔棒。

中國人民民主求解放已求了一個多世紀，民主未曾得到，身上的束縛反而越來越多，其原因即在於未曾散去一元性文化結構之勢，變去都是在調換統治的集團或個人，而不是改變文化的結構與統治的方式，也就是未曾進行一場文化的多元革命，或者說散勢革命。而要實現中國社會的轉型，這一革命勢在必行。

這一革命將要求我們在廣大的文化領域發起一場全面散勢運動，以促使一元化結構的崩解、土崩瓦解。具體地來說，就是我們要用宗教、學術、新聞、言論的自由去散其一元化專制之勢，要用多黨制去散其一黨專制之勢，要用聯邦或聯省自治制去散其中央集權之勢，要用三權分立、軍政分家去散其大權獨攬之勢，要用市場經濟去散計劃經濟之勢。總之我們要使當前中國的一元化文化結構分之又分，分至於不能再分；散之又散，散至於不能再散。中國文化由一元向多元轉化之路，也就是一條政教分離、分權散勢之路。

換句話來說，就是要用民主自由的多元文化之橫勢去散其極權專制的一元文化之縱勢——民主是橫、極權是縱；自由是橫、專制是縱；多元是橫、一元是縱；現代是橫、傳統是縱；分權是橫、集權是縱；地方爲橫、中央爲縱；市場是橫、計劃是縱——以勢散勢，化縱爲橫，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縱橫術！

我們相信，經數千年凝聚集中起來的一元文化結構之勢一旦崩解，將會像原子核分裂一樣，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從而活躍廣大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去迎向百花競艷的明天。人人爭當散勢派，個個勇作散勢的一份子，則中國文化由一元向多元的轉化定能實現，而中華民族亦必將因此而騰飛世界。

爲達此目的，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歷史的腳印

中國政論作家 李玉

回顧一下人類所走過的道路，是很有趣味的。

歷史學家通常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三大段：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而每個時代，又劃分為若干不同的發展階段。

馬克思主義則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原始共產主義、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最後一個社會是未來的，據說是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正如恩格斯引用摩爾根（J. H. MORGAN）的話：「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却是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七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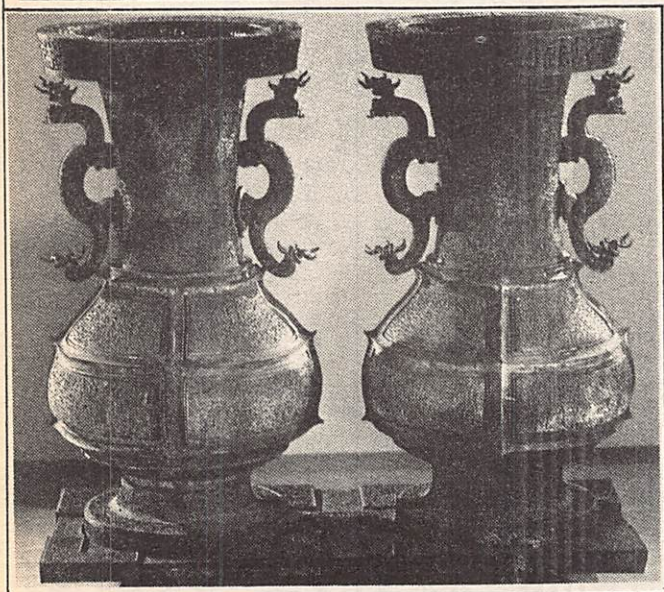
這個結論使人們困擾，就像上帝指出人類的未來是天國的困擾一樣。並且把未來的社會形態列入《社會發展史》，也與人們的一般概念不一樣，一般人們概念中的「史」，是指過去的人和事啊！

姑且按馬克思主義的「五個階段」劃分吧。從人類已經經歷過的前四個階段來說，又有哪一位先賢聖哲指出過：在原始社會的初期就能預見下一個時代必將實行奴隸制度？在奴隸社會初期，又能預見下一個時代必將實行封建

制度？在封建社會初期，又預見下一個時代必將由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

沒有。從來沒有這樣的聖人曾預見過。——只有一個人例外，這就是德國猶太人馬

戰國早期的青銅器（青銅聯座壺）



克思。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勞力密集時代，就指出下一時代必將被共產主義所取代。這的確是破天荒的預言，馬克思成了超聖賢人物。這種預言對不對？未來的顯然難於驗證，但人類先前走過的路，是可以尋找出一些跡跡的。

一、人類的發展進化歷史

最初的人類，無疑是地球上衆多動物中的一類，只能靠自然恩物為生，如採摘野菓、挖掘植物根塊為食，天然洞穴為住，或者棲息在樹上。這樣不知經過萬年，人類才懂得捕捉魚蝦，並且使用簡單的工具如石頭、樹枝去追擊禽獸。起初茹毛飲血，然後才懂得用火，把魚蝦禽獸烤熟來吃。

人類由於工具的使用而開始和動物分離。不過，由於簡單的工具不濟事，所獵的動物極少，於是，「人食人之風」，竟「保持頗久」。同上，第十八頁）。

後來人類終於發明了弓箭，打獵遂成了主要的生產方式，人食人的現象就減少了。有的地方，人類已懂得「構木為巢」，開始出現了原始村落。由於木製器具開始使用，石器越來越精細，再進一步，人類懂得製陶，馴養動物或者種植五穀，於是，出現了人類第一次大分工——農、牧分工。再後，開始製造青銅器，於是，出現了第二次大分工——農牧業和手工業的分工。自從文字發明以後，人類就進入了文明社會。

上述歷史演變只要讀過中小學歷史課本的人都不陌生。我在這裡所要指出的是：上述歷史的變化，全是人類自發活動的結果，並沒有

什麼先賢聖哲指導人們這樣做或那樣做。

文字的發明標誌着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在中國，相傳軒轅黃帝時已由史官倉頡發明了文字。儘管至今沒挖出一塊倉頡的字來，但我們還得以倉頡造字為始，從此，中國開始進入了文明史。

我們號稱有「五千年文化」，其各時代所佔時間大體如下：

1. 部落聯盟制時代：三百六十年（從軒轅黃帝起至堯帝共五代，三百五十三年。堯、舜、禹相傳是禪讓制，舜在位只「十七年而崩」）。

2. 奴隸制時代：一千九百九十五年（從夏禹王起至桀王共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商湯王至紂王共三十一代，六百九十六年；周武王至幽王（西周）共十一代，三百四十二年；周平王至赧王（東周）共二十二代，五百二十五年）。

3. 封建制時代：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從秦始皇起至清末傳儀）。

4. 辛亥革命起至現在：七十四年。這一個時代可以說是共和制時代。

以上四項合共四千五百六十一年。

近年考古學家在肯雅羅高敦河上的石坡發現的男性遺骸，經科學鑑定證明有一百六十年，比北京猿人早一百一十萬年。肯雅人懂得用火，是在矇昧時代的中級階段。更早的人類遺骸當然有希望繼續挖出，但就已知的人類一百六十萬年的歷史中，文明社會只是一個極短促的時代，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才不過是開始。

二、現代人咒詛的奴隸制

在中國，軒轅至夏禹之前是部落聯盟制，

按歷史學家田五昌的觀點，是「部落奴隸制王國時期」。（見八一年六月號《文物·夏文化探索》）。至夏朝，才真正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統一的奴隸制國家。商朝和周朝則完善了奴隸制度，而春秋戰國（即東周）則是奴隸制瓦解時期，或者說是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

奴隸制時代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分裂為兩大階級——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

這個奴隸制度有什麼特徵呢？

第一、「王和國家是一體的，所以一切重大的國家事務都被稱為『王事』。各級大小奴隸主貴族都必須為『王事』出力報效。」（見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第一七一頁）

第二、實行土地和奴隸的國家所有制，各級官員有管理權和享有權而無私有權，土地和奴隸不得私人自由買賣。郭沫若曰：「古代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時代是土地國有制。」（見《奴隸制時代》第四頁）。「殷、周兩代是沒有私有財產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切財產都是國有的，王有的。臣下受着土地和奴隸的賞賜或分封，只有享有權而無私有權。」（同上，第六十一頁）。「臣下犯罪或者其它原因，王室可以隨時收回土地或者對臣下『罰為奴』」。

第三、實行大規模的集體勞動制，動輒就是兩千人或兩萬人同時耕作（詩經載「千耦其耘」、「十千經耦」）。

第四、奴隸制時代的勞動福利生活，《漢書·食貨說上》作如下記述：

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致之……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

上所強也。

民，二十才是主要勞力，受田，六十退休，把田歸回公家。七十以上，由國家養老。十歲以下，由國家撫養。

漢書所記是否事實？有否理想化？我們不得而知，但古書確實如此記載的，郭沫若在他的《奴隸制時代》一書中多處引用。

一八四七年恩格斯記錄了西方奴隸制的奴隸生活：「奴隸是某一個人的財產，而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生活不管怎樣，總是有保障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三七六頁）。

經濟學家福高（R. FOGEL）在一九七三年發表的《奴隸研究》，也以多種事實證明奴隸的待遇遠較一般書本所述為佳。（見張五常《壹枯者言》第一八一頁）

現代人所咒詛的古代奴隸制，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王同國家一體、國有化和集體勞動制。——現代中國人簡直是太面熟了。

熱衷於批判孔老二「復辟奴隸制」的人，却在行為上早已十分起勁地復辟這一種制度了。我不知道「人民公社」同古代奴隸制到底有哪些區別？王同國家一樣與領袖同國家一體到底有哪些區別？

中國、柬埔寨、越南，都曾把農民編成班、排、連、營等像軍隊一樣的建制，驅趕農民大軍在荒野裏、在礦山加班加點地作無償勞動。當中國「大躍進」並且中南海的衮衮諸公們神經緊張地在討論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還是中國先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却遣責中國實行「奴隸勞動」。

摩爾根寄望的古代系族制的復活沒有出現，但古代奴隸制却確留在中國、柬埔寨、越南復活了。

三、希臘奴隸制

晚於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實行奴隸制的希臘的城邦國家雅典和羅馬，却沒有實行土地和奴隸的國有制，而是實行土地和奴隸的私有制。

當希臘還在部落聯盟的時候，就把土地分到各系族去。希臘和羅馬對於鐵器的使用，都較中國為早，也許由於這一原因——有了鐵製農具，家庭就具備了耕種土地的能力，因此他們很早就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去。及至懂得把戰敗者捉來做奴隸的時候，也把奴隸平分到各戶去。至於征服的土地，則「幾乎平均地分配」給平民（即自由公民。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二四頁）。

在希臘實行奴隸制時，正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希臘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學家，如泰勒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等等，恰如中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管子、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孫子等等一樣。

但希臘成了歐洲民主和科學的發祥地，而中國却成了東亞專制的發源地。

在希臘，很早時候就實行民主制度，如公元前十一世紀至九世紀的荷馬時代，就實行軍事民主制。公元前六世紀實行貴族民主制，當時雅典由四個部落組成四百人的貴族議會。公元前五一〇年的克利提尼時代，推翻了貴族民主制，實行平民民主制，並發出命令，限制貴族對於土地的無限集中。克利提尼又廢除了以血統為基礎的四個部落，實行的居住地區為基礎的公民區域的全新組織，把雅典城邦劃為十個地區部落，每個地區部落選出五十名代表，組成了五百人的「雅典議事會議」，決定國家

大事。每個地區部落再選出一名將軍，組成「十將軍委員會」（即政府）。十將軍委員會受議事會議監督。公元前四世紀時，伯利克被選為「十將軍委員會」首席委員，進一步提出了「民權」概念，擴大平民的權利，並開始設立陪審制度。

雅典成了西方現代民主的搖籃。

但在希臘另一個城邦國家斯巴達，却保持着土地和奴隸的國有制。這又是什麼原因？原來斯巴達是一個寡頭統治的國家，需要借「國有制」之便實行軍事獨裁統治，為此，終於聯絡了另一獨裁城邦科林斯，於公元前四三一年發動了對雅典的進攻——這就是希臘歷史上有名的長達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四、中國古代國有制轉入私有制

東方各國的奴隸制時代，如埃及、巴比倫、印度等，差不多都實行土地和奴隸的國有制。

當時實行國有制度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是刻意的追求，是「沿着原始公社的習慣而被固定下來的……耕種土地的奴隸離不開土地，是土地的附屬物，因此耕種土地的勞動力也就隨着土地的國有而同歸國有。」（見郭沫若《奴隸制時代》）

中國的奴隸制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殷、周盛世而逐漸崩潰。之所以崩潰，也是十分自然的現象。在春秋中葉以後，鐵器開始使用，鐵犁鐵鋤代替了石犁石鋤，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鐵的使用具備了大規模開墾土地的能力，起初臣下利用耕奴開墾公田以外的荒地，這些新開墾的土地便成為私家的黑田，不用徵稅。開墾久了，黑田面積便越來越大，甚至超過公

田面積。而私田又無疑比公田經營得好。公家為了增加收入，便開始向私田徵稅；而一經徵稅，無疑又承認了黑田的合法性。這樣，私有土地便越來越多，各地豪強的勢力越來越大，甚至兼併土地，終於導致了井田制度的瓦解和國家奴隸制的終結。

奴隸制時代的國家所有制及其後來轉向私有制，一如過去一樣，全是人類的自發行為，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但中國古代的私有化過程，是非常慘烈的，各豪強爭霸足足混戰了五百年，最後由秦王政統一了六國，改號秦始皇。

殷、周時代的國有制土地和奴隸，到了秦漢則全落入豪強的私人手中，奴隸依然存在。強者所擁有的奴隸，少則幾十幾百，多則成千上萬，如呂不韋就有私家奴隸二萬。土地也同樣集中於豪強手中，「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

五、東西方的發展路向

從奴隸制度這段歷史來看，東西方是迥然不同的。

古代的希臘，一直有貴族、平民和奴隸之分。貴族是統治者，平民是自由公民，奴隸則是戰敗部落的戰俘。希臘的自由公民同樣享有奴隸，在平民民主時代，每個雅典公民享有四個奴隸。十九世紀法個史學家丹納（J. P. FAINE）所著的《藝術哲學》，有一段是記述希臘人的生活方式的：「公民很少親自勞動，他有下人和被征服的人供養，而且總有奴隸服侍。最窮的公民也有一個管家的奴隸。雅典每個公民有四個奴隸，普通的城邦如愛琴、科林斯，奴隸有四五十萬；所以僕役充斥。並且公

民也不需要人侍候，像一切細氣的南方民族一樣，他生活簡單：三顆橄欖、一個玉葱（即洋葱）、一個沙田魚頭，就能度日……；他在城邦中是完全自由的主人，法官與祭司是他挑選的，他本人也可能被選去擔任宗教的或公共的職務。不論皮革匠鐵匠，都能在法庭上判決最重大的政治案件，在公民大會中決定國家大事。總之，公共事務與戰爭便是公民的職責。」（傅雷譯本，第四十一頁）

丹納記述的和我們看到的歷史書所記述的是一致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也記述了雅典的事：「到了雅典全盛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兒童在內，約九萬人，而男女奴隸為三十六萬五千人。」恩格斯所記的奴隸數字幾乎和丹納的一致。

但在中國，從來就沒有「自由公民」這回事。本國的民衆與奴隸根本無法分別，官之下就是奴隸，只不過殷、周是奴隸國有制，秦、漢則是奴隸私有制；殷周國有的井田制崩潰之後，秦漢則是把土坡高度集中於豪強手中，形成了擁有武裝的地主莊園奴隸制。

這一古代的國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形式，對後來東西政治制度的發展起着重大影響，東方發展為愚昧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西方發展為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而秦始皇首創的中央集權制和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兩者可以相媲美，都是在大一統觀念下的愚昧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組織形式和精神支柱。

中央集權制是全世界一切古今獨裁專制政權和法西斯政權的源泉。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又是古今一切文化專制和思想專制的鼻祖，當然是接受了宰相的建議的。「儒家叛徒李斯」（翦伯贊語）的

建議如下：

「……今皇帝併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所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言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敢有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史記，秦始皇本記》）。開創了限禁言論思想自由和文字獄的先河。「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東方帝王之自私腐化，也是西方帝王望塵莫及的。秦始皇一登位，除仿效六國建築許多宮殿外，同時調派數十萬的能工巧匠在渭河南岸修建旨在享樂的阿房宮，積疊三百餘里，一步一樓，五步一閣，規模之大，史無前例。翌年又抽調七十萬能工巧匠在驪山修建他自己的陵墓（地下宮），墓裏珍奇堆積如山，又作百川江河大海模型，灌之水銀，作河水海水，使它永不乾涸。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想像中的神話，而是事實。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新聞社電訊在報導秦陵的發掘進展時宣佈：獲水銀證實司馬遷江河大海記載，地下宏大宮殿呈長方形，長寬各四百多米。（見三月卅日香港《文匯報》）

為帝王個人享受，建築如此浩大無比的工程，在西方的歷代帝王中是找不到的。這種現象只有在東方國家才有，建於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前的巨大無比的埃及金字塔，則是法老王的陵墓，這也是東方的奇跡。

看來東方帝王確實是全世界最自私的，近年東南亞新獨立的只有二十萬人口的一個小國，其新建的金碧輝煌的豪華王宮「在本世紀



秦始皇以武力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延續至今（圖為兵馬俑）

舉世無匹」。而中國兩位現代帝王死後，則各在台北和北京建造了富麗堂皇的死人廟堂供人朝拜。但西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逝世後，只在他出生的故鄉里爾立起了一塊小小的墓碑。

草菅人命殺人如麻也是東方帝王的傳統。五十年前發掘出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的巴比倫王陵墓，殉葬的奴隸遺骸竟有五十九具，使全世界嘩然。但與中國比較，又是小魔見大魔了，

中國發掘的殷王墓，單在墓西便殉葬了二千四百人。秦皇陵墓在秦二世時才完成，秦二世把洞口堵掉，七十萬民工全部成爲殉葬品。這些駭人聽聞的事，都只有東方才有。

由於東方帝王把整個國家當作自己的家天下（即「王同國家是一體的」），因此一旦被異姓推翻，異姓帝王便把前朝帝王的任何標誌都一概盡燬。楚霸王一來，就把阿房宮一把火燒掉，沒有逃脫的民工尚有二十萬，也被楚霸王全部殺掉。

人們都非難儒學對中國封建專制延續所起的作用，我在此略作分析。

首先，儒教是無神論的，是不迷信鬼神的。（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天」或「天命」，也與春秋之前的觀念不同，孔子的「天」是指自然界。（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的「畏天命」，是指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荀子把天命發展了一步，認爲應該利用自然規律（「制天命而用之」）。

儒教的無神論，被董仲舒扭曲了，他把封建迷信塞進「天命」裏去，造成所謂「天人合一」，再雜入陰陽五行和神權、君權、父權、夫權串連在一起，把儒教的人文科學體系變成爲十足的封建神學體系。

其次，儒教是有民主思想的，這裏有幾種表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容乃大，容納不同思想和信仰是其一；對於暴君應該推翻而不構成「弑君」是其二（見《梁惠王篇第一》）；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其三。

但孔孟的民主思想離形一到了董仲舒手裏，則成了維護專制統治者的尚方寶劍，因爲董

仲舒爲「君權神授」製造了理論：「王者承天急以從事，非人力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再配以三綱五常理論，結果人們只能維護統治者的統治地位，讀書人也只能爲統治者做事，在統治者面前得服服貼貼。孟子的可以推翻暴君的思想，不見了。他提倡的「獨尊儒術」，實則是「獨尊董術」。這就怪不得歷代統治者把被董仲舒改造過的「儒術」當作是專制的精神支柱。

武帝之前的高祖、惠、文、景四代是採用黃老之學，這與西漢初期統治者採取與民休息、恢復生產有關，因此與黃老的「清靜無爲」頗合拍。但高祖在世時有信王、越王等功臣的叛變，惠帝之時有諸呂（呂后）外戚的叛變，景帝時有吳王、楚王等宗室叛變，終造成「七國之亂」，至武帝這一代時，便非要大刀濶斧的改變指導思想不可。在當時的百家中，以孔、老、墨三者最著，但爲什麼武帝偏選上孔學？董仲舒謂：「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惟有孔學，才嚴等差，貴秩序，可達鞏固君權及大一統的目的，而老子主無名無爲，不利於統治者干預，墨家則主兼愛，重平等，不便利於專制。這樣，孔學便成爲專制君主對臣民的敲門磚。

戰國時代，有一位極重要的哲學家楊朱，主張「貴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楊朱是把人性中生與俱來的「利己」本性唯一能放在恰當地位的哲學家，具有永恆的現實意義。但孟子却譏笑他「拔一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這一極近現代化的思想却被儒家所排斥，當「獨尊儒術」之後，楊朱幾乎被人忘却。

儒教過份注重道德理性，其重義輕利、博大宏達而又輕視實踐，便成了純理性的教條，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成爲空談，這是儒教的重大缺陷。

儒教中教訓統治者行仁政的，統治者却不理，而儒教中教訓人民服從的，統治者却如獲至寶。「重義輕利」只是對別人的。因此歷代統治者，不管尊儒還是反儒的，都有理由要求人民「畏大人」，「犧牲小我」以魚肉人民。毛澤東更露骨地要求人民作出犧牲，用所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公無私」之類的口號蠱惑人心。

儒教的《禮運·大同》成了儒教集體主義的核心。

在西方，雖然在中世紀的數百年間，爲宗教所統治，基督文化取代了希臘文化，但畢竟希臘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古代曾是希臘伙伴的意大利，成了歐洲文藝復興的先鋒。詩人但丁首先反對教皇干涉政治，主張政教分立，彼特拉克則反對羅馬教皇的經院哲學，要求恢復希臘文化；薄伽丘則反對封建專制，提倡共和政體，恢復議會制度。

文藝復興席捲整個歐洲，各種新思想層出不窮，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道主義及提倡世俗教育科學。

文藝復興把人從神權集體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個性解放。肯定個人價值，這是人類開天闢地以來的重要轉折，是人類偉大的覺醒。

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更是從法理上確認了個人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

個人地位被確認，意味着每個人的政治權利平等，這樣就徹底地剷除了封建專制主義和

奴隸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

「利己主義」從此成了合法的人生觀。人們就在利己的動機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潛能，迅速地在學術、科學、技術、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個人主義——這就是近代西方的根本內核。

六 兩種制度的比較

《共產黨宣言》有句名言：「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過去各代加起來還更多更大的生產力。」

資產階級什麼時候才爭得統治地位呢？那是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如果我們從一七八九年算起至馬、恩於一八四八年合寫宣言止，總共才不過五十九年。這就是馬、恩筆下的「不到一百年」。

然而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如果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經有六十八年，卻沒有創造出比過去各代加起來還更多更大的生產力。

那末問題在哪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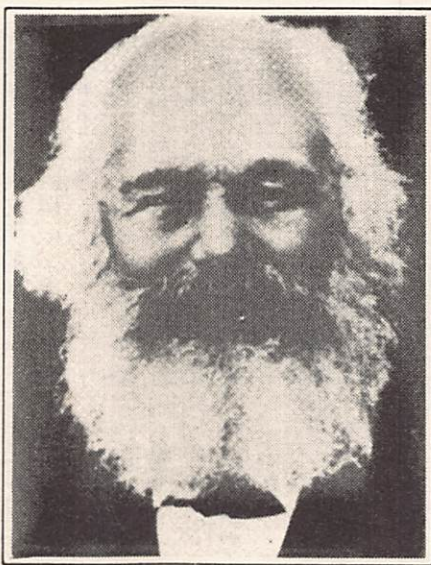
問題在於資本主義是自發的，並不是某些聖人的刻意追求。它同過去歷代的社會變化一樣，是人類自發活動的產物，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法國大革命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稍稍地來到人間幾百年了。十四、五世紀時，在文藝復興的故鄉意大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在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米蘭等北部城市發展起來。十六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歐洲已很普遍，十八世紀資本主義關係已經很發達，但直至該世紀末，才爆發了資產階級大革命，資產階級才第一次掌握政權。

從些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先在新社會的胚胎裏起熟之後才產下來的，所以一出娘胎就很健壯，罵不倒、壓不垮，而且從來不計較財富平均主義者的咒罵。

但社會主義却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是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這之前，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一點影兒也沒

馬克思一個世紀前創立的學說，與時代的發展大相徑庭。



有。完全可以這麼說：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共產黨人一手「創造」出來的，是人為「加工」出來的。因此它顯得十分勉強，十分害怕風雨的襲擊，尤其害怕外界理論的影響，因此它須關起門來，自成一體，自彈自唱，當然不許它管轄之下的人們唱反調。

由於資本主義是人類自發活動的產物，或者說，是人類的共同創造，因此，馬克思窮畢生精力去研究資本主義，却無法找出資本主義的創始者的尊姓大名來。

有誰聽過「科學資本主義」或者「空想資

本主義」的創始人？

全世界四十多億人口，沒有人聽過。

但却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

馬克思創造了馬克思主義，日子還不好過，他在人性面前戰戰兢兢。——他把人的自然屬性都否定掉了，只承認人的社會屬性，但却又無法掩飾人性追求的不可阻擋。

馬克思把佔人類大多數的農民、中間階級、手工業者、小工業家、小商人等等認為是與共產主義在本質上相對立的小生產者，說他們是「保守的」、「反動的」。列寧則把小生產者說成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人類大多數是天然地喜歡資本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的，那麼是不是工人階級又不同些或者先進些呢？也不見得。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由社會民主主義意識（筆者註，即共產主義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自發的工人運動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見《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二四七、二九三、三〇八頁）

夠了！馬克思和列寧已清楚地告訴我們，即使是工人階級，也同樣沒有「共產主義」的本能要求，而他們的本能要求仍然是資本主義。可見資本主義是全人類共同的要求，全人類都具備了天然的資本主義本能。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共產主義不符合人類本性。而階級性在人性面前又顯得如此渺小——不管什麼階級，却都有共同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天然追求。

七、資本主義的本質

資本主義竟吸引了社會各階級的人包括工人階級的自發追求，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其中必有奧妙。

本人將對資本主義的本質進行探討。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成份，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疑是以資本家經濟為主的。但以資本家經濟為主是否就叫做「資本主義」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不能解釋封建主義。

在封建社會裏，其經濟成份主要是封建領主經濟或地主經濟，但為什麼又不叫「領主義」或「地主主義」，而叫「封建主義」呢？

我以為：

第一，其政治形態是封閉的家族政治；

第二，其經濟形態是封閉的自然經濟。

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帝王是固定的，世襲的，如漢朝的帝王，永遠都是劉家的子孫；唐朝李家的天下，永遠是李家的子孫。這種家天下，直至被異姓推翻為止。外國也一樣，某家族的國王，永遠都是某家族的後裔，除非被異姓或異族推翻為止。

各級大小貴族爵位，是由王室冊封的，其管轄的領地面積，也是由王室分封的，並且同樣有世襲權和繼承權。

在這種制度下，各階級的地位是固定的，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農奴永遠是農奴，不可逾越，他們的階級地位不能自由變動。

因此這種政治經濟制度叫「封建制度」或「封建主義」，就非常恰當。

但「資本主義」却是單純的經濟概念，顯然是片面的，不足以反映本質。

先進的歐洲首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與「封建制度」相對立的全新制度，這就是自由主義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其經濟形態是開放性式的。從資本家產生之日起，其經濟活動就衝破了自己的居住範圍，不僅衝破省界，也衝破國界，面向全世界，使地球變得狹小。什麼地方可賺錢，他們就到什麼地方去，不管是多麼貧窮的地區。如果在荒瘠的月球上能夠創造更高價值的財富，賺取更多的利潤，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他們所創造的繁華的城市而到月球上去。因此資本家從根本來說，是革命者，是現代繁華和物質文明的開拓者。馬克思把資本家打成「反動階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反歷史主義的。

資本家決不像封建領主或地主那樣，世世代代都只能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活動。

這種制度下的政治，也是開放的政治。

國家政權的總統或者首相，是由選舉產生的，不是世襲制。

資產階級也不是由總統冊封的，其大、中、小資本，也不是由總統分封，而是靠他們本人的努力、智慧和機遇掙來的。

大、中、小資本家，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小資本家經過努力，可以變成大資本家。世界首屈一指的船王包玉剛爵士，原先就是只有一條小船的小資本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才成為世界最大的船王。全盛時期他所擁有的商船噸位比蘇聯國家商船還多。大資本家若經營不善或者投資不當，也可以「縮小」變為小資本家，或者破產成為平民。

平民經過努力，也可以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地位。香港大富豪李嘉誠、霍英東、楊志雲等等，都是「白手興家」的典型。世界上所有第

一代資本家，幾乎都是白手興家的。

這國社會完全是變動的，各階級的地位是自由流動的。因此這種經濟、政治制度的本質，應該是「自由主義制度」，而與「封建主義制度」相對立。

馬克思別有用心，把「自由主義」稱為「資本主義」，而與「社會主義」相對立。這當然有利於共產黨的宣傳：似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比私有的資本主義要進步，是更新的社會形態。

但如前面所述：國有制和集體勞動制是老掉牙的舊事物，是被歷史自然淘汰達幾千年的東西。

八、自由主義——無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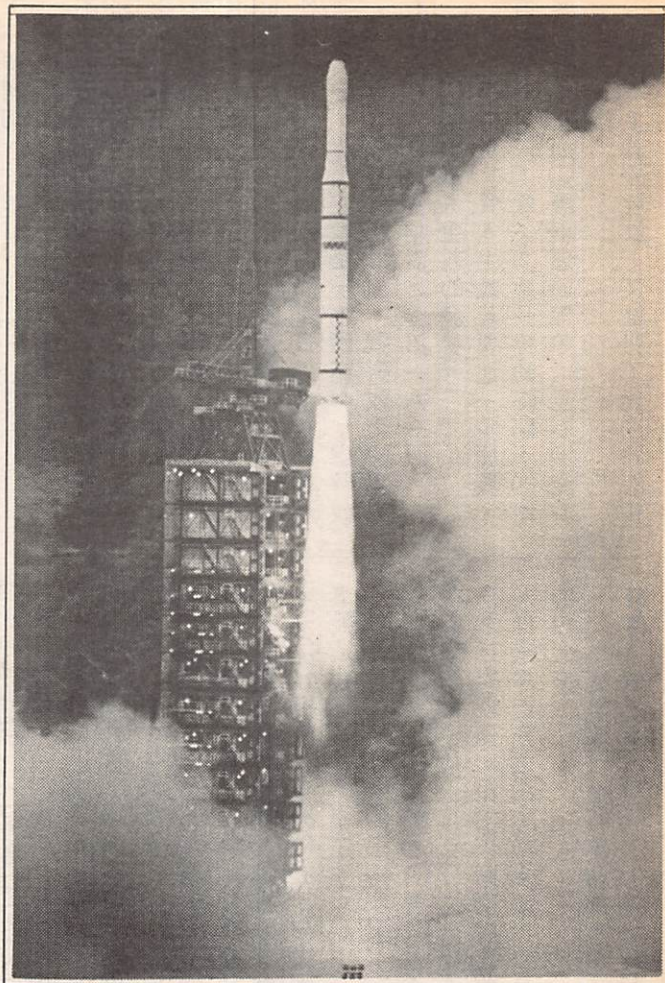
自由主義顯示出它的無限生命力和可變性

。我們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十八世紀算起，到現在才不過三百年時間，但却出現了許多變化：

1. 資本主義，最初是以商業貿易的形式出現的。那時，由一批頭腦靈活、專門做買賣的商人掌握了手工業作坊，使手工業脫離了農業，成為純粹的商品生產者。這一時期的社會便屬於商業社會。

2. 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從此就由商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

3. 工業社會又經歷了數次的工業革命，如電力、電子、半導體等的發明和應用，一直到太空技術產生後——以人造衛星上天為標誌，又由工業社會轉型為資訊社會（哈佛大學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稱之為「



時代在飛速進步，可中國傳統的集權政治仍無改變。

後工業社會」。

工業社會使農業人口大大減少，但農產品却大大增加；而資訊社會却將使工業人口大大減少，而工業產品將大大增加。

4. 從組織形態來看，這數百年來經歷過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知識密集的過程。

5. 資本家本身，也經歷了許多變化：最初的單個資本家，進而集體資本家——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人類第一個經濟合作組織，也可以說是「合作社」，是真正的自由人組合。股份公司的競爭產生了壟斷資本主義（即資本密集）。股份公司進一步發展，又使股東成員擴大至所有社會成員。股東已不限於資本家了。

6. 企業結構的變化：從最初由資本家直接掌管企業，至產權和管理權的分家——企業決策

權全部交給僱員。及至股份公司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其股東的自由進出，股票的自由買賣，哪一位是資本家？已變得面目全非，私有企業又有向「類公有」發展的趨向。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到底是誰的產權？誰也弄不清楚。其董事局主席沈弼，却是該公司的僱員——這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退伍的英國海軍中尉，在英國找不到工作，跑到香港來求職。由於其胆識、智慧，遂由一個小小的分行職員逐漸提升為總行的魁首。

7. 資本主義制度亦可消除貧富極端懸殊的現象。如瑞典、丹麥、瑞士等北歐諸國，通過稅收調節，不僅消除了貧富懸殊，而且走向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英國，也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貧富差距要小。

8. 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中小企業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9. 社會經濟成份，正由以資本家經濟為主向知識經濟過渡。

上述所列舉的九點變化，都是已經發生過或正在發生的事實。資本主義之所以能自動調節生產關係，其根本原因在於其「自由主義」本質。

自由主義實際上是「無主義」。儘管哲學家、經濟學家在不斷地解釋「資本主義」，但僅是「解釋」而已，資本主義並沒有形成完整和固定的理論體系。作為資本家階級，也絕不迷信任何理論。

資產階級對待理論，就如同對待一雙鞋子一樣，穿着就拿來穿，穿着就丟在一旁。今天凱恩斯主義有用，就用凱恩斯主義，明天不適用了，就換過佛利民主義；佛利民不適用了，再換過別的什麼主義。總之，他們絕不迷信任何「名牌鞋子」。

因此列寧說：「資產階級唾棄所有的理論。」（《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三一九頁）

反觀共產黨國家，是照馬克思先寫好的「社會主義」本來辦社會主義的，因此條條框框特別多。從這個層面來看，資產階級要比共產黨人聰明得多，至少沒有如共產黨人那樣，用「四項基本原則」這四條繩子來套住自己的脖子。資產階級要靈活得多，絕不讓穿不着的名牌鞋子套在自己的腳上，妨礙自己的走路。由於是無主義，因而也沒有任何框框套套，可以任人發揮聰明才智、思想的馬可以自由馳騁，其結果是民智大開，促使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生產的高效率。

各階級的人之所以有天然的「資本主義」傾向，因為人人都需要自由。

六 自由制度本質使馬列的 認識無法跟上

馬列主義明顯地反映着時代的局限性。在馬克思生前的時代，正是勞力密集時代。他的大部頭著作——構成《資本論》主幹的剩餘價值理論，恰恰就是勞力密集時代的產物。馬克思除紀錄了「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片面資料外，其推論幾乎是完全錯了。略舉數例：

其一，關於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關係。資本家和工人，首先是互相依存的關係，然後才是對抗關係。

互相依存關係是第一性的，天然的，不可改變的。沒有資本家，就沒有工人階級；沒有工人階級，也就沒有資本家，正如沒有上就無所謂下一樣密切。

互相對抗的關係，是第二性的，可以有程度不同的變化。如資本家對工人的態度好些，福利好些，其對抗性就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反之，若刻薄一些，其對抗性就可能大些。

馬克思却片面地在強調他們的對抗關係，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即使是奴隸主與奴隸，也不可能完全是對抗關係，其依存關係依然是第一性的。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從產權理論出發，認為奴隸是「主動產」；虐待奴隸，「使用」的困難就增加，這對奴隸的主人沒有好處。（見《壹桔者言》第一八一頁）

其二，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若要進一步發展，必須(1)減少工人工資；(2)延長勞動時間；(3)增加勞動量；(4)加速機器運轉等等（見《共產黨宣言》）。

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證明了馬克思的預

斷是全錯的：工人的工資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勞動時間也縮短了。勞力密集初期，工人勞動時間是十六小時漸次減至十四小時、十二小時、十小時、八小時。而近二十年，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每週五天的八小時工作制，還有進一步減少勞動工時的趨勢。科學技術的進步也使工人的勞動量減輕，現在許多危險的和最繁重的工作，基本上已由機器人所代替。

其三，關於中小資本家的問題。

在馬克思的革命生涯中，這是極端重要的，因為馬克思一直認為：所有中間階級、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與農民等，每天都被大資產階級所吞食而「淪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從人口的一切階級中得到補充。」

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小企業愈來愈多，《大趨勢》(MEGATRENDS)作者奈恩比(J. NASSBITT)說：「新興的小企業大幅成長」。據統計，美國在一九六七年之前的七年間，有九百萬新工人加入勞動隊伍，其中有六百多萬人為小企業工作。

產業工人是馬克思賴以進行革命的骨幹隊伍，但資訊社會的發展，却使產業工人愈來愈少。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柏芝(DAVID L. BIRCH)指出：今天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勞工從事製造業。

隨着資訊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產業工人將愈來愈少，恰如工業社會農民愈來愈少一樣。在農業社會，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生產百分之百的糧食。在工業高度發達的社會，農業人口減為百分之三，却生產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糧食來。

馬克思賴以進行革命的產業工人，被現代科學技術逐漸所消滅。中產階級却大大增加。

其四，關於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充份體現在勞力密集的時代。剩餘價值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也即資本家靠「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發財致富。

恩格斯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認為他「發現」了資本家的剝削「秘密」，這與他發現「階級鬥爭」一樣重要，是馬克思畢生的「兩大發現」。

但剩餘價值理論不僅在當時是片面的，在今天更顯得荒謬可笑。

即使是勞力密集時代，勞動也不一定能夠創造價值。如資本家投資不當，產品不對路，銷不出去，工人的勞動就白費，沒有價值。只有產品賣得出去，才構成價值。產品的售價超過所耗的成本，才構成「剩餘價值」。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

因此能否創造剩餘價值的決定關鍵，是資本家的投資是否妥當和管理方法是否完善。生產組織者（資本家）、工程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生產工人、流通者（商人）及消費者，都是剩餘價值的創造者，怎麼能單歸勞動呢？今天，知識價值日益重要，勞動價值越來越處於次要地位。

張五常教授幽默地說：像鄧麗君這些「超級明星」，其「剩餘價值」既不被資本家剝削，她也沒有剝削聽眾，「這些現象的發生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全錯了。」（見《鄧家天下》）

在列寧生前的時代，則是資本密集的時代。反映列寧主義特徵的《帝國主義論》，恰恰就是資本密集時代的產物。資本密集被列寧稱作「壟斷資本」或「帝國主義」。列寧說：「帝國主義無非就是壟斷資本」。

科學、技術和資訊社會的發展，使「壟斷

資本」無法再壟斷。著名的英特爾公司（INTEL）創辦人之一羅勃·諾以斯（R. NOYCE）在談到他的半導體業時說：「這個行業和鋼鐵、汽車等不一樣，它絕對不會出現寡頭獨佔的情形。這一直是一個腦力密集的行業，而非資本密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在勞力密集時代就認為資本主義到頂了，「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變得大狹窄，以致不能容納它們所創造的財富了。」（《共產黨宣言》）。現在，列寧又再次宣佈資本主義到頂了，已經垂死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見《帝國主義論》）。

列寧說這話是一九一六年。但恰恰在列寧預言後的半個世紀之後，資本主義却空前地、更生機勃勃地發展起來，以致社會主義各國不依靠資本主義的經濟、技術和科學力量就無法再擺脫其危機。

資本主義的「到頂論」，一次又一次地破產，說明馬克思、列寧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

七、小 結

我們回顧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給我們提供了鮮明的足跡：人類歷史是由集體主義發展到個體主義的；從國有制到私有制的發展；從奴隸主義到自由主義的發展；從專制主義到民主制的發展；從集權主義到分權主義的發展；從愚昧盲從到獨立思考的發展。

這一條道路是健康的發展道路，是使人民自由、平等、富裕及使國力強大的道路。集體主義是最原始的生產模式。從人類誕

生之日起就是集體主義。而古代集體主義發展的最高峰，就是奴隸主義。

集體主義並不反映着先進，而是反映着知識落後和缺乏自信。集體主義意味着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意味着把命運交付給某一個人，意味着一部份人被奴役和另一部份人奴役別人。

中古時代的西方，曾陷入宗教集體主義；東方大部份國家，如埃及、印度、伊朗等國，也陷入宗教集體主義。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却陷入儒教集體主義；本世紀二十年代之後，又陷入了馬克思的集體主義。

西方的宗教集體主義埋下了個人主義的種子，那就是基督教義中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而東方的宗教集體主義和儒教集體主義，却缺少人人平等的教義。儒教更規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序列，雖然這些序列也包含着職責的意義，教人不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各按自己所負擔的職責行事，但等級序列的不可變動，却被中國歷代統治者所大力強調和提倡，而使之成爲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了。馬克思主義追求被壓迫者的解放，但却不承認人人平等，認爲「平等」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人民的口號。因此，凡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其國內並沒有消除不平等的現象，其等級序列畢竟還有家庭的溫情。

西方的宗教集體主義終於導出了一個性解放，演繹成「自由、平等、博愛」的鮮明口號，使得落後的西方一躍而進入世界最先進的行列，把東方遠遠拋在後面。

而東方各民族，却一直在宗教集體主義、儒教集體主義和馬克思集體主義的醬缸裏打滾，使得東方落後了。

人類漫長發展的歷史表明：未經歷過「個

性解放」洗禮的「集體主義」，只能說是愚昧集體主義，是受人操縱利用的集體主義。這種愚昧集體主義，在某種條件上也可令幹點好事，但幹壞事的時候要多得多，已爲古今中外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如中古時代歐洲的政教合一年代，扼殺新思想新科學的出現，宗教法庭焚死過大批自由思想者和科學家。德國近代的民族集體主義和日本的大和魂集體主義，却成了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和侵略者。中國的馬克思集體主義發展的最高峰，則是一九五八年至六一年代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述所列舉的幾個事例，都說明愚昧集體主義的破壞性是極大的。

只有社會充份肯定個體價值，以及充份發揮每個人在個性和潛能基礎上的合作，才能產生有效的偉大力量。必須提及的是一小群盜賊也是在發揮每個人潛能的合作，因這是違法的犯罪活動，不能相提並論。

而以「集體主義」之名去扼殺個性的發展和個人的創造潛能，則是愚行。中國解放後「解放」不出藝術家、作家、哲學家 and 思想家，使有深厚文化傳統的民族造就不出有世界水準的文化人，反而不如二、三十年代，就是因爲陷入了馬克思的集體主義。而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正是趁儒教集體主義削弱、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輸入的機遇中，所以產生大批的作家、藝術家、美學家和哲學家，也爲科學家的產生奠下了基礎。

本人歡迎中共今天有一定程度自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但如果這次改革還強調要堅持國有制和集體化，則對這種改革就不很樂觀，因歷史證實集體總是和極權聯繫在一起的。

至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能否成爲社會發展「史」，則將在下一篇來分析。

台灣、台獨、與大陸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系主任 楊力宇

編者按：三月廿二晚，由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委員會及全美台灣同鄉會在芝加哥布爾頓酒店合辦了一個「台灣未來十年」討論會。主講人包括從北京專程趕來的林麗韞（中國全國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中共中央委員）等七人。楊力宇教授是四位講評人之一。會後，楊教授將其講稿交給美國華人報界及本刊發表。

台灣：必須努力維護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以保持台灣之繁榮、穩定及安全。對外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採取現實靈活的政策，突破在國際上的困境。

台灣：台灣獨立必然引致中共的武力干預。

大陸：必須努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要實行真正的民主與法治，保障人民的自由與人權。放棄「四個堅持」，不以武力威脅、封鎖、或攻擊台灣，一切以「和平」為基礎。

台灣與大陸：必須維持台灣海峽的平靜。海峽兩岸必須和平共存、和平競爭。在兩岸之政、經、社會等方面之差距消失後，中國統一必然「水到渠成」，自然來到。

一、台灣的前途

最近兩年來，「江南案件」、「十信弊案

」等事件為台灣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投資意願低落，經濟結構混亂；而外交上的困境亦是十分明顯的。所幸「十信」及「江南」等案件已成過去，經濟已開始復甦，出口激增，外資、僑資亦逐漸增加；但突破國際上的困局尚待努力。

然而，我們必須認清，台灣存在及茁壯最重要的因素是民主、自由、法治、繁榮及穩定之維持；不論維持這些三十多年的成就，或為了突破孤立，輕舉妄動，走向獨立，必引起中共的武力干預及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反對。台灣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在不影響安定及繁榮的原則下，繼續發展民主政治，加強對自由、人權之保障，努力革新，廢棄僵化保守的作風，採取比較靈活及現實的外交政策，突破國際上的困境；並在法制的基礎上，安排合法的、和平的及有秩序的政治繼承——台灣如能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當有光明的前途。

二、台獨的問題

台灣人民應該爭取並賦予更多政治權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允許新的政黨的存在，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組黨結社的自由乃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素，此乃無可爭議之事。台灣目前的「友黨」（青年及民社二黨）甚少監督及平衡作用。

但是，如果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力及組織新黨的目的是「民族自決」、「台灣獨立」及推翻國府，則台灣穩定、繁榮及安全必大受威脅。台灣面對大陸，可說是「大敵當前」，壓力日增，最需要的是穩定。如有任何動亂，中共必然武力干涉；「出兵平亂」是中共一再強調的政策。走向獨立，亦必然招致中共使用武力。中共領導人已多次重申此一政策。所以，走向獨立，必為台灣帶來重大的災害，絕無前途可言。

三、大陸應有的方向

大陸過去的記錄令人心悸，但近年它進行改革及現代化的努力。然而，經濟改革及經濟現代化並不能解決大陸今日所有的問題。今日大陸必須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從經濟開放政策走向政治及社會開放，從經濟現代化走向政治現代化、意識形態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及制度現代化，並建立以法制及選舉為基礎的接班制度，實行真正的民主及法治，舉行普選，保障自由及人權。

大陸如能達到上述目標，並放棄「四個堅持」，而堅持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原則；同時發展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不以武力威脅、封鎖或攻擊台灣，一切以和平為基礎，必可增加台灣及大陸人民的信心——這是大陸應有的方向，也是中國統一的基礎。

四、台灣與大陸

中國將來應該統一——這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但在達到統一前的漫長階段中，台灣與大陸必須維持台灣海峽的平靜，雙方必須堅持「和平共存」與「和平競爭」的原則。在海峽兩岸之政、經、社會等方面之差距消失後，中國統一必然「水到渠成」，自然來到。

由「見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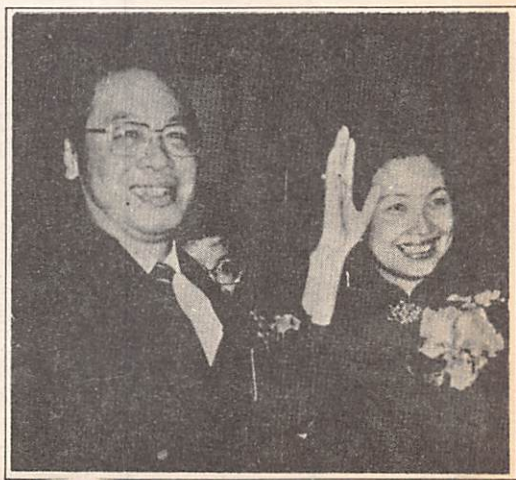
聯想到的

(台灣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台灣的「中國時報」三月七日第二版刊載了二則消息；一則標題是：「蒙藏會委員長董樹藩病逝」；另一則標題是：「令下未就職，人事出怪事，交通部避談，莫非有玄機？」後則內容大要是，台灣方面在今年一月九日經行政院正式核定發佈交通部常務次長魏巍退休，電信總局長陳玉開升任常次，遺缺由副局長劉詩華升任，劉的職務則由台灣國際標準電子公司董事長蔣廷章接替。到三月九日這項人事命令將屆二個月，依據台灣的人事法規定，公務員接奉任命令後，應在一個月內就職，但如有正當理由，而經主管官署特准得延長一個月。截至這段新聞刊出，台灣方面的交通部沒有一位主管就這件事提出說明，也無人願正面討論此一怪例，引起多方面揣測。姑不論此事內中究有何玄機，而令人感到的是國民黨的人事制度大有愈演愈亂趨勢，與以往人事調動景況又大相逕庭。

在台灣的政界曾流傳過「見光死」的這樣一句話。顧名思義「見光死」即任何事與物，一經曝光即告終結之謂。用在物上，如菲林一見到光就成漆黑廢片一張。在人，除演藝人員外，在台灣，政界人士如在人事大搬風時頻頻曝光（上報），有時會招致適得其反的效果。這就是所謂的「見光死」。

記得當年錢復任職新聞局長，屬「青年才俊」，難免恃才傲物，從未把台北新聞界的一些無冕皇帝放在眼裏，因此，無論他在新聞局長任內或調升外交部次長後，總會每過一段期間，必然在報上曝曝光，記者老爺們有事無事拿他消遣一番，發佈一些小道人事消息，或許人事安排果有其事，但由於報導過早，頻率過高，導致最高階層忌諱，終於導致「夭折」。所幸此君經人指點迷津後，與新聞界廣結善



錢復恃才傲物，得罪記者，中了見光死的毒數年，最後經人指點迷津，才得以外放美國。圖為錢復與其妻子田玲玲。

緣，最後被派至美國，在時間上雖晚數載，但終究如願以償。諸如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有鑒於此，台灣政界人士，每逢內閣改組或人事變動時，對新聞界莫不噤若寒蟬，表面不敢得罪一些要聞記者（專事採訪行政院院會及各部會重要新聞），打恭作揖，不是要求他們在報上「美言」幾句，而是拜托他們「少言」幾句，最好別提，以免名字過早上報，中了「見光死」的毒。雖然如此，記者們總有秘密管道可取得最高人事機密，在報端披露。

說來真令人百思不解，台北當局任命人事，常在已有腹案，因過早「曝光」而「胎死腹中」。就以中國時報報導蒙藏會委員長董樹藩病逝新聞來說，三年前行政院改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人選中以薛人仰呼聲最高，而薛本人也大有志在必得之勢，無奈辭類類「曝光」，最後竟大爆冷門，殺出一匹黑馬董樹藩。據傳說，本已內定辭就蒙藏會委員長職務，但辭類類「曝光」，最高當局見玄機被破，乃臨時在



連戰曝光太多，乃與台北市長無緣。董樹藩病逝，實乃意外中的意外。

中央黨部人員名冊中逐個查詢資料，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綏遠籍的董樹藩，在時間急迫情況下，別無選擇，乃圈定了董繼任委員長職務。董樹藩當時尚非「名噪一時」人物，所以未中「見光死」之毒。但事隔三年却因心肌梗塞症去世，這大概是國民黨當局始料未及的意外人選中的意外事件吧。在當年改組的同時，另有台北市長亦將更換新人，競爭激烈，為歷年所僅見，當時的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連戰、台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都極力爭取，甚至傳言當時任職新聞局長的宋楚瑜也有意問鼎。頻頻「曝



「帳房先生」俞國華接掌行政院，結果搞得一敗塗地。

光」的前二位，均屬台灣省籍人士，套一句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他們都屬於「籍貫優良」者，按理定有一人中選。傳說二人也分別就各人人事班底佈署就緒，只等走馬上任。誰知却觸犯了最高當局的大忌，一夜之間走了馬換了將，改派原任台北縣縣長的邵恩新出任台北市長職務，連則長交通部，高却落了空。未幾，邵恩新却因病辭了職，當時盛傳邵因能力不逮，未敢戀棧這台灣省首席市長寶座，因而託病請辭。國民黨這種寧濫也不願被人識破玄機的用人政策，為當時國人所不齒。而這位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去職，不啻給國民黨一記響亮耳光，也給國民黨上了一堂政治課。

國民黨最近在國際社會上節節敗退，究其癥結，或與人事僵化有密切關連。而人事之僵化導因恐又在於用人政策上。觀諸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用人唯才，少有門閥觀念，故在人事的新陳代謝上，乃至於政權運作上也少有窒礙。反觀國民黨，用人唯「信」，所用之人一定要為最高當局所信任，即使是庸才，也在所不惜啓用。如當年派駐日本亞東關係協會的毛松

年，非但不通日語，不諳日本國情，且年老體衰，幾已行將就木，就仗勢蔣家元老的呵護，而橫行無阻。再如由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職務，除了能緊緊把持國庫的外匯存底以外，政績一敗塗地，充分發揮了「帳房先生」的本能。這一切，在在顯示了國民黨用人心態之一斑。這種固步自封心態的遺毒，延伸至今，已是積重難返，有如逆水行舟，而猶不自覺。最高權力中心心態是如此，一些高官顯要為了自身政治前途，也將當年雄心壯志置諸腦後，一心一意立志「做大官，而不做大事」，不惜與昏庸權利中心妥協，來換取宦途的一帆風順，格調之低下早已失去為官者應具備的品格。或謂高官中也有高風亮節之士，奈處在國民黨那種特殊人事制度下，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後只有走上同流合污之途。

為什麼國民黨的人事詭譎多變？為什麼會有這種「見光死」的怪現象？其實歸根究底，根本就是封建王朝時代那種「天威莫測，唯我獨尊」的遺毒在作祟。當權者希望永遠高高在上，他們的心態也不容他人猜測。「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更何況任免官員這種小事，那由得你們民間去揣測！如果什麼都讓你們猜著，不如讓你們來當皇帝算了！而所任的官員能否稱職，是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是不在考慮之列的。當權者主要要維持的就是「天威莫測，唯我獨尊」的形象，讓你們有所畏懼，如此一來，王朝寶座才能穩固。

在此不禁要奉勸國民黨當局，快快痛下針砭，打破用人禁忌，祛除「天威莫測，唯我獨尊」心理，啓用真正開明、有才之士，同時給為官者充分信心，不再畏懼中「見光死」之毒而戰戰兢兢。同時更要徹底實行民主政治，雖為時稍晚，總比到旌靡輒亂時好吧！

鄧小平的小故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遠 整理

編者按：本文原為對一位大陸訪問學者的採訪稿，該學者與鄧小平身邊的許多人有過交往。由於不願牽連國內有關人士和朋友，故將此文重新整理，刪去有關人名，該學者名字亦不公開，如願聯繫，可向本刊詢問。

江西中央「五·七」幹校

一九六八年初，正是「文革」最轟轟烈烈的時期，鄧小平全家被下放到江西省的新建縣，包括鄧的夫人卓琳和長子鄧樸芳、女兒鄧毛毛（鄧楠）、鄧折中（批林批孔時改為鄧質芳）等。他們住在炮兵學校的一座孤獨的小樓裏，有公安人員監視，還有兩個解放軍警衛，鄧小平來來去去都由這兩個當兵的跟隨着。

鄧小平當時在新建縣農機廠勞動，幹的都是一些粗活，如修理工具等。當時的江西省革委會領導人都不敢去看鄧小平，管鄧小平的是當時直屬中央辦公廳的江西中央「五·七」幹校。在這裏勞動的還有宋任窮（原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等中央領導人。宋的孩子宋真真、宋彬彬，李的兒子李華川也隨父來此。宋任窮當時是個硬骨頭，死也不檢討，連孩子們勸也沒用。宋、李兩家比鄧家要差，都住在農村，據李華川講房子要倒了都沒人管；宋真真也每天趕牛車去賣菜。後來陳雲的小兒子陳方也從福建部隊進了江西

大學物理系，與宋的小女兒結為連理。江大物理系那時全是中央領導人子弟，鄧的小兒子鄧折中也在那裏。

和老百姓關係融洽

鄧小平一家那時很苦，尤其是鄧樸芳，下身殘廢。鄧樸芳文革前進了清華大學，文革開始時還參加過最早的紅衛兵組織——紅後代。老鄧被打倒後，一連串的打擊降臨到小鄧的頭上。鄧樸芳沒有人照顧，沒有醫生護士治療護理，只有鄧小平與卓琳給他擦身。

那時的當權派是不敢沾鄧小平這樣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邊的。只有些出身好的工農同情他，特別是對「文革」有不滿情緒的。鄧小平家與農機廠之間的路不好走，一些農民就自發地把這段路修理好。鄧小平到底是有政治家的胸襟，在江西的這幾年每天都看書寫字、養雞種菜。後來形勢稍好些後，兒子上江大物理系，女兒上了江西醫學院。鄧和當地人處得很融洽，最後抓住機會給老毛寫信，調回北京。臨走時日子已經過得熱熱呼呼了。

卓琳坐牛車去醫院

有一件最生動的事情是卓琳患闌尾炎。鄧在農機廠時廠領導對他都很不客氣，他們見鄧是以走資派的身份來改造的，所以嚴加

管制。

一次，夫人卓琳突然患闌尾炎，離醫院很遠，又不可能找領導派車來送，沒有人會理他，情形非常急。當時鄧在農機廠機修班工作，有個班長對鄧很好，處處給予幫助。當他知道卓琳有病後，就從老鄉家借來一架牛車，連夜將卓琳送到醫院，鄧小平跟在車子後面走。據講鄧當時掉了眼淚。因為那是一個很恐怖的年代，幫鄧小平的忙，是一個立場問題，會大禍臨頭的。

後來，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臨赴京前，這位班長去和他告別，鄧說，以後有事一定來北京找我，我不會忘記你的。

我的老首長來了

八〇年時，鄧小平勞動改造過的新建縣要買部解放牌汽車。當時這種車很難買到，於是農機廠廠長就到北京去了一趟，想憑鄧小平以前在該廠勞動過的關係，請鄧幫忙買車。這位廠長當年雖對鄧小平不好，但鄧很能容人，從未對這類小人施以報復。

這個廠長到北京之後，由於鄧忙於國事，很難見面，於是在京玩了幾天，什麼事都沒辦成就回去了。那位送卓琳去醫院的班長，想起鄧小平說過以後有事可去北京找他，於是就自薦再去找一次。班長來到北京後，也不知鄧住何處，於是找到了國務院接待辦公室。接待人員以為他是上訪人員（當時全國各地到京上訪的人員有十幾萬），接待人員問他是那個單位的，他先說是江西省，後來說到新建縣農機廠機修班，越說越小，接待人員就不當一回事了。這樣的小人物想見鄧小平，爲了買一部解放牌汽車，簡直是笑話，所以想把他打發回去。

班長一看沒什麼希望了，就說，鄧小平原在他的班裏勞動過，曾說過有事可來北京找他。班長問是否能給鄧打個電話，如他很忙就算了，也許鄧倒楣時說過的話現在早就忘記了。接待人員經不住磨，就給鄧小平的秘書打了個電話，提了這回事。沒過多久，鄧小平就坐著「紅旗轎車」來到國務院接待辦公室，一進門就熱情地握住班長的手，說：「我的老首長來了。」全場的人全都呆住了。仔細一想也沒錯，因為那時鄧是機修班的一位普通工人，這班長是他的頂頭上司，自然是「老首長」了。後來鄧就批了個解放牌汽車給新建縣。

美國之行，臨危不懼

鄧小平的美國之行是一次很富戲劇性的旅行。中國民航總局和上海民航的領導講過這件事情。

鄧小平上台後，與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有個不同之處就是交富朋友。毛澤東想在世界上樹立偉大領袖的形象，不惜揮霍中國人民的血汗。鄧正好相反，他要人民過「小康」生活，丟掉面子，到處借錢建國。鄧一上台，第一個外交舉動就是訪問美國。一切安排妥當後，鄧從北京起飛，途經上海去美國，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去送行，當時華國峰也去了。歡送儀式剛完畢，鄧的女兒，大概是鄧毛毛，突然從人群中跑上蹬機梯，悄悄向鄧小平說：「上海方面來電話，說機場霧太大，飛機無法降落，希望您延遲起飛。」鄧小平堅決地說：「不行，要按時飛。」於是，手臂一揮，告別了歡送人群，就進了機艙。有人把鄧的美國之行比做毛澤東的重慶談判之行，像毛澤東一樣，大手一揮。那時中美尚未通航，就連全天候的中國飛

行員也沒有飛過到美國的這條航線，因此美國方面派了飛行員來領航。上海虹橋機場是空軍司令張廷發親自坐陣指揮。虹橋機場的氣氛異常緊張，安排了幾種方案讓飛機降落。因為鄧當時在全國人民心中威望正高，如果出了意外事故，憤怒的群眾會把虹橋機場砸爛。飛機到了上海後，的確霧太大，第一次沒有降落成功，塔台指揮「順三角」降落，但飛行員根本看不見跑道，又昇上去。一個飛行員的水平高低

主要表現在降落技術方面，降落時如果有偏差，就很容易出現翻機事故。他們反覆了幾次，最後才終於順利降落了。

這件事可以看出鄧對美國之行是如何的重視。其實延期起飛也是合情理的。但做為中國第一號領導人第一次出訪美國，能否按時到達，其意義非同一般。鄧的這次訪問並不亞於當年毛的重慶談判之行。所以，鄧小平臨危不懼、鎮定自若，終於按時成行。

沒錯，世界是一部童話

——致遇羅錦女士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世界是一部童話
——你這樣說道，
并天真地

用一枝鷄毛小筆，
幻想著
把人們變小。

是的，很美好，
可你却忘記了

一個事實：
這是中國

——五千年驕傲的文明，
這麽容易還童嗎？

可憐的幻想家，
世界真是一部童話
沒錯！

你未能把人們變小，
祇把自己變成了
一隻小兔子，
孤零零地，

在幽暗的森林裏
關蕩

不小心招來了

大灰狼的追咬。

世界真是一部童話
沒錯！

你在童話世界裏漫遊，
如夢的暢想
不知要往哪裏走？

是的，沒有路了。
對盲從者

路總是在他的前頭；
對探索者

路祇在他的後頭。

你到處碰壁——現實的牆壁：
謾罵、譏笑、千夫所指，

可是你，以童話般的風度
驕傲依舊。

有什麼可驕傲的？
因為，在心靈深處

從來沒有一個女人
比你

走得更遠！

世界各國自由民主程度的評估／中國的位置

「政治風險分析公司」與「自由之家」介紹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馳遠

八十年代已經過去了一半，中國大陸結束「文化大革命」，重振經濟實行開放政策也已經十年了。這些年裏，世界各國形形色色的人群蜂擁而至，旅遊、經商、講學，曾興起了一陣「中國熱」，甚至有人到中國當企業的廠長、當大學校長。中國人也紛紛到世界各國去考察、留學。可以說，外界接觸了中國，瞭解了中國。那麼中國這個國家在別人的眼裏，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呢？或者說，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什麼樣的水平上呢？這裏向大家介紹兩個權威性的研究機構：紐約政治風險分析公司和自由研究所，對中國所作的評估。

一、投資的政治風險評估

政治風險分析公司每年推出一份各國政治、經濟狀況分析與評估的報告，名為「國際商業的政治氣候」，報告主持人科普蘭博士說，為報告提出意見的有世界二百五十多位財經和政治專家。風險評分基於如下七個因素：(一)執政黨在未來十八個月的權力動向及主要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二)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商業的政治動盪程度；(三)國際企業安全所

受到的威脅；(四)國家邊境的衝突爭執；(五)資金轉移的風險；(六)外國直接投資的風險；(七)出口商的風險。其評分方法有A、B、C級(A為風險低)、百分比和敘述。下面請看對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評分結果(表1)。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將面臨許多障礙，如能源短絀、通貨膨脹、預算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之爭。

二、權威性國際政治研究機構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該項研究是由雷蒙德·蓋思台爾(Raymond A. Gutti)主持，於七三年開始研究。該機構每雙月發表一次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由論爭」(Freedom at Issue)雜誌上，介紹世界各國的自由程度和政治狀況，並預測未來之演變趨勢。蓋思台爾說：「這項比較性研究試圖給全球自由狀態提供一個更客觀、平衡和標準的圖像，一個全球政治與民權兩方面自由的概況」。「以概括的方式，本研究記錄了民主的進程和挫折，使全世界驚醒，注意那些應被阻止的和應受支持

的各種趨勢。」

該研究包括政治權力(Political Right)和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個主要方面。前者指有效地參加政治過程的權力(選舉、競選公職和參與公共政策決策)；後者是言論自由、結社、示威及人身自由(宗教、教育和行動自由等)。再由這兩方面指標將各國分作上中下三個自由度。

政治權力與公民自由被分作七個級別，以(7)為最差，以(1)為最好。分級標準是：

- (1) 級：具有完全競爭的選舉程序和清楚的選舉規則；
 - (2) 級：存在不平等選舉因素如經濟差距、文盲和威脅性暴力；
 - (3) 級到(5) 級：表示一定程度有效地履行了民主過程。(5) 級有時表示選舉過程完全無效，但社會不同集團之間達成一致，多少類似於民主過程產生的結果；
 - (6) 級：不許競選，人民毫無機會反映對執政黨和政策的要求。但統治者在某項問題上注意到了公眾的要求；
 - (7) 級：政治專制，毫無公共觀念。
- (二) 公民自由：(1) 級：出版自由，

包括政治程序的立法亦是自由的。主要新聞媒介不會單純被政府御用。法院保護公民不因觀點而遭逮捕。在教育、職業和宗教方面的私人權力受到尊重；公民不會因合法的政治活動而受到人身威脅。(2)級：警察與法院有極權主義傳統，缺少制度化或安全的自由保障。(3)級至(5)級：常常存在政治犯，檢查制度不完善，安全無保障。(6)級：政治犯歷久存在，合法新聞媒介完全在政府監督之下。不許結社。居住、行動和職業等受到限制，但私下言論仍有相對自由。非法示威能夠發生，地下刊物有流傳。(7)級：社會充滿恐懼，甚至私下亦沒有獨立表達存在。在警察遍布下沒有任何反對意見能夠表達出來，囚犯處置迅

速。
 (三)自由度：(1)和(2)級屬於自由；(3)至(5)級屬部分自由；(6)和(7)級屬不自由。
 表2選擇了世界主要國家的自由狀態比較。總括起來，從地域看，西歐和南、北美洲多屬自由國家，亞洲國家多為部分自由，非洲和東歐各國多為不自由；從政治集團看，資本主義國家自由度較高，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較低；從經濟情況看，發達國家較自由，發展中國家不很自由(見圖)。
 一九八五年三種自由度人口比例是：全球自由人口為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七，部分自由的人口為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九，不自由

自由之家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發現一些規律性相關因素：自由程度與多黨制直接相關，是公眾競選，參與政治的依據。該研究把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狀態分成三型：(1)中蘇型(Sino-Soviet)、(2)歐美型(Euro-American)和(3)傳統型(處於邊緣狀態下，常從前兩型借取某種政治經濟手段)。每一型又分作納入(Inclusive)和非納入(Noninclusive)兩個亞型。研究結果(表3)發現政治經濟制度與自由的關係常表示歷史的機會而不是自然的發展，資本主義不會引起民族趨於政治自由，社會主義也不會引起民族政治不自由。一切結果都是經驗的結果。
 表3 堅欄中，資本主義(Inclusive Capitalism)指市場調節和私人企業，稅率很高但不存在充公現象，政府干預只限於補貼和調節。非納入型資本主義(Noninclusive Capitalism)指低於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從事資本主義現代經濟，其餘人口仍從事傳統經濟，如泰國和利比亞。國家資本主義(Capitalism Statist)具有許多巨大的政府控制性生產企業，國家干預經濟但沒有平均主義動機，如巴西、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混合資本主義(Mixed Capitalism)通過政府和它非營利機構提供大規模社會服務，導致私人財產在平均主義目的下打了折扣，這些國家仍為資本主義立法，但政府只是勉強接受之。如以色列、荷

表 1.

投資在中國台灣之政治風險

	十八個月推測	五年推測
最可能出現的政治體制	國民黨集體領導90%	國民黨集體領導85%
政治動盪	低	低
資金轉移風險	B+	A-
投資風險	B+	B
出口風險	A-	A

投資在中國大陸之政治風險

	十八個月推測	五年推測
最可能出現的政治體制	改革派 80%	改革派 65%
政治動盪	低	可
資金轉移風險	B	B
投資風險	B	B-
出口風險	B-	C+

投資在香港之政治風險

	十八個月推測	五年推測
最可能出現的政治體制	英國控制 95%	英國控制 85%
動盪程度：低		
可能性	3%	較多
金融	A+	B
投資	A+	B+
出口	A+	B+

的人口為百分之四十點四三。全球自由狀況並不樂觀。

三 一項獨特的學術研究 ——政治經濟制度與自由

自由之家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發現一些規律性相關因素：自由程度與多黨制直接相關，是公眾競選，參與政治的依據。該研究把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狀態分成三型：(1)中蘇型(Sino-Soviet)、(2)歐美型(Euro-American)和(3)傳統型(處於邊緣狀態下，常從前兩型借取某種政治經濟手段)。每一型又分作納入(Inclusive)和非納入(Noninclusive)兩個亞型。研究結果(表3)發現政治經濟制度與自由的關係常表示歷史的機會而不是自然的發展，資本主義不會引起民族趨於政治自由，社會主義也不會引起民族政治不自由。一切結果都是經驗的結果。

表 2. 獨立國家自由程度比較 (節選)

	政治 權力	公民 自由	自 由 狀 態		政治 權力	公民 自由	自 由 狀 態
阿富汗	7	7	N F	利比亞	6 +	6	N F
阿爾巴尼亞	7	7	N F	墨西哥	4 -	4	P F
阿根廷	2	2	F	蒙古	7	7	N F
巴西	3	2 +	F +	尼加拉瓜	5	5	P F
保加利亞	7	7	N F	巴基斯坦	4 +	5	P F
緬甸	7	7	N F	菲律賓	4	3 +	P F
加拿大	1	1	F	波蘭	6	5	P F
智利	6	5	P F	羅馬尼亞	7	7	N F
中國 (大陸)	6	6	N F	沙特阿拉伯	6	7	N F
中國 (台灣)	5	5	P F	新加坡	4	5	P F
古巴	6	6	N F	南非	5	6	P F
捷克斯洛伐克	7	6	N F	西班牙	1	2	F
埃及	4	4	P F	蘇丹	6	6	N F
芬蘭	2	2	F	敘利亞	6	7	N F
東德	7	6	N F	泰國	3	4	P F
西德	1	2	F	蘇聯	7	7	N F
匈牙利	5	5 +	P F	英國	1	1	N F
印度	2	3	F	越南	7	7	N F
印度尼西亞	5	6	P F	南斯拉夫	6	5	P F
伊朗	5	6	P F	美國	1	1	F
日本	1	1	F	阿爾及利亞	6	6	N F
北朝鮮	7	7	N F	安哥拉	7	7	N F
南朝鮮	4 +	5	P F	奧地利	1	1	F
老撾	7	7	N F	奧地利	1	1	F
哥倫比亞	2	3	F	比利時	1	1	F
剛果	7	6	N F	不丹	5	5	P F
丹麥	1	1	F	波利維亞	2	3	F
多米尼加	2	2	F	博茨瓦納	2	3	F
厄瓜多爾	2	3 -	F	中非	7	6	N F
法國	1	2	F	乍得	7	7	N F
加蓬	6	6	N F				
海地	7	6	N F				
圭亞納	5	5	P F				
洪都拉斯	2	3	F				

N F : 不自由
P F : 部分自由
F : 自由

蘭和瑞典。混合社會主義 (Mixed Socialism) 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但實際允許很大比例經濟保持私有性質。其納入型 (Mixed Inclusive Socialism) 指大部分人口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其非納入型 (Mixed Noninclusive Socialism) 指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不從事主導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 (Socialism) 指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國家經濟，亦有私人現代產業存在，但在非常情況下，國家隨時可以取締之，如蘇聯與古巴。非納入型與納入型社會主義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前者原始經濟和民族仍未被納入，只有少量社會主義現代經濟存在。

表 3 橫欄中，多黨制度 (Multiparty) 有非中心性的如美國等，有中心性的如法國和日本。主黨制度 (Dominant Party) 允許民主形式存在，但通過政治手段使反對黨無法撐權 (假競選、監禁反對黨領導人等)，如菲律賓。一黨制度 (One Party) 如蘇聯、越南。民族主義一黨國家 (Nationalist One Party) 採取與共產黨國家相同的政治形式，但拒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如利比亞。無黨制度 (Non-Party) 在非軍政府情況下可能是民主的，如沙特阿拉伯，但更多是軍政府的非民主形式，如尼日爾和巴基斯坦。

四 評價

自由之家在連續十四年的研究和預測中贏得了較好的聲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認為其主要優點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標準客觀。該研究所依據的指標如選舉權、言論自由和公民人身自由等，都是當今世界各國所公允的基本權力，很多都納入了各種政治形態國家的憲法中。(二)比較充分。該研究所將世界

表 3. 政治經濟體制一覽表

政治體制	多黨制		主黨制		一黨制		無黨制		
	中心型	非中心型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民族主義	軍政府 非軍政府	
經濟體制	紐西蘭 F	澳大利亞 F	馬來西亞 F				吉布堤 NF	智利 PF	約旦 PF
資本主義	愛爾蘭 F	加拿大 F						蘇里南 NF	
納入型	朝鮮(南) P F	西德 F							
	日本 F	黎巴嫩 F							
	西班牙 F	美國 F							
非納入型	厄瓜多爾 F	博茨瓦那 F	海地 NF				喀麥隆 NF	乍得 NF	尼泊爾 PF
	洪都拉斯 P F		賴索托 P F				肯尼亞 PF	尼日爾 NF	錫金 PF
	泰國 P F							也門(北) PF	不丹 PF
國家資本主義	阿根廷 F	巴西 F	中國(台灣) PF					加納 NF	科威特 PF
納入型	意大利 P F		墨西哥 PF					尼日利亞 NF	沙特阿拉伯 NF
	南非 P F								
	土耳其 P F								
非納入型	秘魯 F	印度 F	印尼 PF						阿曼 NF
	玻利維亞 F	巴基斯坦 PF	伊朗 PF						
	烏干達 P F		菲律賓 PF						
混合資本主義	奧地利 F		埃及 PF		布隆迪 NF				
納入型	希臘 F		尼加拉瓜 PF						
	芬蘭 F		新加坡 PF						
	瑞典 F		突尼斯 PF						
	法國 F		津巴布韋 PF						
混合社會主義			圭亞那 PF		利比亞 NF	中國(大陸) NF	馬里 NF		
納入型			敘利亞 NF		波蘭 NF	南斯拉夫 NF	蘇丹 NF		
					剛果 NF				
非納入型			馬達加斯加 PF		贊比亞 NF				
社會主義						阿爾巴尼亞 NF	東德 NF		
納入型						保加利亞 NF	古巴 NF		
						羅馬尼亞 NF	蒙古 NF		
						匈牙利 PF	蘇聯 NF		
非納入型						阿富汗 NF			
						老撾 NF			
						柬埔寨 NF			

各國的自由情況進行充分的比較，使人得到一個完整的面貌，又知道了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之中的政治進步程度。(三)科學分類。該研究對政治經濟制度與自由狀態的關係的研究是頗具特色的，特別是他們採用的政治經濟制度分類方法極為詳盡，可以說對世界一百多個獨立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制度的分類，是一個難度頗大的課題。

五、應該如何認識中國？

自由之家將中國的自由狀態評為不自由的國家，政治權力和公民權力都列為(6)級。做為一個中國人，感情上是不易接受的。但是，傷感之餘，讓我們重新看一下(6)級的指標，我們只好說，還是正視自己的形象吧！

政治權力(6)級：國家不允許競爭性選舉過程，人民沒有機會選擇新的政黨執政和改革某項國家政策。統治者認為一個人或幾個人有權決定國家的事務，任何人不得對這個權力提出異議。然而統治者在某些方面對公眾的要求能夠做出反應或尊重社會固有的信仰體系(如伊斯蘭教)。看看中國的情況：中國沒有競選過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而共產黨內也只是個別人說了算(過去是毛澤東，現在是鄧小平)，對共產黨的地位提出異議將會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而關進監獄。共產黨把國家搞得不可收拾時，將由另一派別的共產黨人取而代之，同時拋出替罪羊，黨的威嚴是不受損害的(這種做法稱為「自己糾正錯誤」)。共產黨在迫不得已的時候，能夠反映一些公眾的要求(如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但共產黨完全用馬克思主義宗教取代了一切宗教(孔教、佛教、基督教)，無所謂尊重社會固有的



世界各國自由程度地圖

一九八六年一月

Wall maps, 20"×30", \$5 each.
 Send payment with order to:
Freedom House, 48 East 21 St.
 N.Y., N.Y. 10010

信仰體系。

再看公民自由(6)級：政治犯在中國歷久存在是有目共睹的，中國的新聞媒介完全在共產黨控制之中。不許結社，除統戰需要保留下某些傀儡黨派外，任何結社都會遭到嚴厲鎮壓。就連居住、行動、職業和教育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涉。人們私下怨聲載道(這比毛澤東時期是一個進步)，學生、工人時有非法示威發生，地下刊物有流傳。

該文指出了中國目前面臨的三個現實：(1)中國農村自由經濟和城市鬆綁企業，將促使政治朝較大自由方向運動；(2)改革政策引起了人們放棄社會主義的要求，於是黨中央九月會議上重申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政治局成員陳雲強烈抱怨改革太快，「精神污染」正在抬頭等；(3)鄧小平將年輕、技術好的人作為第二、第三梯隊接替黨和政府的重要崗位，但人們關注的是，鄧小平「去見馬克思」的時候，改革政策是否能夠持續下去。

中國屬於混合社會主義納入型經濟，有相當大的人口比例從事私人性質的生產(但不超過百分之五十)。政治體制為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人民享有少得可憐的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而這就是中國的形象。可悲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我們的民族容忍這樣的形象，認可這樣的形象，不去努力改變這樣的形象。更可悲的是還有那麼一些偽君子來粉飾這樣的形象，也還有那麼一些民族敗類想永遠保存這樣的形象，讓她醜惡下去，讓她墮落下去，最終腐化了我們的民族。

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學會審美，正視自己，鄙棄醜陋，使我們的民族有一個煥然一新的民主自由的形象。

●留學生園地●

朝鮮戰爭 與 毛澤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袁大戈

毛澤東「抗美援朝」不是爲了「保家衛國」。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發生的韓戰是「美帝」發動的嗎？看下列事實：①開戰後數小時北韓軍即攻佔南韓重鎮開城，二十八日陷漢城，八月九日南韓軍被逼退守釜山。②開戰後八小時美國國務院才收到美駐韓大使館莫希電稱：北韓對南韓實行全面攻擊。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聲明介入韓戰，三十日下令美軍參戰，七月三日美國第二十四師的一個團才由日本船運釜山。③當時北韓軍有二十三萬人，全

部蘇式裝備，南韓軍只六萬五千人，美佔軍五萬已於四九年撤離南韓。④九月十五日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同時從釜山反攻，二十五日北韓全線崩潰，陷入南韓的北韓軍十三萬五千被俘，同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宣佈渡江作戰，十月七日聯合國授權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追擊北韓軍，十月九日越過三八線，二十一日攻佔北韓首都平壤，並北追至鴨綠江邊。⑤開戰後一個半月內，南韓節節敗退，「人民日報」從未報導南韓越過三八線攻佔任何據點的消息，麥克阿瑟主張渡江追擊志願軍而被杜魯門撤職。⑥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志願軍因消耗過鉅不得不停戰簽字。

以上情況表明：這場韓戰如係「美帝」唆使南韓，則戰爭主動權應屬南韓，南韓軍至少應掠佔北韓若干據點後，北韓始組織反攻，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因此，這場韓戰是由金日成發動的。

好戰成性的毛澤東企圖幫助金日成「解放南朝鮮」的「抗美援朝」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財力物力的損失超過三個「八年抗戰」的財物損失，人員傷亡，中共始終沒向人民交代。值得一提的：

①五一年二月一日，聯合國通過譴責中共爲侵略者。

②大批志願軍俘虜通過中共「勸說遣返」，竟有一萬四千二百零九人不願遣返回國，願往台灣，只有五千六百四十人願回大陸。

③韓戰期間蘇聯「支援」南韓幾十門大砲、卡秋莎火箭砲、迫擊砲、T三四型坦克、裝甲車和無數輕武器、數百架米格飛機、八十萬輛卡車等等，完全記在中國帳上。「三年災害」時期蘇聯逼債，包括這筆戰債。

中國民主之前途

美國普杰桑大學政治學教授

張 俠

最近兩、三年來，美國新聞界充滿了有關中國改革刷新的報導。

從報紙上，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委員會三百三十一位高級官員集體退休的消息——一樁中共有史以來無先例的現象。從電視上，我們看到中國婦女從臃腫的毛裝解放出來的活躍肖像。最新的形像是北京的青年搶先購買體格龐大、金髮藍眼的美國電影明星 BROOKE SHIELDS 與 SUSAN ANTON 的彩色招貼。最令人驚愕的是，這些招貼竟是中國政府所印刷的！甚至於莊嚴的時代雜誌 (TIME)，亦選擇鄧小平為其 MAN OF THE YEAR，並且還滔滔不斷地敘述中國「震驚的變化」及其「自由資產主義的潛伏性」。時代雜誌認為中國正在「馬克思主義的邊緣上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這種種的報導，在美國大眾的意識上，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中國真是變了！美國最近的一次輿論測驗竟發現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知



張俠教授近照

知道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雷根總統在合眾國四十週年紀念的演講中，亦把大陸的經濟改革描述為中國資本化與資本主義優越性的證明。難道我們確是正在目擊空前未有的奇跡——即歷史上一個馬克思共產政權自動地、平安地蛹化為其相反？

問題的中心是在這消息的來源：新聞記錄。新聞事業有其作用與貢獻——供應當代人事的消息。問題是這種記述缺乏見解判斷的能力。的確，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是進行了種種的改革。但這些改革必需置於某種背景中才有意義，以便我們適當的認識與了解。基本上，我們必需對改革前的中國有某種認識或概念。認識和概念必需有其定義和分類。定義分類是科學的建築木材。有了定義分類，我們才能把自然界的種種現象，從混亂中創造意義和秩序。定義分類對比較落後的政治科學來說更為重要。有了適當的定義分類，我們才能對世界上種種國家達成適當的認識，並據此而探索它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

多年來，西方知識份子認為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應當分類為「無限專政」的國家 (TOTALITARIAN STATE)。

無限專政 (TOTALITARIANISM) 是一種廿世紀獨有的極權政體，與世界過去的專政有異。以往的專制只是壓迫消極被動的群眾；廿世紀的專政是一種動員全民眾 (MASS MOBILIZING) 的專制。以往的專制雖是暴虐，但不是一個完全無限的專政；廿世紀的專政，因為有了現代科學技術之輔助 (例如大眾傳播的手段、現代軍事儀器新的控制方法)，使得過去傳統的專政變為一種完全無限、無孔不入的

苛政。結果是一種新的極權，比以往的更爲苛暴、更爲可怕。

廿世紀專政之所以是一種動員全民衆、無孔不入的專政，因爲它有一套政治主義。此爲現代專政與過去極權的第三點差異。無限專政的右派，是德國的納粹種族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無限專政的左派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無論左或右，信仰它的人們均認爲它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主義既然是絕對的真理，而世上只能有一個絕對的真理，那這主義只能是唯一的主義，國家裏也就不能容許其它思想主義之存在；結果就是一黨攬權。在這種情況下，主義變爲宗教，隨員變爲教徒。黨員的責任是把真理傳播給人民，照其指令，把人民塑造成新的男人、女人。能夠教育改變的就教育改變，不能感化的只好毀滅。這種思想與制度的結果是大規模、無人道的慘酷暴行：希特拉從種族主義出發，滅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史大林殺了三千五百萬人，包括蘇聯共產黨的一半黨員；毛澤東毀滅了一百萬地主，二千萬的文革青年、知識份子及共產黨員，一千五百萬因大躍進而白白餓死的老百姓。

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專政更爲危險，因爲馬克思及其信徒自認爲其信仰爲一萬能準確的社會科學。法國卓越的政治哲學家 JEAN-FRANCOIS REVEL 有這個解悉：

「共產黨既然憑了這科學真理，獨知人類最終最崇高的利益與幸福，那何必接受民主的決議方式？難道我們讓學童自由決定到底相信古代希臘哲學家 ARISTOTELZ 荒謬的宇宙觀，或相信 COPERNICUS 符合科學之宇宙論？」

以中國的情況來說，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的確符合了無限專政的種種特徵，諸如：(1)神



八三年打擊刑事犯罪的公審大會。

化的領袖 (CHORISMATIC LEADER)；(2)行政壟斷的主義；(3)大規模的動員民衆；(4)一黨專政；(5)被政府統治的大衆傳播媒介；(6)政府以恐怖作爲控制人民的手段；(7)受政府管理與操縱之道德倫理；(8)被中央指導管理的計劃經濟；(9)政府獨佔暴力的機構。

成熟的無限專政

「無限專政」此名詞在六十年代西方知識界中開始失寵。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知識界因蘇聯與中國先後失去了它們唯一的領袖（即

史大林與毛澤東）而窘惑，誤認爲無限專政若缺少了這一特徵，就失去了其本質。

七十年代之末，「無限專政」名詞的使用漸漸恢復起來。西方一部份知識份子認爲馬列國家，即使神化的領袖已不存在，但仍和其它民主或非民主國家有很大的差異，不應合併同論。

問題是馬列國家既同屬一類，但應該如何加以定義？美國思想家拉可 (WALTER LAQUER)，在去年十月份的評論月刊 (COMMENTARY)，建議這種略爲變更的共產國家應被稱爲「成熟的無限專政」。我們持着此新的概念，才能正確地了解改革的「新中國」。

據拉可的看法，新的無限專政是一種長大成熟，制度化及理智化的專制。這個略爲變更了的無限專政有以下的幾種特徵：

(一)成熟的無限專政捨去了以往幼稚的屬性，特別是那個反復無常、歇斯底里的神化領袖。繼承他的是一種新的領袖，較爲拘束的經理型領袖。

(二)因爲極權已制度化，不再需要神化領袖時期過份暴虐的控制手段，所以成熟的無限專政減少了以往大規模的恐怖行爲，而能漸漸地放鬆其極權。

(三)成熟的無限專政能以理智的計算，決定容許社會內有限度的自由化。但此自由的源泉不是無限專政的崩潰虛弱，而是其強固及制度化。

此種政體，雖是較前相對改善，但仍不變其本質。其政治結構仍是極權；國家仍被共產黨領導；黨仍堅持它是獨擁唯一的真理（雖然此「真理」的內涵隨着當權派而改變）；政府仍掌握控制鎮壓民衆的工具。任何反對政府、持異議的份子，若有損於黨的政權或專政的傾

向，政府便立即實施法辦。德國的政治哲學家 RICHARD LOWENTHAL 說：成熟的無限專政「並未從虐政變為自由，只是從大規模的恐怖變為一卑鄙的統治。」無限專政的冰山並未因改革而溶化，只是稍為凍解而已。

成熟的中共無限專政

今日的中國，雖經鄧小平的改革較前放鬆，但仍不脫其專政本質。的確，中國經濟是較資本化，人民生活是較自由，但中國政權仍集中在共產黨手中，仍未被制衡；政府仍保留着充份暴虐人民的能力。結果必然是一旦政府認為必要，便可使用其峭寒可怕的原始暴力。

我們至少可舉出三個例子，來證明中國以國家的暴虐力量實施這種極權。第一個是一九八三年八月開始的撲滅犯罪運動。

據西方國家外交人員的估計，自從這一運動展開後，有五千到一萬人被集體和有時候當眾處決。被捕處死的人，包括四十五種罪狀：竊盜、強暴、反革命破壞、印行色情照片、流氓、秘密結社等。在許多案例中，有些人在宣判的當天就被草率的處決了。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良心犯和勞改營的。良心犯是那些行使自己基本人權，以及沒有使用或鼓動暴力而被囚禁的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這些人包括一九七八年在北京民主牆期間的政治異見青年；忠於教宗的天主教士；支持達賴喇嘛的西藏人；因個人或大眾痛苦而上訪的人；把「國家機密」交給外國人的人；反對改革政策，也就是政府所指的「左派」等人。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這些良心犯在正式受審之前，都會受到長期的監禁；他們不會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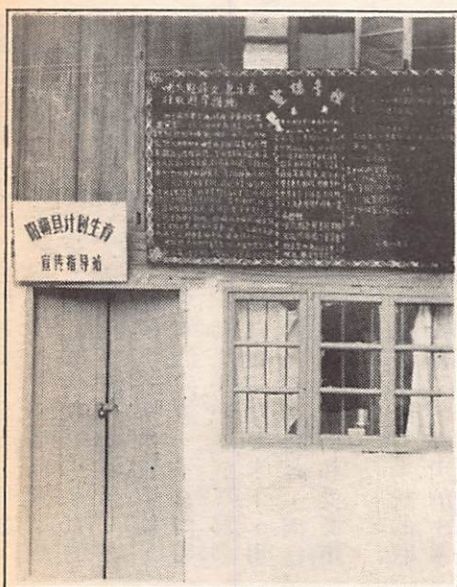
公正的審判；在單獨隔離長達四年的禁閉中，經常受到刑罰；尤其是一些人在等待審判期間，都受到手銬腳鐐和歐打的虐待。

這些良心犯分別監禁在全國各地三十八個勞改營，有些是在黑龍江、青海和西藏的一些偏遠地區的大勞改營中。這些良心犯的確實人數我們無法知道。不過國際特赦組織報導過，甘肅省一座勞改營的一名副主管說，僅僅是甘肅省就有兩千人在「勞改」。

第三個這種殘暴例子，對我個人來說是最感到痛心的，那就是在一家一嬰人口政策下，對女性的戕害，包括成人和嬰兒。

在北京駐了四年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MICHAEL WEISSKOPF 認為，中國今天的現象是「國家以威嚇、大規模的墮胎來干預最隱秘的私生活。」中國家庭計劃部長錢信忠就說過：「生孩子也像其它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一樣，是國家計劃的事……夫婦不能想生就生。」

光看這宣傳站的外觀，不難想像其醫療技術設備的落後。



中國的問題很簡明：它有將近十億零三千八百萬人口——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但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如果中國保持每個家庭二點三個子女的生育率，它的人口到二〇八〇年將穩定在二十一億三千萬——是現在的一倍。如果每對夫婦的生育率是兩名子女，二〇五〇年的人口將穩定在十五億。（註十）

中國政府的解決辦法是一九七九年實施的一家一嬰政策，這是它要使中國人口在公元兩千年時，維持在十二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以各種嚴厲的措施來執行這一政策：強迫絕育、強迫墮胎和強迫裝置子宮內避孕器。

WEISSKOPF 報導，中國的法律規定，有



「一孩化」消滅了難以估量的小生命，也摧殘了無數中國婦女的身心健康。

兩個以上孩子的夫婦，其中一人必需絕育。地方官員以各種威迫和利誘，包括金錢的獎勵，使這些人上手術。但是承擔這一責任的，幾乎永遠是女性。在農村地區，大規模絕育運動「高潮」期間，這一工作是由巡迴外科小組到各村莊去作。逃避絕育手術的人，每延遲一天的處罰相當十美元，以及課以兩百美元的罰款（相當一年的收入），或喪失一個家庭的一半土地分配。官方的統計顯示這一工作非常成功：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間，三千一百萬婦女，九百三十萬男性作了絕育，接近全國已婚、有生育能力夫婦的三分之一。

此外，中國政府還規定，任何婦女在有了第一個孩子之後，如果未經批准又懷了第二胎，必需墮胎。許多墮胎都是在懷孕的最後三個月實行的——僅僅在廣東省就有十萬件，佔全省墮胎的百分之二十。有些甚至是在第九個月。方法是把一種草藥注射到子宮，二十四小時後會有死產。

中國政府的發言人斷然否認有威嚇墮胎的事情。但是主管一家一嬰政策的地方幹部，使用的方法是：「教育」、親朋的壓力、鉅額的罰款，解除工作職務、取消耕地、住宅和經濟方面的福利、折毀房子和沒收貴重物品。而且還有目擊者報導說，把婦女集中在稻田，戴上手銬把他們綁起來抬上手術檯。很難說這不是威嚇措施。

據中國公共衛生部的報告，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期間，墮胎的總數是五千三百萬件，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法國的人口。除了強迫墮胎之外，婦女還被迫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據報導，在實施節育的婦女中，百分之五十五是使用子宮內避孕器——也就是在一億兩千四百萬人中，佔六千九百萬，相當全

世界其它地區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婦女的總數。中國的婦女在生了第一胎後，就要依照國家規定裝上子宮內避孕器，而且嚴禁取出。北京的一名產科醫生說，北京市有些醫院的醫生，在產婦生產之後，立刻自動裝上子宮內避孕器，而不告訴產婦或事先徵求她的同意。子宮內避孕器通常都是一樣大小，結果不僅造成了許多發炎感染，而且當一些庸醫在婦女要求下，用來消毒的土製工具拿出子宮內避孕器時，因為刺穿子宮和腸子，造成了無數的死亡和受傷事件。

因此，中國婦女的身體在受到有系統的狀態下，飽受摧殘也就不足為奇了。今天的中國婦女，壽命比男性短。哈佛大學人口研究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POPULATION STUDIES）的訪問研究員NICK EBERSTADT，在他所作的一項新研究中說，一九八二年估計的中國婦女平均壽命是六十四點二歲，中國男性是六十五點七歲。（但是在海外的華人，女性的平均壽命一般都比男性長五到七年）。在其它的社會中，還沒有像中國，婦女的估計平均壽命短於男性的情形。換言之，雖然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下，平均個人的經濟生產和個人消費都有了增加，但中國男女兩性平均壽命的比例，却與世界各國截然不同。

好像這種種苦難仍嫌不夠似的，一家一嬰政策還造成了另一種間接的後果：虐殺女嬰。北京政府堅決否認中國有虐殺女嬰的事，而且可以理解的，它已拒絕提供這方面的統計。但是中國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報紙，却經常報導這種事。由於我們不能得到中國的官方統計，西方的人口統計學家，只能以審查新生嬰兒的兩性比例間接方法，估計虐殺女嬰的情形。

兩性出生的自然比例的國際標準，是每一百零六名男嬰對一百名女嬰。在中國早先兩次的人口調查，它的出生性別比例，低於世界標準，一九六四年是一〇四對一〇〇，一九五三年是一〇五對一〇〇。但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却是一〇八五對一千，這顯示少了二十三萬兩千名女嬰。（兩性的出生比例，在以後的出生差別中，更不相稱：城市的第二胎是一一五比一百，農村的第三胎或三胎以後是一一二比一百）。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國政府拒絕公開出生的性別比例。但是根據在北京的中國人口專家，私下告訴西方人口統計學家的數字，兩性的出生比例差距，一九八二年增加到一〇九比一百（少了將近三十萬女嬰），一九八三年是一一〇比一百（少了三十四萬五千名女嬰）從以上情況就可以看出，從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的這三年間，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例，使人懷疑總共有八十七萬七千名女嬰被殺。

在英語中，用「心碎」（HEART BREAKING）表示傷心。當我讀到中國虐殺女嬰的這個數字時，我真的覺得心碎了。我哭了。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實況：一個高壓的一黨國家，仍然把持着一切的極權力量。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儘管較為成熟和理性，但仍是一個極權國家。在這方面，一個理性化、成熟與充分制度化的極權主義，也許更使人恐懼。

從上述種種事實看，雖然中國實施了經濟改革，但我仍難滿意或欣喜，因為中國的權力結構仍然一如既往——而這種結構正是暴政一直得以衍生的溫床。在極權的中國放棄它的意識形態一元論和絕對的真理之前，在一黨放鬆它獨佔的政治力量之前，我看不出中國有民主的前途。

不要對共產黨採取

敵視態度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江超明

採取對共產黨敵視的態度，我認為是不可取的。可喜的是，「中國之春」第三十三期已有了實質性的轉變，很好。

共產黨在中國實行專制是有其社會基礎的，不是一、兩個黨魁或一、兩個權力集團的問題。否則請回答：為什麼美國等國無共產黨專制？為什麼美國任何一屆有威望的總統也不可能發動類似文革的運動？我們必須承認，文革的發起是有億萬人民盲目自願地參與，你不能說毛主席接見的幾百萬（也許是上千萬）紅衛兵是被強迫到天安門的。這些紅衛兵當時表露的感情也不會是裝出來的。文革直接受到迫害的，恐怕還是共產黨員佔多數。記得鄧小平宣布取消「四大」時，與會代表熱烈鼓掌歡迎，會後也未見有抗議活動。這至少說明，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同意取消「四大」。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取消「四大」比物價上漲更嚴重。當然，若有了真正的新聞、出版自由，「四大」也就可有可無了。

共產黨政權的專制色彩，可以說是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延續。若其社會基礎不改變，無論什麼政黨在大陸都會實行專制的。就是請你們民聯去大陸，你們要治理國家，或許也不得不借助專制手段。君不見，鄧小平搞一點經濟改

革還遇到這麼大的阻力，不得不利車，更何況推行民主制。

其實共產黨是隨着社會普遍意識的改變而



共產黨的專制色彩，是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延續。

不斷改變的。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的共產黨似乎並不那麼可怕。

共產黨已經在大陸統治了三十七年，再統治這麼長時間是很有可能的，蘇聯就是例子。但只要你們不改變對共產黨的敵視態度，你們就不可能爭取在大陸合法活動。等你們開過「二十大」以後，大陸上絕大多數人也不會知道有你們的存在，而只能在海外賣幾本雜誌。如若這樣，不光是鄧小平，連我都要說你們成不了氣候。

常言道：兒子不嫌母親醜。你們若把大陸發生的一切壞事都推到共產黨身上，再加上點佐料，就會使一些大陸學生從感情上無法接受。如貴刊八六年二月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頁「國內出現了『萬人坑』和『販賣人口』」一文，讀完後不知你們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反對計劃生育？不像！反對共產黨？不對呀，共產黨也認為這種事是犯罪行為，查出後要嚴辦的。比如說在美國有各種犯罪活動，你能因此指責美國政府不好嗎？美國有妓女，你能因此否定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嗎？美國有失業，你能一概否定自由經濟嗎？這些事作一些實事求是的報導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以發揮。你們千萬不要在報導方面犯共產黨所犯的一錯誤。

你們對共產黨採取不理智的態度，憑着一股怨氣和感情來撰寫文章，把共產黨說得一無是處，這樣確實痛快。但是，這樣難免使海外華人產生一些疑問：怎麼你們的報導給我的印象和其他幾家美國雜誌報導的印象不一致？我接觸的幾個共產黨並不是青面獠牙的呀？其結果是降低你們自己的信譽，把貴刊辦成潑婦罵街式的末流刊物。

基於以上幾點，我認為貴刊對共產黨的基

做得好的地方，應予以肯定和支持，或提出自己的見解。如經濟改革、幹部體制改革、文字語言改革、推行九年義務教育、普及法律知識、健全法律制度……。

以下對貴刊提一些具體的建議：

一、採用橫排版面，在適當的時候採用簡化漢字。橫排版面是世界潮流，且也合理。以現有守舊之嫌。我本人認為，中國文化落後是中國政治落後的社會基礎之一。試想有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是文盲（八二年人口普查結果），他們根本看不懂選票。你怎麼通過選舉反映民意？貴刊的性質不是商業性，不能指望靠賣雜誌和捐款來維持，否則你們只能看施主的眼色行事。我想你們應該有獻身民運的人，並願以經商來為民聯籌款，即民聯應有自己的企業。雜誌是否賣得出去，主要在於你們的政治影響和文章質量。這不是我個人能否將就的問題，這是我的基本觀點。

二、開闢專欄，介紹民主政治。你們在第三十三期「學習立法、學習競選、學習授權、學習制衡」一文中已談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這裏我再展開來談一下。

如果我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人是法盲，該是可以接受的吧？不然你們可以在大陸學生中搞個調查，看有多少人說得清楚為什麼立法和司法要獨立？為什麼要先有憲法，才能有其它法？為什麼自由經濟比計劃經濟合理？什麼是公法？什麼是私法？……若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後，對民主政治、自由經濟、法律制度等仍無一個清楚的概念，這可是民聯的一大失誤。若他們只知道美國的物質生活比大陸好，有個「中國之春」在罵共產黨，那可真沒什麼意思了。

記得在北大讀書時，八〇年前後在學校選

舉區人民代表的學生代表時，確實很是熱鬧了一番。競選者不乏其人，言論也很大膽。當時的主要人物一個是王軍濤，他是「北京之春」在北大的聯絡人。一個是校黃色學生會主席，名字忘了。選舉結果，該學生會主席當選了，票數最多。這還不算，這兩人都差點因選票不足最少限額而使選舉無效（因許多學生未投票）。更有甚者，我們班上有位女同學，在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幾個同學起哄，把她的名字也報上去了。她既沒有「施政答辯」，也沒有寫大字報，而她的選票還不是最少一位。

真令人哭笑不得之餘感到灰心。須知這事發生在北大，而不是在農村選村幹部。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在選舉期間，校方提供一切方便，如修建大字報欄，提供禮堂設施供答辯，提供紙張……就差沒免修課了。你們可以說，這種官方選舉是搞形式，沒意思。但學生們可以假戲真做，選一個敢於替學生說話的人，充分利用這次機會，進行一次民主選舉的演習。你們可以說在這些候選人裏沒有一個是理想的。但難道那個學生會主席是候選人裏最合適的嗎？北大就找不出一個更好的了嗎？這件事說明大多數學生不關心政治，不知如何運用手中的權力，更不知道如何去爭取權力。北大學生尚且如此，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貴刊開闢民主政治知識普及專欄，很有意義。

三、增加一些吸引大陸學生的內容。當然，這些內容應嚴格控制篇幅，如：如何在美求職、非法打工會遇到什麼問題、股票是怎麼回事，如何挑選舊汽車等。

以上提出的這些意見和看法，只是給你們提供一些參考，希望你們的工作在新的起點上會有更新的成就。

● 文藝園地 ●

城市之夜

（中國大陸詩人）

嵐之凝

望着昏暗的街燈下
那一排排三角形的屋頂
我的眼睛被鋸痛了
蒙着窗簾的窗口像害白內障
不清楚每個家庭裏
用商業廣告逗點的電視節目
插映的是否是《瞧這一家裏》
馬路上人跡很稀少
商店比顧客先鎖進夢裏
酒家醉醺醺地
眯成縫的霓虹燈
與斜對面的電影院眉來眼去
但情侶們覺得
夜比白晝更自然
他們緩緩地走着走着
彼此把影子貼得更近
並不介意落葉在身後模仿細碎的脚步
夜就這個樣嗎
夜就這個樣嗎
在文明古國的大城市裏
夜不比象形文字更年青



論美國人的民族性

(華僑·美國) 徐振青

美國的强大，固然是因為美國地大物博及人多，但美國人的民族習性也是使其强大的原因。中國人的民族習性固與美國人相距甚遠，但知己知彼，若能充份了解他們的民族性，或學習其中良好的一面，當能使居美生活更有意義，或對促進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也有所裨益。正如美國的一句俗話所說：「若你勝不過他，就應該向他學習。」本文乃泛論一般美國人民族性中的共同點，包括優點及缺點。

美國人民族性的一些優點，如愛好自由、民主、守法都與他們兩百年來施行民主及法治等有關。法治施行久了，加以制度完備，人民大多便已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守法觀念及習慣。譬如上下班時常爲了轉一個彎排隊十幾分鐘之久，筆者却很少見有投機取巧者，其他隨處排隊的例子不勝枚舉。另外如一般銀行剛開戶頭，就可以讓顧客提款；一張信用卡可當錢用；商店中任顧客自由取物……這種種尊重及信任個人的制度，若非大部分人都安份守法是難以維持的。至於民主及自由，是一般美國人最引以爲傲的，從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覺到，他們都很有意見也很愛發表意見，但同時也尊重別人發表意見的權利。大概是教育強調活用的關係，一般美國人多半能對事發表一套自己的言論，即使不一定是對的，但多能自圓其說。當然過分注重表白自己，就會忽略了去聽別人的意見，因此常會見到一群美國人自說自話，彼此都不聽對方講話場面。

每個人都愛自由，但美國人幾乎是嗜之若命。由於美國建國歷史很短，早期移民來自歐洲各個不同角落。傳統的教條既少，自由思想乃得以興旺，私有企業的發達，使財富大多掌握在私人手裏，政府只是服務人民的公僕，當然個人的自由便得以確保。筆者常感覺一般美

國人都最怕政府權力膨脹得太大，而會越來越約束個人的自由。反對廢除私人擁有槍枝的美國人，就常以此爲藉口。當然個人自由發展到極限也會出現像同性戀合法化，大都市的高犯罪率……等怪現象。但筆者認爲，自由對於美國社會的正面遠超過反面影響。由於提倡自由，思想不受禁錮，美國各行各業都能百花齊放，個人也能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美國人大多崇信：只要努力，一切都可以達成，天下無難事。這種樂觀的思想不知不覺滲透在社會的每個角落，自然促成了一個朝氣蓬勃的社會。另一個特點就是人際之間的滑潤劑是以幽默感爲主，不像東方各國却以繁複的禮節爲主。

正因為長期受自由思想的薰陶，一般美國人很少滿口仁義道德。可是據筆者觀察，即使天天言不及意的美國人，真正敗壞德行的人也很少。他們把私德與公德分得很清楚，即使一些私德不佳的人，對公衆有益的事仍會十分熱心。這種對公益熱心的民族性可能源于他們的民主傳統及運動精神。民主政治之下，每個人的發言權及投票權都是一樣的，政治的階級性乃不存在，這自然增加了人之間的向心力。美國人都酷愛戶外運動，男孩子差不多從小都參加過各種球隊。在運動之中學得的合群及團結，長大後很容易轉變成對社會公益的積極參與。這種運動更培養了在球賽或商場上拚命競爭，但仍遵守比賽規則的精神。賽後失敗者自認技不如人，日後捲土重來亦表明了美國人的風範和意志力。當然，美國種族複雜，幅員廣大，一般人的愛國觀念比較淡薄，遠不如他們對地方上或小團體中的公益熱心。

自由主義對美國民族性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不崇拜權威，凡事以實際的表現爲衡量標準，他們注重親身去體驗求證，而不輕易聽信別人

。這種實證精神又源於西方歷數百年的科學教育。除了強調科學，美國的教育更強調從小就做些獨立的研究課題以訓練獨立思考與表達能力。因此一般而言，他們大都能說善道。而且年青時就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所長，長大後多能進入自己真正喜愛的行業，這樣自然會促成入盡其材的社會。美式教育過份注重自由發展，當然也有一些缺點，例如知識灌輸的忽略，常使一般人缺乏普通常識；知識的專業化也減少了通才的培養……加之因美國強大了很多年，難免養成了人民自大狂妄的心理。一般人對外國事都不大關心，也多不懂第二外國語。近年來，遠東各國（尤其是日本）在工業上處處向美國挑戰，才使他們吃盡苦頭，開始有點反省。說起美國人的自大，筆者認為這是東西民族性上最大的不同。美國人多不會認為謙虛是一種美德，雖然他們也有謙虛的人，但這些人是因天性，而非後天刻意而為。隨着工業化的發展，一個人的才幹正如工廠所出的商品，必須不斷自我宣傳，才能超越衆多競爭者，獲得別人的注意，這也是美國人不能謙虛的原因。不過在生活小節上，例如開車者多讓行人先行；人人隨時將「謝謝」及「對不起」放在口頭上，這倒是美式特有的謙虛。

自由企業強調競爭，球賽總有輸贏，美國人對贏者常有英雄式的崇拜。這個好處固然使人盡力追求成功，但也容易失去對老弱窮困者的同情心。雖然有不少美國人獻出不少精力時間及金錢來幫助那不幸的一群。但一般而言，窮弱者仍大多得不到社會的注意，年老者（除非特別有錢有名的以外）也常是被遺忘的一群。當然自由競爭的社會，也將美國人的個性塑造得永遠不停的求新、求變，這是促使社會不斷進步的原動力。但變化太快的社會，又

難免會將許多壓力加諸個人身上。當個人承受不了那種壓力的時候，很容易就訴諸于醉酒與藥物。尤其美國是一個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及個人隱私的國家。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他們最不願意的就是依靠別人。有一次筆者一位美國鄰居開玩笑地說，他就讀大學的女兒很希望搬離父母，自立生活，只可惜她目前還供不起自己。這對於視父母子女為一體的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過份重視個人主義的結果，好處是每個人都能獨立自主，缺點是在奮鬥的過程中，許多人吃不了苦而半途而廢。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人中途輟學的比率遠比中國人多。

隨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加以天然資源的富裕，美國人享受著高水準的物質生活，但也養成了一般人浪費的習慣。筆者見過受薪階級買豪華別墅、豪華汽車的例子也不少，很多美國人家裏什麼豪華設備都有，却可能欠了一屁股債。但這又與他們天性樂觀，及時行樂的民族性有關。近百年來，除了南北戰爭及經濟大恐慌，美國國內一直是昇平時代。人民又充份的享受了民主自由的滋潤，因此給予他們對未來的無比信心。據筆者的觀察，大部分白領階級的美國人都還能兢兢業業的努力工作，這表示他們並沒有因富裕而變成好逸惡勞，私人企業的賞罰制度當然也大有關係。近年來僵硬的工會制度使美國藍領階級的生產力停滯不前，加上因浪費習慣而造成巨大的聯邦赤字，這些都是未來的潛在危機。但筆者對美國的未來仍是充滿了信心，因為美國天然資源實在是豐富，他們的民族性又是能接受批評，見風轉舵，充滿動態的，這種韌性是經得起風浪的。

美國民族性中最獨特的當屬他們的多元性。注視個體發展的結果，使每個人都像裁縫訂做的新裝那麼不同，而非工廠大量製造一模一

樣的產品。正因每個人的價值觀念都不盡相同，因此常常可以見到一個買不起房子的工人却擁有一條豪華遊艇；一位上層階級家庭為怕孩子受精神污染而過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家中連電視都不買等等怪現象。筆者曾在紐約鬧區上班，常見到街頭一批批嬉皮士在天主教堂附近徘徊，隔街一群理光髮的印度教徒呼嘯舞蹈而過，大家誰也不管誰，路人也少有投出奇異的眼光，而熙來攘往的行人各種膚色都有，像是個人種展覽會……這說明了美國這個社會的多元性。在這樣一個多元性而又充滿自由及個人主義思想的社會中，每個人真正能追求自己所需要的，而享受最大的滿足。當然這樣的社會並不一定是最高效率的。近年來日本特有的民族性造成了一個比美國更有效率的社會。

筆者時常苦苦思索，為什麼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與苦幹，加上五千年的豐富文化遺產，如今竟落得如此不幸的局面？除了政治制度的不同以外，當比較中國人與美國人的民族性時，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美國人一般而言都比較天真沒有心眼，他們常被批評為「重物質主義」，其實據筆者的觀察，美國人很少有人願意為五斗米折腰，他們做什麼事都很重視是否有興趣。而中國人常常都是為了別人而活，極端要面子。再者老中的心機要比老美詭詐不知多少倍，當團體中的每個人都時時對別人充滿猜疑時，國家自然難以治理得好了。

總之，許多美國人特有的民族性乃在受了兩百年來的民主、自由及法治的薰陶後而逐漸形成的。這些民族性對於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不可缺少的。中國人若能處身自由民主的環境之中，常可以兼具中美兩種民族性的優點而各方面出人頭地。留美華僑的許多表現已可證明這一點。

支援民運活動

請您提供大陸留學生最新通訊錄

親愛的同學和同胞：

自中國之春刊出廣告、徵求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錄以來，我們收到不少熱心讀者寄來的中國大陸同學名單。但是，讀者反映，有些大學并未印刷完整的中國大陸同學及訪問學者通訊錄，收集全套名單有一定困難。在此我們說明，收集通訊錄的原則是「有一集一、積少成多」。能收集到某個學校全套的大陸留學生名單最好，如果名單不齊全也無妨，提供一兩位也是極為歡迎的。請您告訴我們您所認識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的中文姓名及所在校、系即可。有一集一，有二集二，積少成多，遍及各校。您的協助，就是對我們辛苦工作的支持。據反映，有的大陸留學生由于居住地沒有中文書店，苦苦尋找中國之春雜誌達數月之久。當您讀到中國之春時，要想到，有些您認識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可能正在尋找這份刊物而不知如何獲得呢！

我們為推動收集留學生名單工作而制訂的各項獎勵措施如下：

- 一、凡寄來包括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名單在內的大學學生錄、中國同學通訊錄者，可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二年；
- 二、凡寄上二十名以上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地址者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一年；十名以上者，半年；五名以上者，三個月；五名以下者，獲免費贈閱中春簡訊。

三、因學生地址常變，最好寄所在系和教研組的通訊處。
感謝您的協助！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本刊徵稿
稿酬從優

中國之春近幾期組織如下專題，請大家踴躍投稿。

- 一、留學生專題（留學生對兩種制度的體會比較，留學生對中國政府留學政策的建議，留學生歸國待遇等）；
 - 二、大陸經濟改革方向的研討；
 - 三、對多元論的研討；
 - 四、對經濟決定論的研討；
 - 五、評價毛澤東和鄧小平；
 - 六、評論文革及「五·一六」問題。
- 此外，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稿件，均表歡迎，稿酬從優（每千字廿五至卅美元）。



征集大陸資料 ● 支援民運研究

為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各項研究工作，深刻理解中國的社會，以利於民運的開展，本刊現公開徵集有關中國大陸的各類資料，包括：

- (一) 新近及過去的中央及地方黨、政、軍機關的各種文件（原件、影印本或手抄件、回憶件）；
 - (二) 中央及各級黨、政、軍負責人的內部講話、指示；
 - (三) 各種未公開發行的內部出版物、地方小報、大中小學的各种教科書；
 - (四) 對大陸社會的各種實地調查，實地拍照，對大陸某一特定問題的研究報告；
 - (五) 人權資料（辦案程序，宗教政策，監獄實情等）；
 - (六) 黨、政、軍幹部違法亂紀實例；
 - (七) 各地學生、農民、工人運動的資料（起因、經過、結局）；
 - (八) 精簡機構前後各地黨、政、軍機關的編制對比。各級機關第三梯隊的人事資料；
 - (九) 各種民意調查和反映民意的資料，回鄉觀感，親友來信摘錄，各地物價及服務價格（車票、旅館費等）；
 - (十) 外貿機構資料。
- 反映改革前後對比的資料，尤為歡迎。務求註明人物、時間、地點等基本情況。零星、點滴資料亦屬歡迎。
- 請註明資料可否發表。各種資料，不管發表與否，本刊均給予優惠稿酬。
- 您提供信息和資料，就是對民運的支援！

中國之春編輯部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主 辦：中國民主

(CH)

■編 輯：中國

■通訊處：(美洲)

(香港)

(日本)

(歐洲)

(澳洲)

■電 話：(美洲)

■零售價：(美)

T. P. Lee #2427 34-37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 O. Box 500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275號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ALLIANCE CHINOISE POUL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 3-667665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0185, USA
書屋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